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JOURNAL OF JIANGSU INSTITUTE OF SOCIALISM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主办



中国人文学科学期刊 AMI 综合评价扩展期刊
中国社会科学类综合期刊
《中国科技期刊数据库(全文)版》收录期刊
《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收录期刊
《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来源期刊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期刊

本刊顾问

奚爱国 冯 泉 常本春 余 珽
袁建华 高 健 孙 丽 郭东升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刘步健
副主任 陈 锋 朱 杰 夏 涛 钱照亮
魏晓蕾

编 委 (按笔画为序)

韦 敏 李 业 李 军 吴元庆
张吉林 张思东 陈 思 郭晓东
龚万达 潘庆磊

主 编 朱 杰

副主编 陈 思

目 录

2024年 第5期 总第151期

主 管:中共江苏省委统战部
主 办: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
编辑出版:《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
编辑部主任:吉 强
责任编辑:蒋建忠 鲍跃华 王天海 徐晓婷
宋 好

政党制度

- 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与中国共产党形象塑造研究 / 文红玉 郑亚洲 4
-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以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三维审视 / 丁新政 孙 乐 11

统战理论与实践

- 数字统战价值功能、实践困境与策略选择研究 / 詹国辉 刘雨菲 18
- 列宁统一战线思想的逻辑理路及当代价值
——基于《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考察 / 张 裕 黄建军 24
- 社会转型背景下党外知识分子工作的困境与创新路径研究 / 丁 叶 30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的人民性意蕴论析 / 刘 东 37

封面设计:姜 嵩
封底篆刻:韩文忠
地 址:南京市苜蓿园大街 51 号
邮 编:210007
采编平台网址:<http://jsyb.cbpt.cnki.net/>
电 话:025-84287222

传 真:025-84287298 转 7221
刊 号:ISSN1672-3163 CN32-1559/C
印 刷:南京千字文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4 年 10 月 18 日
定 价:8.00 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中国共产党实现党内团结的逻辑与特征——基于党的三个历史决议的考察 / 曹 彬 47
-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关于党的纪律建设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 韦光波 许进品 57

民族与宗教

主持人: 赵晓锋

- 文化认同视域下宗教中国化的历史考察——以唐代佛教僧人为例 / 戎 川 65
- 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逻辑分析 / 高梦琪 70

学习与思考

- 问责异化研究述评: 一种类型学分析 / 梁 剑 76

本刊启事

本刊已加入 CNKI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中国知网、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万方数据库、重庆维普、龙源期刊网、台湾华艺等数据库,故凡向本刊投稿者,均视为已同意稿件入编上列数据库上网发行,授权本刊代理其稿件电子版信息有线和无线互联网络传播权,本刊不再寻求作者授权。本刊一次性所发稿费,包括纸质版、光盘版、网络版及其全文数据库著作权使用费及稿酬。

期刊基本参数: CN32 - 1559/ C * 2000 * b * A4 * 80 * zh * p * ¥8.00 * 2500 * 10 * 2024 - 05

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与中国共产党形象塑造研究

文红玉 郑亚洲

摘要:政党形象是政党生命力和软实力的集中体现。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征程中高度重视自身形象建设,其形象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较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前的筹备工作中,中国共产党形象在“自塑”与“他塑”的共同发力中生成,呈现为朝气蓬勃、意气风发的领导者,民主协商、求同存异的践行者以及破旧立新、勇担使命的先锋者形象。中国共产党在新政协筹备工作中塑造的良好形象,粉碎了国民党的欺骗性宣传,有力地推动了新政协的顺利召开,也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形象塑造提供了历史镜鉴。

关键词:新政协; 筹备工作; 中国共产党; 形象塑造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以下简称“人民政协”)对于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而言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政协积极投身建立新中国、建设新中国、探索改革路、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走过了辉煌的历程,建立了历史的功勋!”^[1]多年来学界对于人民政协的研究不胜枚举,其内容涉及人民政协诞生与发展历程、人民政协理论与制度、人民政协职能与作用、人民政协性质与地位、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等。本研究聚焦的主要论域为,从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以下简称“五一口号”)

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期间,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与中国共产党形象塑造。在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中,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同心同德、亲密合作,为建立新中国绘制了美好蓝图。同时,中国共产党也以实际行动向外界展现了良好形象,粉碎了国民党的虚假宣传,增强了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同与支持,有力地推动了新政协的顺利召开,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凝聚力和感召力。今年是人民政协成立 75 周年,在这一重要的历史节点,本研究以新政协的筹备工作考察中国共产党的形

收稿日期:2024-08-13

作者简介:文红玉,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政党形象、中共党史;郑亚洲,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共产党形象建构及国际国内贯通传播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研究”(23ADJ005)、安徽省新时代人民政协理论和实践研究基地 2024 年度研究课题“人民政协发展的历程、经验与路径研究”(ZXYJ20240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象建构，既回顾历史又展望未来，以期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形象塑造提供历史镜鉴。

一、新政协的筹备过程

新政协是相对旧政协而言的。在抗日战争胜利之际，蒋介石摆出“和谈”的姿态，三次电邀毛泽东前往重庆“共商大计”。为了争取和平民主，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赴渝参加谈判。在中国共产党的有力推动下，国共双方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双十协定》规定：

“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请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2]为了掩盖真实意图，国民政府象征性地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在中国共产党与民盟以及其他民主人士的相互配合、共同努力下，会议通过了《关于政府组织问题的协议》《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的协议》等五项协议，但这次会议的结果很快被国民党破坏。当蒋介石认为已做好发动全面内战的准备后，国民党于1946年6月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彻底撕毁政协协议。凭借武器装备、军队人员数量上的优势以及美国的大力支持，蒋介石扬言要在短时间内消灭人民军队。事实证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3]。在战场上，人民解放军一路高歌猛进，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在国统区，人民爱国民主运动持续发展，有力配合了人民解放军的军事斗争。

当解放战争局势进一步明朗后，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在“五一口号”中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4]这个号召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热烈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纷纷致电毛泽东或发布响应“五一口号”的声明，表示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主张。1948年8月1日，毛泽东在复电中提出，关于“会议的时机、地点、何人召集、参加会议者的范围以及会议应讨论的问题等项”^[5]，希望由大家共同研讨决定。此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密安排和精心组织下，一批批民主人士相继抵达解放区，全力投身到新政协的筹备

工作中。1948年10月21日，中共代表与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举行第一次“新政协诸问题”座谈会。会上，民主人士主张新政协等于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可产生临时中央政府。这一建议被中共中央采纳。1949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明确指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6]。这样建立新中国的步骤就正式由“三步”并做了“两步”，由新政协代行人大职责，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在一系列紧锣密鼓的前期准备后，新政协筹备会首次会议于1949年6月15日开幕。为了邀请宋庆龄北上参加新政协共商国是，毛泽东于1949年6月19日再次给宋庆龄写信，并派邓颖超专程持信前往上海。宋庆龄最终被毛泽东的真诚打动，同意北上，此举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经过三个多月严肃紧张的准备工作，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隆重召开，掀开了新中国历史的崭新一页。

二、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与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多维呈现

一部百余年党史就是一部党的形象塑造史。在不同历史时期，由于社会主要矛盾不同，党的中心任务不同，党的形象也呈现出较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在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中，中国共产党立足实际向外界展现了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政党形象。总的来看，中国共产党形象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一）朝气蓬勃、意气风发的领导者

近代以来，为了扭转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无数仁人志士探索救国道路，致力于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良方。农民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纷纷登上历史舞台，“你方唱罢我登场”，各种救国方案轮番出台，但都失败了。历史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也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人民摆脱任人宰割的悲惨境地。中共中央发布的“五一口号”，得到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积极响应，这也标志着各民主党派、无党派

人士自愿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换言之，新政协是中国共产党倡议并主导的，其领导者必须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新政协的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民主人士纷纷发表声明或主张，公开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7]。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公认的领导者。

在新政协筹备会首次会议上，李济深、沈钧儒等民主人士在发言中均表示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李济深指出，中国革命胜利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中国共产党二十多年的奋斗和正确的领导”^[8]，为了建设一个人民期盼的新中国，更要在毛主席领导下认真严肃地做好新政协的筹备工作。沈钧儒认为，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在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共同努力下，新政协一定能够很好地完成历史赋予的使命。郭沫若认为，筹备会的开幕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我们要永远团结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中国共产党的周围”^[9]。陈叔通认为，筹备会的召开意义重大，他把筹备会的胜利召开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陈嘉庚代表海外华侨表达了对中国共产党的崇敬之情，表示要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总之，中国共产党积极做好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其领导地位也在筹备过程中进一步凸显。

此时，踌躇满志的中国共产党正意气风发地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向前，为建立一个崭新的中国而不懈奋斗。中国共产党坚信中国的未来将无比美好，人民的生活将无比幸福。毛泽东指出：“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10]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有信心和决心在革命胜利后带领人民过上幸福生活。同样，各民主党派也坚信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28 周年的贺电中指出：“中国人民必然永远地团结在贵党领导之下，人民民主的工业化的中国必然建造成功，而贵党

又必然与中国人民同寿同荣。”^[11]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朝气蓬勃、意气风发的领导者形象得到了外界的普遍认可。

（二）民主协商、求同存异的践行者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一直倡导团结一切力量，以最大限度凝聚人心和力量。中国共产党提议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不是为了好看、好听，也不是像国民党那样作秀，而是真心实意地想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团结合作，共绘伟业。中国共产党以平等的姿态、商量的精神以及细致周到的态度真正赢得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发自内心的尊重。在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中，民主协商和求同存异的原则贯穿始终。

做好新政协的筹备工作首先是选好新政协的代表。就代表资格而言，中共中央做了大量耐心的沟通与解释工作，以尽可能多地容纳各领域、各方面的代表性人物。周恩来就此专门强调：“首先要扩大参加政协的成分、单位和名额，使它代表全国各民主阶级、各民族人民的愿望和要求。”^[12]针对少数同志不理解为什么要邀请部分国民党起义人士参加新政协的情况，毛泽东苦口婆心地劝说：“人民政协一定要有各方面人物，不然就是开党代表会议了。”^[13]在最终形成的代表名单中，共产党员、民主党派成员、工农各界和无党派人士分别占总人数的 44%、30%、26%。因此，新政协的代表具有极大的广泛性和代表性。此外，新政协筹备会在常务委员会领导下设六个小组，每个小组组长或副组长也必有一人是民主人士。各小组均采用协商和讨论的方法，充分发扬民主，尊重包容差异，各项文件都是经过反复研究与商讨后，在基本形成共识的基础上才定稿的。国名、国旗、国徽、国歌等也都是协商讨论的结果。以国名为例，在经过激烈的讨论，并听取民主人士张治中、张奚若的意见后，将新中国的国名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在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中坦诚相待，尊重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各种意见，以实际行动践行了

民主协商和求同存异的原则，得到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一致称赞。

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协调下，除反动派外的社会各界代表汇聚一堂，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人心涣散的状态，彰显了全国人民的大团结。致公党代表黄鼎臣后来回忆道：“为了开好新政协会议，毛主席、周副主席多次召见民主人士，反复协商关于召开新政协的各项筹备工作。如参加新政协筹备会的单位、代表名额，人选等等，都经过反复的民主协商后才定下来。”^[14]童小鹏也回忆道：“时常为了某一个代表的适当与否，而函电往返，多方协商，斟酌再三，费时达数周之久。有时毛主席、恩来同志也来参加讨论。”^[15]由此可见，整个新政协的筹备工作过程就是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团结合作、协商议事的过程，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民主协商、求同存异的践行者形象。

（三）破旧立新、勇担使命的先锋者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为了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中国共产党致力于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进而建立一个强盛的新中国。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清楚地意识到只有彻底推翻“三座大山”，中国才能获得独立与和平。经过长期不懈的艰苦奋斗，中国共产党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强大信念和“敢教日月换新天”的顽强精神同国民党反动派英勇斗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重大胜利，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中国共产党有信心，更有能力彻底摧毁独裁专制的旧政权，打破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人民民主专政的新政权，建设一个新世界，从而把一个“长夜难明赤县天”的旧中国变为一个“一唱雄鸡天下白”的新中国。

因此，当预见到国民党反动力量在不久后将被完全消灭，人民将真正成为国家和自己命运的主人，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经济、政治、文化、国防等建设工作将有系统、有步骤地开展时，中

国共产党决定召开新政协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全国人民希望我们这样做，我们就应当这样做。”^[16]总而言之，中国共产党是与时俱进的政党，不断根据变化发展着的实际调整自身的目标与任务，积极肩负起时代赋予的使命，召开新政协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就是为了顺应历史潮流和满足人民的期盼。

在当时，由于长期的战争，国家的经济几乎陷于瘫痪。国民党在败退的过程中更是密谋将重要设备、物资等向台湾转移或加以销毁，给中国共产党留下一个烂摊子。帝国主义势力怀疑中国共产党的建设能力，甚至认为中国共产党终将乞讨才能够存活下去。为此，毛泽东、朱德等在给民主人士张澜的信中真诚地写道：“今后工作重心在于建设，亟盼各方友好共同致力。”^[17]毛泽东多次告诫全党同志要恭恭敬敬地、认认真真地、老老实实地学习建设工作，学习一切自己不熟悉的东西，带领人民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勇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在新政协筹备会首次会议上，他指出，要“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18]。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协的目的就是迅速建设起一个崭新的人民共和国，以实际行动向外界展示了一个破旧立新、勇担使命的先锋者形象。

三、新政协筹备期间中国共产党形象塑造的效果及启示

解放战争初期，在国民党的歪曲宣传下，中国共产党被污蔑为“一群青面獠牙，十恶不赦的人”^[19]。在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中，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向外界展现了积极正面形象，增强了自身的动员力、凝聚力和感召力，粉碎了国民党的欺骗性宣传，有力地推动了新政协的顺利召开，也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形象塑造提供了历史镜鉴。

（一）粉碎了国民党的欺骗性宣传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为维护一党专政，对中国共产党发动了多次军事“围剿”，同时把中国共产党恶意宣传为“土匪”“赤匪”“暴徒”“强

盗”。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进行了第二次合作，组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仍然秉持“攘外必先安内”的理念。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实力不断发展壮大，国民党右派的反共情绪也在与日俱增。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会后陆续颁布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文件，这一系列举措标志着抗日战争以来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政策的重大转变。为了打压和遏制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在军事上多次故意挑起“摩擦”事件，在经济上对陕甘宁边区进行全面封锁。此外，国民党还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手段，利用自己掌握的各种宣传资源，占领舆论宣传阵地，制造和散布反共言论，肆意攻击和抹黑中国共产党形象，“各种污蔑诋毁之词层出不穷，致使社会上一时谣诼四起，如‘共产共妻’‘边区黑暗’等”^[20]。为此，中国共产党通过多种途径主动回应，如积极展示解放区真实状况、开辟宣传阵地以及邀请国内外友人参观根据地等，试图突破国民党的舆论封锁，向外界展现积极正面形象。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英勇表现，进一步塑造了自身的正面形象。但由于国民党长年广泛宣传，外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仍存在一定的偏差。

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利用自己控制的宣传机构，加大对中国共产党的负面宣传力度。在此情况下，国统区特别是城市里的民众并不了解真实的中国共产党。1947年，面对战场上不断失利的境况，国民党再次强化了舆论宣传的欺骗性。1947年8月1日，国民党政府下达《行政院关于修正“剿匪”总动员宣传计划纲要训令》，规定了近期宣传内容，提出了“剿灭朱毛”等14个基本口号。不仅如此，国民党还编撰污蔑中国共产党的歌谣，强制要求军队和民众传唱。1948年2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进一步提出，要“粉碎共匪所谓爱国民主战争的理论”^[21]。在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中，中国共产党本着一切为了人民的原则，真心实意地想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为了达成共识，

中国共产党妥善协调各方利益，广泛听取各方意见。越来越多的民众意识到中国共产党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政党，以往国民党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宣传都是虚假的。中国共产党在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中展现的良好形象是对国民党反共宣传的最好反击，彻底粉碎了国民党的欺骗性宣传，极大地增强了民众尤其是国统区的城市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同与行动支持。

（二）有力地推动了新政协的顺利召开

旧政协是在国民党主导下召开的，处处体现着政党之间的不平等。在中国共产党与民盟以及其他民主人士的据理力争下，会议才勉强通过了几个有利于民主的文件，但这些文件对于国民党政府而言丝毫没有约束力。会后，国民党特务以暴力对民主人士进行迫害，李公朴、闻一多等民主人士惨遭杀害。与旧政协完全不同，新政协是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平等参与的会议。在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中，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多次写信给民主人士，邀请他们参加新政协共谋建国大业。在“五一口号”发布的第二天，毛泽东就致信李济深和沈钧儒，信中写道：“此项会议的决定，必须求到会各主要民主党派及各人民团体的共同一致，并尽可能求得全体一致。”^[22]关于将民主人士安全地护送到解放区的工作，杨尚昆回忆道：“由周恩来同志亲自指挥，李克农和钱之光经办，先通过地下党的关系联络，然后组织秘密交通护送。”^[23]面对国民党起义将领，中国共产党没有表现出半点趾高气扬，毛泽东在给程潜等人的信中表达了邀请他们参加新政协的意向。此外，中国共产党还在新政协筹备期间组织召开或派代表参加了大大小小多场会议，目的就是齐心协力把新政协办好。

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推动下，新政协筹备工作的各项事业进展顺利。在这期间，中国共产党始终恪守求同存异的原则，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在重大问题上几乎没有分歧。关于一些细节问题，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也敢于表达内

心的真实想法，毫无保留地提出自己的建议，这充分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良好形象赢得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信任与支持。倘若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积极响应“五一口号”是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那么中国共产党在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中表现出的独特魅力就真正赢得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尊重和崇敬。中国共产党在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中呈现出的良好形象打消了少数民主人士原有的疑虑，有力地推动了新政协的顺利召开。

（三）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形象塑造提供历史镜鉴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以史为鉴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也是中国共产党从胜利不断走向胜利的重要密码。在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中，中国共产党塑造的良好形象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形象塑造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

第一，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永远是党的工作的最终评判者。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的试金石，也是衡量政党形象建设成效的客观依据。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指向，是中国共产党形象塑造的鲜明特征。”^[24]在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中，党的形象塑造与为人民服务的初心紧密相连。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将革命进行到底，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势力，以“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精神推翻国民党反动政权，勇于打破一个旧世界，是浴血奋战、百折不挠的革命者。时代在变，党的中心任务也在变，但不变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心。“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25]当前，党的形象塑造一定要从人民根本利益出发，党的形象一定要符合人民的期望，回应人民的关切，才能真正经得起时代和人民的检验。

第二，牢牢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充分发挥领导干部以身作则的作用。领导干部是

党的事业的骨干，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公众对党的总体印象、认知与评价。在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中，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等中共领导人在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打交道的过程中起到很好的模范带头作用。毛泽东专门安排人手抬爱国民主人士司徒美堂到香山双清别墅。由于没有现成的担架，就用毛泽东用过的一把藤椅，两边绑上两根木棍，做成一个简易的“轿子”。毛泽东再三嘱咐抬担架的年轻人要轻轻地抬，不要让担架晃动。周恩来在生活小事上也考虑得十分周到，特意告诉工作人员为民主人士准备好皮大衣、皮靴等御寒物资。林伯渠在同民主人士交往过程中做到推心置腹、以诚相见，耐心听取他们的意见，认真解决他们的疑惑。“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在群众中树立什么形象，有重要的导向作用。”^[26]因此，要以高标准和严要求管住管好“关键少数”，推动党的形象正面发展。抓住了“关键少数”也就抓住了党的形象建设的关键性因素，确保了党的形象塑造的成效。

第三，必须做好党的形象的顶层设计，围绕“我们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下真功夫。中国共产党要想走在时代前列，必须有科学的规划和明确的方针。新政协筹备期间，中国共产党主动识变应变求变，逐渐由革命党形象向执政党形象转变。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把自身定位为浴血奋战、百折不挠的革命党。毛泽东指出：“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27]解放战争即将迎来全面胜利之时，中国共产党即将执掌全国政权之际，中国共产党又把自身定位为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建设者。毛泽东指出：“尽一切可能用极大力量从事人民经济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同时恢复和发展人民的文化教育事业。”^[28]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要明确自身定位，做好形象尤其是应然形象的顶层设计，并朝着这个方向不懈奋斗。党的形象的顶层设计为党的形象塑造指明前进方向，确立行动指南，是党必须要着重思考的重大课题。

第四，必须不断创新党的形象传播路径，着力提升宣传能力与水平。“谁的传播手段先进、传播能力强大，谁的思想理念和价值观念就能广为流传”^[29]，谁就占据话语主导权。客观公正的传播能够反映真实的形象，恶意扭曲的传播就会歪曲形象。新政协筹备期间，毛泽东要求党报党刊及时宣传中央的路线和政策，强调“必须以严肃的科学的态度对待宣传工作”^[30]。中国共产党利用新华社等宣传机构来传播政治理念，并注重利用歌曲、绘画、戏剧等受群众欢迎的方式积极宣传政策理念，传播党的形象。新时代面对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党的形象传播工作更加重要。因此，要与时俱进地利用好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党的故事，并“建立系统的、强大的对外传播体系”^[31]，向外界展示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党的形象。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6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 2014-09-22(2).
- [2]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 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红岩革命纪念馆. 重庆谈判纪实 [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6: 306.
- [3][6][10][16][18][19][27][28] 毛泽东选集: 第四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1195、1379、1467、1463、1467、1485、1357、1466.
- [4]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22: 310.
- [5][22][30] 毛泽东文集: 第五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6: 114、90、101.
- [7][8][9][11] 杨建新, 石光树, 袁廷华. 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诞生记事暨资料选编 [G]. 北京: 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4: 216、251、258、285.
- [12] 政协全国委员会办公厅,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人民政协重要文献选编(上) [G].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9: 30.
- [13] 薄一波. 七十年奋斗与思考: 上卷 [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6: 523.
- [14][15] 杨胜群, 陈晋. 亲历者的记忆: 协商建国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 173、164.
- [1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书信选集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295.
- [20] 于安龙. 中国共产党讲述“延安故事”的经验与启示——基于延安时期与外国记者互动的视角 [J]. 党的文献, 2019(4): 113-120.
- [2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五辑第三编文化 [G].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9: 27.
- [23] 杨尚昆. 杨尚昆回忆录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264.
- [24] 张士海, 靳大力. 中国共产党形象塑造的百年历程、历史经验和时代要求 [J]. 江苏社会科学, 2021(4): 5.
- [25]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N]. 人民日报, 2021-11-17(1).
- [2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135.
- [29] 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317.
- [31] 文红玉, 顾巧. 中国共产党形象构建的百年历程与基本经验 [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21(11): 12.

责任编辑: 王天海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以自我革命 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三维审视

丁新改 孙 乐

摘要: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自我革命是我们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从逻辑维度审视,以党的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自觉、历史自觉、实践自觉综合作用的必然结果;从价值维度审视,以党的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是中国共产党践行初心使命的内在要求,唯有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才能切实担负起使命型政党的历史重任;从实践维度审视,以党的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必须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进而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

关键词:自我革命;历史周期率;长期执政;初心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1]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2]。从人民监督到党的自我革命,中国共产党始终怀有高度的忧患意识、秉持强烈的自我批判精神,居安思危、未雨绸缪,以长远的战略眼光去审慎思考如何维护执政安全、巩固长期执政地位。新时代,中国共

产党以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有着丰富的理论内涵和鲜明的实践导向,既是对“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3]重大时代课题的积极应答,又是对破解大党独有难题作出的战略安排,更是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

一、逻辑之维: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自觉、历史自觉和实践自觉综合作用的必然结果

党的自我革命被提升至跳出历史周期率第二

收稿日期:2024-07-27

作者简介:丁新改,中国矿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中国矿业大学基地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孙乐,中国矿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党的自我革命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实现机制研究”(23CKS01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个答案的新高度，既彰显了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创造性运用和发展的理论自觉，又彰显了对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来自我革命历程经验进行深刻总结的历史自觉，更彰显了对百年大党领导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自觉，是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综合作用的必然结果。

（一）理论逻辑：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创造性运用和发展的理论自觉

虽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明确提出过类似历史周期率的概念，也囿于时代和实践所限，无法在百年大党独有难题的语境下去思考如何维护执政安全、巩固长期执政地位等相关问题。但是，他们在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就如何通过自我革命来加强无产阶级政党建设，进而推动革命事业的发展作过诸多科学论述，为中国共产党以自我革命破解历史周期率难题奠定了理论基础。

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已明确提出：“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够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4]这句话内在地蕴含双重逻辑。其一，无产阶级只有在领导社会革命的实践中不断革除自身存在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以实现自我净化、自我扬弃、自我发展，才能肩负起时代和人民赋予的重任，这是一个“一体两面”的过程，革命的必要性同时体现在这内外两个维度之中。其二，无产阶级之所以要在革命中也把自己作为对象是由于“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5]仅是实现革命目标的第一步，其最终目的是，“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以“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6]，为了实现这个崇高而又艰巨的目标，无产阶级只有始终自觉地把批判的矛头对准自身，才能使其“强大到

足以取得胜利”^[7]。恩格斯在指导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建设过程中曾多次强调党要敢于进行自我批评。例如，他以凯泽尔事件为例，说明一个有前途的政党要敢于对党内“各种腐朽分子和好虚荣的分子”予以“公开拒绝承认”^[8]；又如，针对《哥达纲领批判》这篇文章在党内一些领导人中引发的异议，他指出，“无情的自我批评”^[9]并不会给敌人提供进攻党的武器，反而会使敌人看到党所具有的强大的内在力量。

十月革命后，列宁领导俄共（布）围绕如何通过加强执政党的建设来巩固新生政权、推动国家建设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并作出了诸多科学阐释。具体来看，内在地包括如下三个方面。一是严明党纪，执纪从严。1920年，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中指出，俄共（布）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始终注重严明党纪，如果没有“极严格的真正铁的纪律”和“整个工人阶级全心全意的拥护”，那么“别说把政权保持两年半，就是两个半月也保持不住”^[10]。二是充分发扬民主，注重批评与自我批评。列宁强调党员可以在直接参加苏维埃和党的工作实践的基础上提出实际的、明确的建议以“对党的缺点进行绝对必要的批评”^[11]，因为“共产党人的责任不是隐讳自己运动中的弱点，而是公开地批评这些弱点，以便迅速而彻底地克服它们”^[12]。三是善于整顿自己的队伍，以维护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列宁指出，“以健康的强有力的先进阶级作为依靠的执政党，要善于清洗自己的队伍”^[13]，并把开除党籍看作是一种特殊的“纯洁和锻炼先锋队的手段”^[14]。质言之，俄共（布）只有积极地展开自我批评，直面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并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实现自我纠错、自我净化、自我革新，把自身建设好、建设强，才能更好地肩负起领导社会革命的重任。

（二）历史逻辑：对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来自我革命历程经验进行深刻总结的历史自觉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

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将“坚持自我革命”^[15]确定为党百年奋斗的十条宝贵历史经验之一。这表明始终坚持自我革命是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其深深融贯于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全过程，也正因为如此，党得以历经百年风雨而始终葆有极其旺盛的生机活力。也就是说，以党的自我革命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这一论断的提出是有着深厚的实践基础和坚实的历史依据。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问题，尤其是党内存在的一部分党员在组织上入党而在思想上并未真正入党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提出要加强思想建党。1929年12月，毛泽东同志在古田会议上就党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等8个方面错误思想倾向的表现、来源和纠正方法进行了详细阐述，并且“号召同志们起来彻底地加以肃清”，以便能够担负起“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16]。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党内逐渐暴露出相当一部分党员干部贪污受贿、腐化堕落、投机倒把等问题，并且这些问题的发生与不法资本家的拉拢腐蚀有直接关联。对此，中共中央随即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三反”运动和“五反”斗争，彻底揭露、严格整肃各类不法分子和各种贪腐行为，以破“三害”、清“五毒”，极大教育了全党，有力巩固了党的执政根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以其敏锐的政治眼光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推动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拨乱反正，否定“两个凡是”的错误，促成了广泛而深刻的思想解放。在改革推进过程中对计划和市场的关系作出科学阐释，提出要克服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禁锢，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赋能改革开放。若非如此，“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1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也在新的历

史条件下生发出崭新的实践样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决心和勇气向党内的沉疴积弊、顽瘴痼疾开刀。持之以恒纠治党员干部身上的不正之风，培育良好的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坚定不移反对贪污腐败现象，重拳出击“打虎”“拍蝇”“猎狐”，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始终坚持用制度来管权管事管人，完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制机制，给权力套上制度的笼子，确保人民赋予的权力能够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大力整饬党内选人用人的不正之风，树立选人用人正确导向，多措并举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激励广大党员干部担当作为。正是新时代以来在管党治党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为党探寻出自我革命答案以摆脱历史周期率赋予了深厚底气和强大自信。

（三）实践逻辑：对百年大党领导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自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18]新征程上，党要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必须在自我革命中把自身锻造得更加坚强有力，从而有能力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目前，在党内仍然存在不少影响党的长期执政问题，例如，“一些党员、干部缺乏担当精神，斗争本领不强，实干精神不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现象仍较突出”^[19]，“党的建设特别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面临不少顽固性、多发性问题，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随时可能升级”^[20]。与此同时，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繁重而艰巨，各类矛盾风险挑战日益增多，给我们党治国理政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考验。这就迫切要求我们党坚持发扬自我革命精神，在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过程中不断增强执政本领。纵观国际共运史，世界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之所以会遭受重大挫折甚至走向灭亡，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执政党在治国理政的过程中忽视自

我革命，致使党的自身建设出现了严重问题而又不能及时有效地加以解决，久而久之，必然影响执政安全、消解执政之基，苏联解体、苏共灭亡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在镜鉴世界政党特别是苏共兴衰成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我们党更加深刻认识到以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紧迫性、必要性和重要性。概言之，中国共产党要想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始终作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并充分发挥好领航把舵的作用，就必须深入推进自我革命，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以维护执政安全、巩固长期执政地位。

二、价值之维：以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是中国共产党践行初心使命的内在要求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然而，“党的事业伟大而艰巨、任重而道远，有人走着走着就忘记了为什么出发，忘记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忘记了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从而丧失了共产党人的本色”^[21]，发生初心使命偏离的现象。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我们这样一个长期执政的党而言，没有比忘记初心使命、脱离群众更大的危险”^[22]，“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必须有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23]。质言之，自我革命就是要全面检视党内存在的与初心使命相背离的思想和行为并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予以纠偏，使党能够切实担负起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历史重任。

（一）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求中国共产党以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24]，这是隐藏在“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25]。也就是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在人民群众所从事的实践活动中，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对社会历史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26]，作为马克思主义政

党，中国共产党在建党百余年中始终坚持人民至上，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党所提出的发展目标都是紧紧围绕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带领人民历经千难万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从根本上说，也是为了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坚持将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推出一系列实质性惠民举措，全方位改善人民生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但也很朴素，归根结底就是让全体中国人都过上更好的日子。”^[27]

“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深厚基础和最大底气”^[28]，这意味着党必须要牢记初心使命，密切联系群众，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唯有如此，才能始终赢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护和支持，厚植党执政的群众基础，从而跳出历史周期率。一些党员干部仍然存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党性缺失等与坚持人民至上原则相悖的问题。对此，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就必须依靠自我革命加大力度解决这些突出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扎实推进自我革命。从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稳步有序开展系列党内集中学习教育，持续推进党风廉政建设，整治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以零容忍态度反腐惩恶，“老虎”“苍蝇”一起打，严厉整治群众身边的“微腐败”，打通反腐工作向基层延伸的“最后一公里”，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幸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29]党唯有在自我革命中把自身锻造成更加强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才能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提供最根本的政治保证。

(二) 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求中国共产党以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

中国共产党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崇高使命。百余年来，党团结带领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中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有力推动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带领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30]。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带领人民完成了三大改造，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31]。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带领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实现从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转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3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带领人民如期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明确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两步走”战略安排，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33]。纵观党的百余年奋斗史，党领导人民历经艰辛，成功探索出中国式现代化这条“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34]，以中国式现代化不断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这鲜明昭示着“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35]。与此同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面临众多风险挑战，任

重而道远。从国内来看，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深刻变化，改革发展稳定面临诸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明显增多，“黑天鹅”“灰犀牛”事件发生的可能性进一步加大，治国理政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从国际来看，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保护主义思潮抬头，国际经济循环面临格局重塑，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明显增加，世界经济陷入低迷、复苏乏力，国际政治局势严峻复杂，局部动荡和冲突时有发生，大量全球性问题亟待解决。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要担负起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历史责任，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36]也就是说，党唯有依靠自我革命把自身淬炼得更加坚强，才能有效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才能切实肩负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打铁还须自身硬，中国共产党唯有通过自我革命来维护、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以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方能肩负起领导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重任。

三、实践之维：中国共产党以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路径方法

新征程上，党必须向历史、向时代、向人民交上一份自我革命的优异答卷来破解历史周期率难题。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用政治武器把舵领航；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用思想武器赋能增效；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用制度武器提供保障。

(一) 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为中国共产党以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把舵领航

“政治方向是党生存发展第一位的问题，事关党的前途命运和事业兴衰成败。”^[37] 防范执政风险，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首要问题就是把准政治方向。新征程上，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动党的自我革命向纵深发展，进而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必须把准正确政治方向。

一是通过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来强化党的政治

领导，充分发挥好政治指南针作用。基于此，要引导全党坚定政治信念，提高政治觉悟，坚决拥护“两个确立”，始终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二是注重提升党员干部政治能力。广大党员干部要站稳政治立场、服从政治大局，在政治历练、专业训练和实践锻炼中不断增强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以防范政治危险、维护执政安全。

三是牢牢把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必须坚持和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压紧压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二）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为中国共产党以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赋能增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理论武装，每逢重大历史关头，都要用党的创新理论统一全党思想”^[38]。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从严管党治党的具体实践中，推动自我革命取得重大成就。但也要清醒认识到，党内存在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反弹回潮的老问题以及不断涌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都会影响甚至弱化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亟待深入推进自我革命中得到有效解决。新征程上，以思想上的团结统一为自我革命赋能增效，助力跳出历史周期率，必须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

一是推动党内教育常态化、长效化。“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39]，探索构建党内教育实践活动的长效机制，在制度化、规范化基础上实现党内教育的常态化、长效化，切实巩固好党内教育成果。

二是健全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的工作体系。在教育原则上注重普遍性与特殊性、全面性与针对性、时效性与长效性、理论深度与实践效度的辩证统一，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宣传教育工作走深走实，使党的创新理

论成为人民群众改造主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强大精神力量。

三是推进党的创新理论宣传教育形式的通俗化大众化。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要加强传播手段和话语方式创新，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40]，真正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

四是切实抓好检视整改工作。做到边学习、边对照、边检视、边整改，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推动理论学习在管党治党实践中扎实见效。

（三）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为中国共产党以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提供保障

制度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从严管党治党要靠思想教育，但归根结底要靠制度保障。新征程上，继续用好自我革命这一锐器，不断提高自我革命成效，必须要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

一是深化党内法规制度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改革创新精神补齐制度短板，加快形成覆盖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各方面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41]，实现依规治党的制度需求与党内法规的制度供给之间的动态平衡。

二是推动健全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发挥党内监督的引领性作用，督促党的中央组织、党委（党组）、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切实履行好自身监督职责，并将党内监督与国家机关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有机结合起来，促进各类监督主体协调配合，不断提高监督成效。

三是增强制度意识，强化制度执行。为此，要推动建立健全权威高效的自我革命制度执行机制，加强对制度执行的监督，严厉打击制度执行过程中的形式主义问题，克服制度执行的随意性和随机性，“防止硬约束变成‘橡皮筋’、‘长效’变成‘无效’”^[42]。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 埋头苦干、勇毅前行 [J]. 求是, 2022(1): 13.
- [2][18][19][20][26][29][35]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14、63、14、26、19、46、27-28.
- [3][15][39]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26、70、31.
- [4][5][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一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171、435、380.
- [7][9][2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四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592、614、255.
-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三十四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90.
- [10] 列宁全集: 第三十九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3-4.
- [11][12][13][14] 列宁选集: 第四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470-471、235、22、423.
- [16] 毛泽东文集: 第一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78.
- [17] 邓小平文选: 第二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143.
- [21] 习近平. 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 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 [J]. 求是, 2024(6): 4-5.
- [22]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四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2: 63.
- [23][27][40]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三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0: 531、134、313.
- [2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一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287.
- [28][42] 习近平.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二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407、304.
- [30][31][32][33]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4、5、6、7.
- [34] 习近平. 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 [J]. 求是, 2023(16): 4.
- [36] 习近平. 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J]. 求是, 2020(10): 11.
- [37]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 (2021 年版)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1: 133.
- [38] 习近平. 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J]. 求是, 2023(9): 4.
- [41] 中共中央办公厅法规局. 推进党内法规制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J]. 求是, 2020(2): 45.

责任编辑: 鲍跃华

数字统战价值功能、实践困境与策略选择研究

詹国辉 刘雨菲

摘要:数字统战作为一种新兴的统战工作形态,其核心在于将数字化技术深度融入统战工作的各个环节,进而强调对“人、物、场”的数据化再造,并进一步从统战工作场域拓展到更广泛的社会领域,从而提升大统战工作格局效能。数字统战有助于提升统战工作精准化水平、促进统战工作信息化发展、强化统战工作社会化动员能力、增强统战工作效能。当前,数字统战面临着技术、人才、机制、安全及参与度方面的实践困境,需要通过构建多维策略体系加以解决。

关键词:数字统战;数字赋能;信息技术;统战工作

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深刻变化和统战工作对象的日益多元化,传统的统战工作方式已难以满足新时代的需求。统战工作需要寻找新的切入点和突破口,以更好地团结和凝聚各方面的力量,服务于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1]。与此同时,随着全球数字化发展,数字经济已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数字经济规模持续扩大,对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渗透和影响日益加深。在这一背景下,统战工作也需要与时俱进,积极拥抱数字技术,推动数字统战的发展。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为数字统战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数字技术的广泛普及使得信息

传播更加迅速和便捷。统战部门可以利用这些平台,加强与统战工作对象的沟通和联系,扩大统战工作的覆盖面和影响力。同时,这些技术可以帮助统战部门更好地收集、分析和管理工作对象的信息,提高统战工作的精准度和效率。

近年来,一些地方统战部门在数字统战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和实践,取得了显著成效。例如,扬州市通过创新“网格+网络”的工作模式,打造数字统战平台,将数字化工作触角延伸至最基层的村(社区),有效提升了统战工作的科学化、精准化、智能化水平,使基层统战工作效率和管理服务能力得到大幅提高。常州市把党的领导贯

收稿日期:2024-08-05

作者简介:詹国辉,南京财经大学政府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基层治理与数字治理;刘雨菲,南京财经大学政府管理研究中心研究助理,研究方向为数字公共治理。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数字官僚主义’及其治理机制研究”(22CGL03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穿于网络人士统战工作各方面全过程，以“大网络、大统战”理念，架起统战部门联系网络人士的桥梁纽带。杭州市上城区通过开发数字统战平台系列产品，形成了“五个一”工作模式。攀枝花市西区通过打造“数字管家”等平台，实现了对统战工作对象的全域化管理。这些成功案例为数字统战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支撑。随着数字统战的深入发展，学术界和实务界对其关注度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学者和专家开始研究数字统战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数字统战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智力支持。

基于上述背景，本研究试图厘清数字统战的多维内涵表征，进一步阐述其内在的多重价值功能，并剖析其面临的多重实践困境，探讨全面推进数字统战的工作策略。

一、数字统战的内涵表征

数字统战是在数字社会环境下，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手段，以构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统战工作体系为目标的统战工作新形态。它不仅是对传统统战工作进行数字化改造，更是通过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对统战工作进行全方位、深层次的变革与创新。

（一）数字化技术的深度融合

这包括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对统战资源进行高效整合与优化配置，实现统战工作的精准化、智能化和高效化。通过构建数字统战平台，打破地域、时间限制，实现线上线下无缝对接，为统战成员提供更加便捷、个性化的服务。数字统战在继承统战工作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工作理念与方法。它更加注重以人为本，以服务统战成员为中心，通过个性化、精准化的服务，增强统战成员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同时，数字统战还强调开放共享、协同合作的理念，鼓励不同领域、不同背景的统战成员共同参与、共谋发展。

（二）“人、物、场”的数据化再造

一是“人”的数据化组织。数字统战通过在

线化手段，将分布于不同地区、领域、岗位的统战成员紧密联系起来，形成一张庞大的统战网络。在这一过程中，不仅能对统战成员的信息进行数字化管理，还可以通过数据分析，精准把握他们的思想动态、利益诉求，为统战工作提供有力支持。二是“物”的数字化转型。各种线下统战教育培训和相关活动，在数字统战模式下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力。同时，数字资源的丰富性和便捷性，可为统战成员提供更多样化的学习资源和交流平台。三是“场”的场景化再造。数字统战强调应用场景的再造，即通过网络化手段，将实体领域与虚拟空间、线上与线下相结合，以数字统战信息系统为枢纽，创造出更加友好、便捷、高效的应用场景。这不仅提升了统战工作的互动性和参与感，还促进了统战成员之间的紧密合作与资源共享。

（三）社会领域的拓展

数字统战在推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能够发挥积极作用，从而提升大统战工作格局整体效能。一是构建统战工作的网络协作平台和大数据平台等，有助于社会治理的信息化、智能化和精准化。二是引导统战工作对象参与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的繁荣。三是借助互联网平台和移动应用等，能够促进不同领域、不同行业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四是有利于政府与社会、政府与民众之间的良性互动与协作，特别是能为政府决策提供更加全面、准确的信息支持，有助于政府更好地把握社情民意、制定科学政策。

二、数字统战的价值功能

数字统战作为新时代统战工作的重要创新形态，其价值功能不仅体现在推动统战工作模式的深刻变革，而且体现在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一）提升统战工作的精准化水平

数字统战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有助于对统战成员信息进行全面采集、

深度分析和精准管理。通过构建统战工作对象的数据库,数字统战能够多维度、多层次地挖掘统战成员的数据足迹,更有助于形塑出精准化的统战工作模式^[2]。这种精准化的工作模式,打破了传统统战工作“一刀切”的不足,能够对不同领域、不同类型的统战工作对象进行差异化、精准化服务和管理。统战工作对象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积极的参与者,他们能够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兴趣,选择适合自己的统战活动和服务。

(二) 促进统战工作的信息化发展

数字统战打破了传统统战工作的时空限制,推动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新模式。通过构建数字统战平台,统战工作者可以随时随地与统战成员进行互动交流,及时传达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了解统战成员的意见和建议。同时,数字统战平台还集成了多种信息化工具和服务,如在线学习、远程会议、电子台账等,为统战成员提供了便捷高效的学习交流渠道和办公服务平台。他们可以通过手机、电脑等终端设备,随时随地获取相关统战信息,参与统战活动,享受统战服务。

(三) 强化统战工作的动员能力

数字统战充分利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等数字媒体渠道,能够构建广泛的社会化动员网络。通过发布统战工作信息、开展网络主题活动、引导网络舆论等方式,数字统战能够迅速得到广大统战成员和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支持^[3]。充分利用数字化平台,将统战工作与社会热点、民生问题紧密结合,引导统战成员关注社会、参与社会、服务社会。这种社会化动员能力,不仅有助于扩大统战工作的影响力和覆盖面,还能够引导统战成员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和志愿服务活动。此外,数字统战能够将统战工作的信息和声音传播到更广泛的地域和群体中,扩大统战工作的影响力和覆盖面,不仅能增强统战工作的渗透力和影响力,也可为构建大统战工作格局提供支撑。

(四) 增强统战工作的效能

数字统战通过大数据分析和智能推荐等技术

手段,为统战工作决策提供了更加全面、准确的信息支持。数据挖掘和分析有助于揭示统战工作的内在规律和趋势,能够更加准确地把握统战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制定出更加符合实际、更加有效的政策措施。同时,数字统战还能够实时了解统战工作进展情况和工作效率,为及时调整和优化工作策略提供数据支撑。这不仅能够增强统战工作的预见性和主动性,还有助于提高统战工作的整体效能和水平。此外,数字统战通过构建数字化的工作平台和信息系统,可实现信息的即时传递、自动整理和智能反馈,优化统战工作的信息传递机制,从而减少了人为错误和疏漏,提高统战工作效能。

综上所述,数字统战不仅能够促进统战工作的高质量发展,也能够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支撑和保障。在未来的发展中,数字统战将继续发挥其独特优势和价值功能,为构建更加和谐、稳定、繁荣的社会贡献力量。

三、数字统战的实践困境

数字统战作为统战工作的新形态,正逐步成为提升统战工作效能、拓宽统战工作领域的重要手段。但同时,数字统战在实践中也面临着诸多困境。

(一) 技术维度:应用滞后与应用深度不足

一是技术迭代迅速,但技术应用滞后。随着数字化技术的迅猛发展,新媒体和互联网技术不断更新换代,而数字统战在应用新技术方面往往存在一定滞后性。一方面,统战部门需要不断跟进新技术的发展,确保数字统战平台的先进性和实用性;另一方面,由于技术更新速度过快,统战部门在技术选型、系统升级等方面往往面临诸多挑战。二是技术应用深度不足。尽管许多统战部门已经建立了数字统战平台,但在实际应用中,技术应用的深度尚有不足。一些平台仅仅停留在信息发布、在线交流等浅层次应用上,未能充分发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潜力。如何深入挖掘数据价值,实现精准施策、智能决

策，是数字统战面临的又一挑战。

（二）人才维度：专业人才短缺与培训不足

一是复合型人才短缺。数字统战需要既懂统战业务又懂信息技术的复合型人才。然而，在实际工作中，这类人才往往供不应求。统战部门在招录和培养人才方面面临诸多困难，导致数字统战难以深入开展。二是培训机制不完善。针对现有统战工作者，缺乏系统的信息技术培训机制。部分统战工作者虽然具备丰富的统战经验，但对新技术、新平台的应用不够熟悉，难以胜任数字统战的要求。三是对相关人才的吸引力不足。由于数字统战涉及领域广泛、任务繁重，如何增强统战部门的吸引力，留住和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投身数字统战，是数字统战面临的现实问题。

（三）机制维度：机制不健全

一是协同机制不畅。数字统战需要多部门、多领域的协同配合。然而，在实践中，部门之间围绕数字统战的沟通、配合尚存在一些问题。此外，在数据共享方面，不同部门之间的数据标准不一、共享意愿不强，导致数据资源无法有效整合和利用^[4]。二是激励机制不完善。数字统战需要激发统战工作者和统战工作对象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如何建立完善的激励机制，如何激发统战工作者和统战工作对象的内在动力，是数字统战面临的又一问题。三是统战部门在人员编制和资源配置方面往往存在不足。一方面，统战部门的人员编制有限，难以满足日益繁重的工作需求；另一方面，资源配置的不均衡也使得一些基层统战部门在开展工作时面临诸多困难。

（四）安全维度：存在数据泄露与侵犯隐私风险

一是数据安全风险。数字统战涉及大量敏感数据的收集、存储和分析，数据安全风险不容忽视。一旦数据泄露或被非法利用，将对统战工作乃至国家安全造成不利影响。因此，如何加强数据安全防护，确保数据不被非法获取和利用，是数字统战面临的重要挑战。二是隐私保护问题。

在数字统战中，如何在收集和利用统战工作对象数据的同时，确保其个人隐私不受侵犯，是不容忽视的问题。

（五）参与维度：部分统战工作对象参与度不高与互动性不足

一是统战工作对象参与度不高。数字统战需要统战工作对象的积极参与和互动。然而，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宣传不到位、平台吸引力不足等原因，导致部分统战工作对象的参与度不高。二是互动性不足。数字统战平台需要具备良好的互动性，以便统战工作者与统战工作对象之间进行有效沟通。然而，部分数字统战平台功能单一、交流渠道不畅等问题导致统战工作者与统战工作对象之间难以形成有效的互动机制。三是参与渠道与方式有限。当前，线上渠道和方式的应用还不够广泛和深入，部分统战工作对象更多在线下参与各种活动，这不利于提高统战工作对象的参与度和互动性。

四、全面推进数字统战的策略

数字统战作为统战工作的新形态，对于提升统战工作效能、拓宽统战工作领域具有重要意义。然而，数字统战面临着多方面的实践困境，作用发挥不够充分，这需要从技术、人才、机制、安全等方面进一步加以应对。

（一）加强技术支撑，提升数字统战平台效能

数字统战离不开技术的支撑。一是持续跟进新技术发展。统战部门应建立技术跟踪机制，密切关注新媒体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动态，了解社交媒体、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及时将新技术应用于数字统战平台，确保平台不断更新。例如，利用不断发展的人工智能技术做好数据分析，为统战工作提供更精准的信息支持。二是推动数据共享与协同。制定统一的数据标准和共享协议，打破数据孤岛现象，实现不同部门、不同地区之间的数据互联互通。这有助于统战部门更全面地掌握统战工作对象的情况，制定更精准的统战策略^[5]。同时，加强数据安全技术研发，

确保数据在共享过程中的安全性和隐私性。例如，采用加密技术、访问控制等手段保护数据不被非法获取和利用。三是深化技术应用。挖掘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在数字统战中的应用潜力。例如，利用大数据技术进行舆情分析，及时了解统战工作对象的思想动态和诉求。开发更多实用性强、用户友好的功能模块，提高数字统战平台的吸引力和用户黏性。例如，开发在线交流、意见征集、投票调查等功能，方便统战工作对象与统战部门进行互动。

（二）培养专业人才，提升数字统战能力

数字统战需要既懂统战业务又懂信息技术的复合型人才。一是引进和培养复合型人才。统战部门可采取校园招聘、社会招聘等方式，加大复合型人才引进力度。二是建立内部培训机制。通过定期组织信息技术培训、业务交流等活动，提升现有统战工作者的信息技术素养和数字统战能力。三是加强团队建设。建立跨部门、跨领域的团队合作机制，共同推进数字统战。可以组建包含不同专业背景人员的团队，并加强不同团队之间的沟通与协作，共同研究和解决数字统战实践中的各种问题。

（三）健全体制机制，保障数字统战顺畅运行

数字统战的顺畅运行需要以健全的体制机制为保障。一是强化部门协同。进一步完善跨部门、跨地区的协同机制，明确各部门在数字统战中的职责和分工。二是优化资源配置。可以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和资源整合机制，推动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和资源整合；统筹规划数字统战的资源配置工作，确保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的有效投入；制定数字统战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明确资源配置的重点和方向。三是加强考核和评估。建立数字统战的考核评估体系，定期对相关工作进行考核和评估，确保各项任务得到有效落实。

（四）强化安全保障，确保数字统战稳健发展

数字统战涉及大量敏感数据和重要信息，安全保障至关重要。一是加强数据安全防护。建立

完善的数据安全管理制度和技术防护体系，确保数字统战平台的数据安全。可以制定数据安全管理制度和技术防护标准，明确数据安全的责任和要求。可以建立安全检查机制和风险评估体系，定期对数字统战平台进行安全检查和风险评估，及时发现和修补安全漏洞。二是保护统战工作对象的个人隐私。制定严格的隐私保护政策，明确个人信息收集、使用和保护的原则。可以通过开展隐私保护宣传活动、提供隐私保护技能培训等方式，提高统战工作对象的隐私保护意识和能力。三是积极应对网络安全威胁。建立健全网络安全应急响应机制，及时应对网络安全事件。可制定网络安全应急响应预案和处置流程，明确应急响应的责任和要求。不断加强与网络安全专业机构的合作与交流，共同提升数字统战的网络安全防护能力。

（五）提高参与度与互动性，增强数字统战实效

数字统战的实效取决于统战工作对象的参与和互动程度。一是拓展参与渠道和方式。开发多种线上参与渠道和方式，如移动应用、社交媒体等，方便统战工作对象随时随地参与相关活动。同时，积极推动线下活动与线上平台相结合，形成线上线下互动的良好氛围。二是增强平台互动性和用户黏性。设计丰富多样的互动功能，如在线交流、意见征集、投票调查等，提高统战工作对象在数字统战平台上的参与度和互动性。定期对数字统战平台进行优化和升级工作，提升用户满意度。三是激发统战工作对象参与热情。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线上活动、采取多样化的互动形式，激发统战工作对象的参与热情和积极性；通过提供线上咨询服务、帮助解决问题等方式，加强对统战工作对象的关怀和服务，增强其归属感和认同感。

参考文献：

[1] 李霞.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数字统战的功能、困境及进路

- [J].领导科学论坛, 2024(5): 119-122.
- [2] 王飞. 数智技术赋能统战工作发展透视 [J]. 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2): 23-33.
- [3] 翟阔, 金新. 新时代数字海外统战工作能力建设探析 [J].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3(5): 34-40.
- [4] 谢静. 数字统战与城市治理现代化——上海的实践与经验 [J]. 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1(4): 31-37.
- [5] 谢静. 数字统战前瞻: 新媒体环境下政治联盟形态变化与新型建构路径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1(3): 1-8.

责任编辑: 吉强

列宁统一战线思想的逻辑理路及当代价值

——基于《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考察

张 裕 黄建军

摘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是体现列宁统一战线思想的经典文本。它深刻论述了面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应当以铁的纪律加强对党的领导、争取群众等民主力量、利用一切条件发展间接同盟军等问题。本文基于对《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文本研究,对其中所蕴含的列宁统一战线思想的形成背景与内涵进行了梳理与分析。当下,列宁统一战线思想对于坚持党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完善新时代大统战工作格局和构建国际统一战线等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和实践引领价值。

关键词:统一战线;“左派”幼稚病;列宁;政治协商

列宁统一战线思想是列宁基于俄国革命和苏维埃建设实践,对马克思、恩格斯统一战线思想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集中体现在其所著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以下简称“《‘左派’幼稚病》”)。挖掘《“左派”幼稚病》中的统一战线思想,系统梳理其中蕴含的观点和策略,对于我们党在新时代做好统一战线工作依然具有重要意义。

一、《“左派”幼稚病》中列宁统一战线思想的形成背景

《“左派”幼稚病》所蕴含的统一战线思想内涵丰富而又深刻,意义重大而又长远。就其形成背景而言,主要包括理论继承、现实把握和实践

剖析三个方面。

(一)对马克思、恩格斯统一战线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在指导无产阶级解放斗争中,积累了初步的统一战线实践经验,并从理论上加以总结和概括,形成了关于统一战线的重要思想。列宁深受马克思、恩格斯统一战线思想的影响,通过本国化、具体化实践,最终形成了其自身的统一战线思想。

“马克思主义反对不注意革命策略、不研究革命艺术的蛮干,同样也反对那种临时应付,为迁就眼前事变而放弃原则的所谓灵活性。”^[1]马克思、恩格斯对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状况进行

收稿日期:2024-08-16

作者简介:张裕,江苏省委党校硕士研究生;黄建军,江苏省委党校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经典著作。

全面系统分析,认为在封建君主制国家中,无产阶级最大的敌人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更为落后的封建阶级。因此,他们意识到无产阶级必须同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形成联合。在分析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派的态度时,他们指出,“在德国,只要资产阶级采取革命的行动,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专制君主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资产阶级”^[2]。针对“左派”曲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不作任何妥协”,列宁评价他们,“这些无疑是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并且愿意做马克思主义者的人,竟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真理”^[3],并提出“利用各国资产阶级之间以及各个国家内资产阶级各个集团或各种类别之间利益上的一切对立”^[4]来争取同盟者的观点。列宁批判党内无视具体情况而一味拒绝妥协,这是他继承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最好的体现。19世纪中叶,信奉巴枯宁主义的分子大肆宣传“反权威”“无政府主义”等主张个人绝对自由的言论。在与各阶层形成统一战线的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清醒地意识到无产阶级政党保持自身独立性和决不放弃领导权的问题。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在《论权威》中论证了权威之于革命的必要性。他认为,“把权威原则说成是绝对坏的东西,而把自治原则说成是绝对好的东西,这是荒谬的”^[5]。列宁将马克思、恩格斯的政党理论同新的历史条件和俄国的社会环境相结合,强调要在统一战线中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放弃党的领导、无视党的纪律,“就等于完全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而有利于资产阶级”^[6]。布尔什维主义就是“在最坚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之上产生的”^[7]。

正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影响下,列宁建立布尔什维克,并于十月革命后将统一战线思想作为指导党的建设的理论来源和实践指引。

(二) 对国际形势与俄国国情的洞察和把握

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如何正确理解和处理统一战线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未亲身经历,也无法给出确切答案。列宁在掌握社会主义

国家政权的基础上,结合世界与俄国革命的实际情况,进一步发展了统一战线的内涵。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垄断资本主义逐渐取代了自由竞争。在这种情况下,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背离马克思主义,反对革命。他们对资产阶级民主抱有美好的幻想,大力宣扬议会道路,希望依靠普选制和议会斗争逐步走向社会主义,散播“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观点。“破产的第二国际正在死去,活活腐烂着”^[8],社会民主党完全变成资产阶级的附属品,已经称不上是无产阶级的先进组织了。1905年,布尔什维克对“议会”进行过抵抗。对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依靠普选以及走议会道路的主张,列宁认为,“善于放弃议会的斗争形式,有时是有益的,甚至是必要的”^[9],但布尔什维克抵制议会的斗争经验也不应被“盲目地、机械地、不加批判地搬用”^[10],要依据所面对的历史条件以及现实环境作出调整。当时的俄国处于国际争斗的中心,同其他帝国主义以及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存在诸多矛盾。沙皇不仅对本国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还试图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手段对外侵略,致使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与俄国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自1914年起,布尔什维克便提出战胜沙皇政府的主张,代表们“宁愿流放到西伯利亚,也不愿走可以登上资产阶级政府大臣宝座的道路”^[11]。

国际斗争与国内局势都引发列宁的思考。正是在俄国革命实践的催化及对国际帝国主义本质的深刻揭示中,列宁逐步发展和完善了统一战线的思想。

(三) 对各种“左”的错误思潮的剖析和批判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曾设想实行多党合作,然而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却结成反革命的联盟。在革命胜利的影响之下,国际共运蓬勃发展,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进入新阶段。但是,一些欧洲国家刚刚成立的共产党组织缺乏理论修养和政治锻炼,盲目照搬布尔什维克的斗争经验,犯了

“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尤其是他们不能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战略和策略思想，提出退出反动工会、抵制资产阶级议会、拒绝一切妥协等口号，还实行了脱离群众的战略和策略。在这一背景下，列宁在 1919 年和 1922 年多次强调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必须重视统一战线的战略和策略，他指出，

“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12]。为了教育、引导西欧各国共产党正确地汲取布尔什维克成功的历史经验，克服“左派”幼稚病，并通过总结俄国革命的经验，进一步巩固俄国无产阶级专政，顺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撰写了这一著作。

正是在革命实践过程中，列宁系统地批判了那些拒绝政党合作、坚持狭隘阶级立场的“左派”分子，体现了他不断发展的统一战线思想。

二、列宁统一战线思想的主要内核：以《“左派”幼稚病》为中心

列宁在 1920 年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所著的《“左派”幼稚病》对统一战线工作作出了深刻阐释。这部著作是列宁为克服无产阶级政党的“左派”幼稚病而写的，主要阐述统一战线重要性问题。与此同时，列宁对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纪律建设，以及党和群众的关系作了精辟论述，对各种不利于争取群众的错误观点进行了批判，提出利用一切条件争取同盟军的观点，形成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的战略、策略和原则。

（一）以铁的纪律保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

列宁在《“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布尔什维克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中，集中论述了“无产阶级实现无条件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13]，表明无产阶级政党施行严格的组织纪律对于革命活动取得胜利的极端重要性。

针对当时出现的“左派”倾向，列宁依据其领导布尔什维克斗争积累的经验，深刻阐述了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铁的组织纪律的重要性。

“如果我们党没有极严格的真正铁的纪律，如果我们党没有得到整个工人阶级全心全意的拥护……那么布尔什维克别说把政权保持两年半，就是两个半月也保持不住。”^[14]无产阶级政党需要有极严格的纪律，这不仅出于时刻防止资产阶级反扑的需要，而且还出于抵制和克服革命队伍中小资产阶级涣散性的需要。列宁又论述了如何维持、检验和加强政党的纪律，指出了三个重要的条件。第一，是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导；第二，是靠这一先锋队同劳动群众联系、接近；第三，是靠这个先锋队所实行的政治领导正确，靠它的政治战略和策略正确^[15]。由此，列宁认为，布尔什维克作为一个革命政党，没有上述三个条件就难以树立威望，难以成为一个先进的政党，想要建立纪律就成了“空谈、漂亮话、装模作样”。列宁又作了进一步思考，认为如此条件并非一蹴而就，需要同群众性的革命实践相联系才有可能形成。因此，维护无产阶级领导是必须的，“不进行需要坚持不懈、纪律严明、坚定不移、百折不挠和意志统一的战争，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16]。

在《“左派”幼稚病》中，列宁集中地、鲜明地阐述了严格的纪律对于无产阶级专政及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当时，一些“左派”共产党人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反对在党内实行严格的民主集中制和组织纪律。列宁认为，这是极其幼稚的，没有铁的纪律，无产阶级将成为一盘散沙，会丧失革命的战斗力的。

（二）以群众的力量支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

在《“左派”幼稚病》第五章，列宁继续分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阐明了领袖、政党、阶级、群众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也将群众等民主力量的作用上升到一个新高度。

列宁当时面对的是自称为“原则上的反对派”而事实上已显现出“左派”诸多特点的德国共产党人，他们拒绝争取群众力量，而纠结于“领袖专政”还是“群众专政”。德国共产党内反对派最为核心的观点是，“那里是领袖专政，这里是群众

专政”^[17]。列宁援引了《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联盟）的分裂》来表明这一反对派观点的实质。他认为，但凡参加过或者只是仔细观察过1903年以后布尔什维克的发展，就不会有这种“陈腔滥调”的疑问。他还给出了对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间的相互关系”最为经典且非常明了的解释——“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领袖来主持的”^[18]。在列宁看来，政党从阶级中产生，是本阶级政治力量的集中代表，无产阶级领袖从群众中产生，是人民群众政治方向的集中代表。而后，他又分析了德国共产党内反对派产生如此想法的原因，即“党的合法状态和不合法状态的迅速更替”使得领袖、政党、阶级、群众间的关系遭到破坏。因此，列宁旗帜鲜明地反对把领袖和群众对立起来，“什么领袖专政还是群众专政等等议论不是一派幼稚可笑的胡说，犹如争辩究竟是左脚还是右手对人更有用处一样”^[19]。列宁运用唯物史观深入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争取群众的理论与策略，并得出争取广大群众是无产阶级夺取斗争胜利必要条件的结论。“主张要充分保障少数派表达不同意见的民主权利，把认真听取并吸收他们的正确建议作为最大程度实现党的团结统一的重要途径。”^[20]

在《“左派”幼稚病》中，列宁尖锐地指出，“左派”要是“不学会把领袖和阶级、领袖和群众结成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它便不配拥有这种称号”^[21]。正确认识并处理好领袖、政党、阶级和群众之间的关系，不仅有利于政党回应群众期盼，而且有利于实现政党和群众的团结统一。

（三）以“妥协”的姿态发展一切间接可能的同盟军

列宁在《“左派”幼稚病》的第四章和第八章集中论述了“妥协”对于发展间接同盟军的重要性，批判了“左派”共产党人“不做任何妥协”的错误思想，再次强调了两种妥协的区别。

列宁所说的“间接的同盟军”，就是充分利用

敌人之间的矛盾，分化瓦解敌人。列宁回顾了布尔什维克内部两次同“左”倾的较大斗争，第二次便是1918年讨论关于可否容许某种“妥协”的问题。拉狄克、布哈林等人认为，对于无产阶级政党而言，从原则上就不允许有签订《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这种妥协行为。列宁却认为，“这种妥协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恰恰是必要的”^[22]。他又列举了在1914—1918年以及1918—1920年间，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德国的谢德曼派等同资产阶级实行妥协，来推卸他们实行叛卖所应负的责任，列宁认为这种妥协才是应当被唾弃的。列宁最终得出结论，政治家要善于辨别现实中存在的各种妥协以及分析每种妥协的具体条件。他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一种人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为的是要减少强盗所能加于的祸害和便于后来捕获、枪毙强盗；另一种人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为的是要入伙分赃”^[23]。因此，共产党人不能一概拒绝妥协，是否妥协要以妥协的性质为转移。只要对革命运动有益，共产党就可以实行机动、通融、妥协的办法。也就是说，在特定条件下，除了实现内部团结之外，也要学会运用这种迂回包围的策略，间接的同盟军对于无产阶级取得胜利也是十分重要的。“在特殊的、适当的时候善于‘妥协’是一种审时度势的艺术。”^[24]

在《“左派”幼稚病》中，列宁表明了无论是考虑到利用敌人内部矛盾争取同盟者的需要，还是考虑到极其复杂的阶级状况和庞大的中间阶层的存在，适度的妥协、争取一切间接的同盟军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来说都是必要的。

三、《“左派”幼稚病》中列宁统一战线思想的当代价值

“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实践运动中建构出完整的统一战线理论体系，直接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思想的理论基础和源泉。”^[25]《“左派”幼稚病》所阐释的保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发挥群众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中的作用和发展一切间接可能的同盟军等内容，是当下彰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最大优势、凝聚最大共识与最广泛的力量、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渊源之一。进入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迎来了新的机遇，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需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动摇，不断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加快构建国际统一战线。

（一）始终不渝坚持党的领导

毛泽东同志曾说，“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26]。纵观党的统一战线发展历程，可以说，“统一战线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才有正确的方向和光明的前途”^[27]。

2015年5月，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做好新形势下统战工作，必须掌握规律、坚持原则、讲究方法，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党的领导。”^[28]党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领导权问题是统一战线工作的根本问题。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在全球公共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西方错误社会思潮不断渗透，在意识形态等领域对我国统一战线工作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在多元价值冲突中，就需要“权威”扮演定盘星、掌舵者和主心骨的角色。“中国共产党坚持领导权是对百年来统一战线实践经验教训的总结，党的统一战线领导权思想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发展与丰富。”^[29]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同时也是统一战线工作百余年探索中得出的基本经验。“事实证明，全党对统一战线和统一战线工作的高度重视有力地促进了统一战线的巩固壮大，有力地推动了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进步。”^[30]

（二）完善新时代大统战工作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统战工作的本质要求是大团结大联合，解决的就是人心和力量问题。”^[31]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可以增强统一战线工作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确保统一战线工作的有效性。“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是将大统战战略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建设，提升统一战线治理效能。”^[32]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明确规定，构建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门牵头协调、有关方面各负其责的大统战工作格局。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强调“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坚持大统战工作格局不仅是加强党对统一战线工作全面领导的必然要求，也是发挥统一战线凝心聚力优势的重要保证。大统战工作格局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和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重要意义。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统战部门、有关方面要各负其责，加强统一战线成员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引导统一战线成员形成紧密团结的工作合力，促进各方面力量在统一战线框架内有机衔接、协同配合，形成团结奋斗、共谋发展的局面。同时，积极扩大统一战线范围，吸纳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到大统战工作中来，形成全方位、立体化的统一战线工作格局。

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要更好完善新时代大统战工作格局，确保统一战线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更好地发挥统一战线在社会稳定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三）加快构建国际统一战线

面对国际形势的复杂多变，构建国际统一战线对于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构建我国的话语体系、传播我国的基本理念进而维护世界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统一战线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环境所表现的样态有所不同。“新时代国际统一战线摒弃了旧式国际统一战线的对抗、结盟特质，使国家间的合作领域超出了政治与安全的传统领域。”^[33]当下，中国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中坚力量。可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国际统一战线的价值引领”^[34]。构建国际统一战线有利于对外展现负责

任大国的形象，提升国际影响力。

推进构建共同繁荣、促进国际和平的统一战线，不仅是出于增强文明凝聚力和号召力、促进人类文明共同发展的需要，更是为了防范国际环境新变化带来的风险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35]中国在构建国际统一战线的过程中，能够阐释中国式现代化和平发展理念，凝集广泛的国际共识，获得国际社会认可，形成国际合力，维护世界格局基本稳定、和平与发展的状态，营造文明共同繁荣的局面。

参考文献：

- [1] 艾新强，统一战线战略策略的通俗讲话：读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统一战线研究系列之二[J]. 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1)：25.
-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34.
- [3][4][6][7][9][10][11][12][13][14][15][16][17][18][19][21][22]
- [23] 列宁选集：第四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75、180、154、136、146、146、148、180、135、134-135、136、135、151、151、159、160、147、148.
-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76.
- [8] 列宁选集：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795.
- [20] 王进芬. 列宁维护党的集中统一的历史经验[J].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2(12)：72.
- [24] 俞敏. 列宁世界革命理论和路线的一次重要转折——兼评列宁的“妥协”策略和思想[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1)：63.
- [25] 徐琪. 不忘合作初心 重温统战经典——读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J].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2)：54.
- [26]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257.
- [27] 王邦佐.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9.
- [28][35] 习近平.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357、49.
- [29] 朱益飞. 论新时代坚持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权[J]. 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2(4)：30.
- [30] 杨荣国，张新平.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历史成就与基本经验[J].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1(11)：110-111.
- [31] 习近平.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608.
- [32] 张树华，李旭. 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高质量发展：格局、趋势与原则方向[J]. 当代中国史研究，2023(2)：104.
- [33] 曾向红，田嘉乐.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新时代国际统一战线的构建[J]. 统一战线学研究，2022(2)：133.
- [34] 莫岳云.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统一战线工作重要论述的精髓要义[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12)：52.

责任编辑：王天海

社会转型背景下党外知识分子工作的困境与创新路径研究

丁 叶

摘要:社会转型为党外知识分子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经济体制变革、社会结构变动、利益格局调整和思想观念变化都对党外知识分子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做好新时代党外知识分子工作,应当从工作理念、思想引导、体制机制、方式方法等方面推动党外知识分子工作转型发展。

关键词:社会转型;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困境;创新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外知识分子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强调党外知识分子工作是统一战线的基础性、战略性工作。做党外知识分子工作,不仅要增强责任意识、配强工作力量,还要改进工作方法^[1]。当前,统一战线内部构成更加复杂,知识分子大众化趋势更加明显,他们广泛分布于各领域各阶层,差异性明显增强。统一战线要适应社会环境和工作对象变化,创新工作思路理念、政策举措、方法手段,加强对统一战线广大成员的政治引领、工作覆盖,不断提升共识度、扩大团结面,把更多党外人士团结在党的周围,引导他们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

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党外知识分子工作面临着一些挑战。例如,当前的工作方式尚未完

全适应社会的发展需求和党外知识分子群体的变化,还需进一步提升工作效能,以满足新时代党的工作和统战工作的任务要求。此外,现有的工作机制在满足党外知识分子利益诉求、帮助他们成长发展方面仍存在不足。这些问题导致了思想政治引领的实效性不强、组织动员效果不佳以及统一战线对党外知识分子的吸引力不足,从而不利于充分发挥统战工作效能。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将其置于社会转型的宏观背景下进行深入研究,并探索有效的解决策略。

一、社会转型背景下党外知识分子工作面临的困境

(一)历史方位之困:革命年代、建设时期到新时代的变迁

党外知识分子是我国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

收稿日期:2024-09-08

作者简介:丁叶,江苏省委统战部干部,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理论江苏研究基地专家组成员。

分，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百年来，党的统一战线一直注重加强对党外知识分子的团结引领，党外知识分子工作的目标任务也在社会转型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变化，呈现出不同的历史样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对党外知识分子总体上采用团结、吸收的方式，以组织秘密活动和公开宣传相结合的形式引导党外知识分子为革命事业作贡献。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知识分子的政策经历了从“积极争取、改造学习”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再到曲折发展的阶段，党外知识分子工作的开展总体上是以教育、改造为主。改革开放后，党外知识分子工作得到恢复和发展，并开创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新局面，党外知识分子工作开始向科学化、制度化方向发展，党外知识分子工作的体制机制、政策制度逐渐完善。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就加强党外知识分子工作提出新理念新论断，强调党外知识分子工作是统一战线的基础性、战略性工作，要着力加强对党外知识分子的团结引领，实现“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党外知识分子工作不断调整职责定位，以适应不同历史时期形势任务的要求。但是，当前党外知识分子工作仍较多地沿用过去的工作理念和组织方法，对形势任务的变化仍缺乏规律性认知，客观存在工作内容不够充实、落地落实难的问题，处于凝聚力向心力不足、逐步被边缘化的尴尬境地。

（二）思想引领之困：引领对象、引领环境和引领主体的变化

从引领对象来看，新时代的党外知识分子受教育程度更高，价值理念从过去注重政治地位、社会地位转向更加注重自我价值实现、收入待遇和生活环境等“利己性因素”，从过去推崇儒家价值观念转向更加强调自我意识、竞争性，崇尚多元价值等。一些具有海外经历的党外知识分子还表现出强烈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多元化倾向，自我意识、权利意识较强，在遇到困惑时习惯照搬

西方理论和经验^[2]。这些都给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了极大挑战。从引领环境来看，社会转型中出现价值观念变迁与解构、外来文化和网络文化流行等现象，这使党外知识分子在政治态度上出现新的变化。他们在政治信任感和政治效能感上表现出明显的差序信任和内外差异，即对中央的信任程度远高于地方，对国家大政方针、公共政策高度关注，但对个人意见表达的效果预期并不乐观。从思想引领主体来看，部分基层统战干部不掌握做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开展工作时存在惯性思维和路径依赖，致使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引领性和实效性不强。

（三）方式方法之困：思想理念、工作手段存在不足

当前，部分党员干部依旧存在“重党内轻党外、重业务轻思想”和“一手硬、一手软”等思想倾向。一些基层干部对统战工作的全局性、战略性地位认识不足，认为统一战线服务中心工作的作用和效果有限，没有必要投入过多精力。一些部门的同志认为党外知识分子工作笼统庞杂，理不出头绪，抓不住重点，不如抓“硬任务”“硬指标”实在。同时，统战部门的一些干部对工作理解变样、实践走形^[3]，习惯于用机关方法、行政命令开展工作，忽略了团结引导的工作要求，导致和党外知识分子之间始终隔了一张皮，差了“最后一公里”。还有一些部门开展工作简单采用“开会、发文、部署、检查、评优、推广”的行政办公程序，导致工作流程固化，内部封闭循环。一些统战干部长期忙于行政性、事务性工作，把争取人心的政治工作做成了简单的事务性工作，不利于做好人的工作。

（四）政策依据之困：理论建构、顶层设计和制度载体有缺失

在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和知识分子政策双重话语体系影响之下，党外知识分子工作在社会转型期间必然要面临平衡协调两种话语体系的理论困境^[4]。在理论建构上，党外知识分子工作与知识

分子工作的政策立足点不同。知识分子工作处于知识分子政策的单一政治话语体系之中^[5]，而党外知识分子工作处于统一战线理论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双重话语体系之中。工作实践中，两种话语体系交叉频繁，其使用范畴、场景缺乏清晰界定，致使党外知识分子工作在理论构建上缺乏依据。在顶层设计上，为应对当前知识分子群体的日益分化和细化，统一战线按照“一个领域一个规范”的工作思路^[6]，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其中，涉及党外知识分子工作的政策，既有按照工作对象划分，如做好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出国和归国留学人员统战工作的规定；也有按照工作领域划分，如做好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国有企业党外知识分子工作的文件。但相关政策在内容上存在一定同质化倾向，缺乏必要的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在制度载体上，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重要的制度载体，担负着做好党外知识分子工作的任务，但在制度执行过程中，党外知识分子并未作为制度主体单独存在，而是分布在除中国共产党以外的其他 33 个界别主体之中。主体身份的缺失使党外知识分子工作在实践中缺乏必要的制度作为载体依托。

二、社会转型对党外知识分子工作产生影响的主要原因

(一) 经济体制深刻变革，党外知识分子的工作范围不断扩大

进入转型期之后，我国经济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党外知识分子工作政策不断调整，从提出着重做好有代表性、有影响的党外知识分子的工作，到强调党外知识分子工作是统一战线的基础性、战略性工作，深刻反映了党外知识分子工作战略地位的提升和职责范围的变化。一是群体规模的扩大。社会转型推动了高等教育的普及，知识分子群体规模从 20 世纪 50 年代的约 500 万人到 2021 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的 2.18 亿人^[7]。党外知识分子数量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不到 1000 万人发展到约 1.6 亿人。二是群体构成更加多元。过

去党外知识分子大多集中在高校、科研院所、国有企业等公有制单位和非生产性岗位。伴随着我国第三产业兴盛和资金型、技术型、信息型企业的发展壮大，非公有制经济单位及自主择业的党外知识分子数量大幅增加，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持续涌现。据 2021 年统计数据显示，全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总体数量达到 9100 万人，较 2016 年增幅达 26.3%^[8]。这些变化使党外知识分子工作的范围边界进一步扩大，工作难度不断加大。

(二) 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党外知识分子的组织方式亟待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从原有的“一元结构”逐步演变为“二元结构”，统战部门作为党外知识分子工作的组织主体，实践中普遍采用自上而下、纵向整合的单一组织和动员模式，组织程序呈现明显的层级性。社会结构转型后，“单位制”逐渐被打破，越来越多的“单位人”变为“社会人”，党外知识分子的社会分布更加广泛、流动性明显增大，群体成员之间形成“交往理性”和达成共识的难度也显著增大^[9]。同时，党外知识分子的自组织意识和能力增强，自发组织的各类协会、团体日益增多。这种情况下，统战部门如果沿用原来的组织动员模式，则很难适应当前形势任务的变化，在组织过程中难免有“看似千军万马，点名无人应答”的无力之感。例如，当前各级统战部门主要依靠建立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等平台载体将党外知识分子“组织起来”，但一些地方仅把建立组织作为工作目标，片面追求组织覆盖面，对组织的功能定位和作用发挥考虑不足。部分单位组织动员党外知识分子缺乏深度分析和整体规划，惯用行政思维，组织形式局限于传统的座谈交流、参观走访、联谊交友，导致组织活动反响平淡，凝聚力和吸引力不足。

(三) 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党外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意愿不断增强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结构变动，社会阶

层开始出现分化,社会利益结构随之发生重大调整^[10],这给党外知识分子工作带来了巨大挑战。党外知识分子作为精英群体,在经历社会生产生活的变革中,利益诉求也在发生变化。在政治参与途径上,当前党外知识分子主要是通过参与多党合作制度、协商民主制度等制度框架下的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等政治活动表达诉求。一方面,在现有的政治体制下,仅有少数的党外知识分子有机会进行制度化、程序性的政治参与。另一方面,据2021年相关抽样问卷调查显示,82.8%的党外知识分子都表示比较关心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希望参与各类国家和社会事务,95.0%的党外知识分子认为,“在追求自身幸福的同时,也有责任为国家的发展作出贡献”。这种较强的参与热情与现实参与不足之间存在明显落差,致使部分党外知识分子政治参与热情下降,出现政治冷漠和情感疏离的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一些党外知识分子以非理性、情绪化的方式表达诉求。同时,在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的时代要求下,党外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机制仍缺乏清晰规划,党外知识分子的基层政治参与还处于“顺其自然”的发展阶段,与新形势下民主政治建设的要求还存在较大差距。

(四) 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党外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更加多元

随着利益结构的调整,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经历了显著的变化。长期以来,“信仰和情怀”都是统一战线团结凝聚党外知识分子的一面有力旗帜,在组织动员、思想引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在生存和发展的压力下,知识分子群体的价值观念发生深刻变化,趋向现实化、人本化和多元化,呈现出责任感与功利性并存的特点。一方面,他们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展现出浓厚的家国情怀、积极向上的思想状态和追求主流的价值观念。另一方面,他们也表现出更强的自主意识,普遍更加关注自身的成长发展,更在乎个人的利益得失。一些党外知识分子功利性较

强,把政治参与当作自己的社交机会,为交友或办事提供便利^[11]。他们与统战部门的互动往往是基于能否从中获得个人成长和进步的好处。因此,以“信仰和情怀”为驱动的传统工作模式跟当下注重价值利益的党外知识分子的现实需求之间产生错位,导致统一战线对党外知识分子的组织动员和团结引领效果打折扣。因此,重新定义和构建党外知识分子工作的核心价值体系,使统战工作能够满足党外知识分子的价值需求,并与其生存发展的愿望相契合,是当下亟待解决的重要现实问题。

三、党外知识分子工作创新发展路径

(一) 转变工作理念,增强党外知识分子工作的时代性

社会转型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社会进步的重要体现。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外知识分子工作应直面社会转型带来的难题与挑战,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指导,转变工作理念,找准适应党外知识分子群体新变化的切入点,与时俱进地开展工作。

首先,应强化理论研究,准确把握党外知识分子的新变化,明确工作对象范围、理顺工作关系。从理论上阐释清楚具备民主党派成员身份的知识分子、无党派人士和党外知识分子的关系,明确“做谁的工作”的问题。

其次,应深化对新时代统战工作规律的认识,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既强化“同”的理念,团结引领广大党外知识分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强大合力;也重视社会转型带来的党外知识分子群体中的“异”,妥善解决社会资源在党外知识分子群体中的配置问题,及时化解矛盾,避免冲突。

最后,应从开展党外知识分子工作的现实要求出发,明确工作职能定位,明确“怎么做”的问题。一是充分发挥统一战线团结凝聚党外知识分子的政治作用,坚持不断巩固和扩大党的执政

基础,团结引领广大党外知识分子将个人成长发展与国家命运结合起来,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贡献智慧和力量。二是充分发挥统一战线助力党外知识分子成长成才的服务作用,关心党外知识分子的成长进步,关注党外知识分子的现实需求,维护党外知识分子的合法权益,为他们提供实实在在的帮助,把相关统战性团体打造成党外知识分子想得、找得到、靠得住的组织。三是充分发挥统一战线枢纽型社会组织的作用,围绕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和党外知识分子成长发展需要,为党外知识分子表达诉求、成长成才提供平台和机会。四是充分发挥统一战线整合各类资源力量的平台作用。社会转型背景下,统一战线应当以“站在体制面向社会”的生存逻辑开展工作,在巩固和提升自身政治资源、组织网络资源的同时,进一步整合利用体制资源和社会资源,以适应新形势下党外知识分子工作的现实需求。

(二) 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增强党外知识分子工作的精准性

思想政治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鲜明特色和突出政治优势,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12]。做好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工作是党对统战工作的要求,也是统一战线的使命任务。在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思潮混杂、不同思想观点交织,党外知识分子观念复杂多变,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更加艰巨。因此,必须因时而进、因势而变,切实推进思想政治工作的转型。

首先,要注重思想政治引领的整体性。在大统战工作格局下树立“大思政”工作理念,将思想政治工作渗透到党外知识分子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充分发挥统战部门的主体作用,组织党外知识分子加强对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以及统一战线发展史的学习,加深对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解和认知,增进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

情感认同。

其次,要提升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立足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加强对党外知识分子的研究,对不同职业类型、年龄层次、文化水平的党外知识分子进行分类分析,科学研判这一群体的内部构成和特征,有针对性地组织学习、开展活动,从而切实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精准性。

再次,要注重思想政治工作的前瞻性。探索建立党外知识分子思想动态研判机制,主动了解他们对社会热点的看法和态度,及时分析他们的思想动态和思想变化趋势,有针对性地进行思想引导和价值引领。

最后,要积极创新思想政治工作平台。充分发挥各类学术组织、联谊组织、行业协会团结凝聚作用,寻求思想政治工作与学术兴趣、文化兴趣、文体活动的连接点和契合点,积极打造凝聚党外知识分子思想共识的新平台^[13]。

(三) 完善体制机制,增强党外知识分子工作的协同性

党外知识分子工作是全党的工作,是一项持久的人心工程和严肃的政治任务。面对社会转型带来的复杂局面,要进一步完善体制机制,以建立和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要求为出发点,切实增强党外知识分子工作的协同性。

在工作体系上,将党外知识分子工作纳入大统战工作格局进行统筹和部署,从顶层设计上对涉及党外知识分子工作的政策进行梳理整合,消除工作条块之间的壁垒,制定党外知识分子工作整体规划,确保统一战线各领域工作间的相互协调和有机统一。

在工作实践上,构建各部门之间合作交流、互联互通的大统战工作格局。在决策层面,统战部门要明确开展党外知识分子工作的主要职责,牵头理顺工作关系、畅通工作渠道,制定符合实际、切实可行的政策文件及工作制度,避免党外知识分子工作的虚化、弱化。在协调层面,相关部门要在统战工作领导小组的指导下互联互通,

配合落实各项政策部署,促进党外知识分子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发展。在落实层面,负责党外知识分子工作具体职能的部门应当转变工作思路,除继续做好党外知识分子中重点人士的日常联系工作外,应把更多的精力转移到政策研究和组织动员更多力量做好党外知识分子工作上来。

在队伍建设上,推动党外知识分子人才库建设。建立统战部门牵头、有关部门协同的信息联动机制,形成党外知识分子电子档案和动态信息数据库。通过数据分析和信息管理,打造一支结构合理、分布均衡、衔接有序的党外知识分子队伍。同时,完善党外知识分子的发现培养和使用机制。把握党外知识分子的行业特点,按照专家学者、行政领导、管理技术等类型加以分类,有针对性地进行政治能力和业务能力培养,把他们推荐到重要岗位或选派到实践一线进行锻炼。着力推动培养和使用环节的有机衔接,帮助他们提升代表性和影响力,更好地发挥他们对所联系群众的团结引领作用。

在参与机制上,在畅通有序政治参与渠道的同时,积极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充分利用自身智力优势不断丰富、完善基层协商民主形式,提升基层政权公共决策和公共管理的科学性、民主性及合法性^[14]。同时,适当扩大社会参与,鼓励支持党外知识分子结合专业特长,开展国情考察、专题调研和社会服务,围绕党委政府中心工作、经济社会发展难题建言献策。

(四) 推动方式方法转型,增强党外知识分子工作的针对性

随着社会的转型,传统工作方式在应对党外知识分子工作的新变化、新需求方面存在不足。因此,必须打破路径依赖,创新方式方法,进一步加强对党外知识分子的吸引力、感召力和组织力,切实增强党外知识分子工作的实效性。

首先,注重人文关怀。进入新时代,党中央提出了“政治上充分信任,思想上主动引导、工作上创造条件,生活上关心照顾”的基本政策,

为做好党外知识分子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15]。要充分尊重党外知识分子的个体差异,包容他们的理念认识和独立性。对于他们的不当观点,要科学区分是属于一般性认识错误还是属于政治原则错误。在价值观方面进行教育引导的同时,也要在工作生活方面关心照顾,营造充满人文关怀的良好氛围。

其次,注重沟通交流。统战部门要推动定期走访制度的落实,最大限度地汇聚党外知识分子的人心力量。要经常与党外知识分子代表人士交心谈心,拉近感情距离,进而增强思想政治认同。同时,开展工作要因地制宜、因人而异、灵活变通,面对不同文化背景、政治诉求、利益需要的党外知识分子采用不同的交往方式,使开展的工作能关注其所好、满足其所需。

最后,创新组织方法。一方面,充分发挥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的平台载体作用,强化其在组织党外知识分子开展学习教育、建言献策、社会服务、联谊交友等方面的作用。另一方面,树立“以需求为导向”的工作理念,将统战工作与党外知识分子的个人发展有机融合,通过建立工作室、创新平台、专业协会等方式,将党外知识分子组织起来,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同时,注重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将党外知识分子工作嵌入基层党建工作,从顶层设计上明确基层党组织开展统战工作的职责和任务,不断充实和壮大统战工作队伍,推进统战工作不断向基层下沉。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 巩固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广泛力量支持 [N]. 人民日报, 2015-05-21(1).
- [2] 张东升, 祁丽. 中国梦视阈下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思想引领研究 [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19(6): 65.
- [3] 毕俪文, 王文浩, 刘海军. 新时代党外知识分子队伍

- 的变化趋势及统战工作对策 [J]. 决策与信息, 2022(6): 22.
- [4] 田荣. 建党百年来党外知识分子政策的历史演进与经验启示 [J]. 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2(3): 42.
- [5] 樊士博, 张可辉. 内与外: 统一战线理论与知识分子政策的分割与互动 [J]. 天津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7(2): 24.
- [6] 徐军. 新时代党外知识分子工作基本问题研究 [J]. 湖北行政学院学报, 2018(3): 40.
- [7]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 [EB/OL]. (2021-05-13). https://www.gov.cn/guoqing/2021-05/13/content_5606149.htm.
- [8] 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共识汇聚力量——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实现创新发展呈现崭新局面 [N]. 光明日报, 2022-07-26(2).
- [9] 孙冲亚, 何祥林. 国家治理现代化场域中的统一战线: 功能、挑战及其进路 [J]. 理论月刊, 2021(7): 54.
- [10] 李艳霞. 转型期阶级阶层关系变化中的党外知识分子工作探析 [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2(4): 62.
- [11] 任清华. 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政治参与的双重性及其对策 [J]. 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4(6): 33-37.
- [12]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 [N]. 人民日报, 2021-07-13(1).
- [13] 韩彩英. 论党外代表人士个性化培养的基本举措——以党外高级知识分子为例 [J]. 理论月刊, 2017(5): 85.
- [14] 徐行, 陈永国. 党外知识分子参与协商民主的现实挑战及克服路径 [J]. 江西社会科学, 2016(8): 195.
- [15] 祝远娟. 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知识分子工作的政策变迁及启示 [J]. 中国人事科学, 2024(3): 52.

责任编辑: 徐晓婷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的人民性意蕴论析

刘 东

摘要: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的内在品格。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的生成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三重逻辑,深刻蕴含了人民至上的政治立场,生动体现了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核心旨要,系统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路。通过这三个维度的逻辑铺展,初步建构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人民性的逻辑框架,为深刻理解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积极发展新质生产力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视角。

关键词:习近平;新质生产力;人民性;高质量发展

“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1]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理论成果,不仅是习近平总书记坚持从我国现阶段的客观实际出发,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新时代中国经济

改革实践紧密结合的光辉典范,更是习近平总书记基于实践逻辑对高质量发展进行创新性思考而提出的创造性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的提出、发展及其实践的整体性过程中蕴含着鲜明的人民性意涵,生动彰显着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开拓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

一、坚持人民至上立场:新质生产力理论提出的政治遵循

人民至上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根本立场的集中体现,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同时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的根

收稿日期:2024-08-02

作者简介:刘东,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式现代化和乡村振兴。

基金项目:本文系安徽省高峰学科建设项目“抗战时期安徽红色文艺与中国共产党形象塑造研究”(2023AH03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本政治遵循和基本行动指南。

（一）人民至上是马克思主义根本立场的集中体现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明确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2]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主体地位，强调了人民群众作为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是推动社会变革和发展的根本动力。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璀璨文明成果，无论是科学技术、文化艺术还是全新的社会制度，都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 and 伟大实践。一方面，人民群众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更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广大劳动人民在生产实践中不断创造出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人民群众也是文化、艺术、科技等领域的创造者，为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另一方面，人民的实践是社会改革和创新的动力源泉。因此，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当社会制度和政策能够充分反映人民的意愿和需求，人民的权益得到了充分保障，才能真正激发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迸发出巨大的创新动力和实践伟力，社会也才能不断得以自我完善和赓续发展。

人民至上是马克思主义根本立场的集中体现，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和价值追求。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理论、人民的理论、实践的理论 and 开放的理论，自诞生以来就始终坚持“人”的基本立场，以关心人民生存发展、关注人类共同命运、追求社会公平正义为己任，其根本立场一言蔽之就是“人民”的立场。首先，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广大劳动人民所遭受的剥削和压迫，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3]，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是资本家对工人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并最终导致工人

阶级的贫困化和异化。这一论断表达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批判，以及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其次，也正是工人阶级不堪剥削和压迫而持续进行英勇斗争，才推动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持续变革，为社会主义的产生奠定了重要基础。最后，马克思、恩格斯还指出，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消除阶级对立和剥削，建立一个人人平等、自由、和谐的美好社会。这一崇高目标将人民的幸福和解放作为最高理想，充分体现了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同时也为工人阶级争取自身权益、实现解放指明了前进方向，体现了对广大人民群众及其根本利益的深切关注。

总之，人民立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念，贯穿于其理论发展与当代实践的全过程，是马克思主义根本立场的鲜明表达，也是其区别于其他理论学说的显著标志。

（二）人民至上是党的性质和根本宗旨的具体彰显

坚持人民至上的立场是由党的性质和宗旨所决定的，也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鲜明本质特征和显著政治优势，这就决定了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必须要一以贯之地坚守人民立场，“一切工作部署和工作安排，都应该来自人民，都应该为人民利益而制定和实施”^[4]，须臾不可偏离。

在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充分彰显了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这一根本性立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广泛发动人民群众，赢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华民族获得独立，人民得以解放。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战胜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诸多挑战，取得了伟大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成就。党领导人民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两弹一星”的成功研制、大庆油田的开发建设、红旗渠

的修建等伟大成就，无不凝聚着党和人民团结奋斗、为了人民利益而不懈努力的伟大精神。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继续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再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充分体现了党对人民根本利益的深刻关切和对人民主体地位的始终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砥砺奋进，接力实施了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区域协调发展等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让改革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深刻彰显了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使命和担当。由此可见，人民至上这一鲜明的政治立场，贯穿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奋斗历程，是党能够始终在复杂多变的时代环境中不断发展壮大、取得辉煌成就的关键所在。

总而言之，人民至上的立场由党的性质和宗旨所决定，这是党百余年奋斗历程的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旗帜鲜明地表明了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人民，党必须始终把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必须时刻倾听人民的呼声，必须紧密联系人民群众，必须将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最高实践准则。因此，一以贯之地坚持人民至上立场，既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内在要求和必然选择，也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鲜明标识和永恒追求，更是党不断取得胜利和实现伟大奋斗目标的根本保障和力量源泉。只有始终坚定不移地坚持人民至上的政治立场，党才能永远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团结带领人民在全面深化改革、系统设计推进改革的新征程中不断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和创造新的伟大成就。

（三）人民至上是新质生产力理念提出的基本立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5]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这就决定了党必须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这也是新质生产力理念提出的根本政治逻辑。

人民至上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的基本立场。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重大转化。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快缩小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从解决温饱问题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不断增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了民生的重要性，指出当前必须解决好最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并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要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6]，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始终坚持以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解决广大人民群众的现实困难，以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实践目标，生动体现了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深刻彰显了人民至上的基本立场。

人民性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的鲜明特征，并贯穿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理论体系的始终。首先，新质生产力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新质生产力是指以创新驱动、科技引领、绿色发展等为特征，融合了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的生产力新质态。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增长点，实现了不同领域、不同产业之间的深度融合，注重资源的高效利用，

追求经济发展与生态平衡的协调统一。其次，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旨在满足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需要。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优美的生态环境、丰富的精神文化等方面的需求日益增加。发展新质生产力能够提供更多优质的产品，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现实需求，使人民能够享受到更便捷、高效的服务，让人民有更多的获得感。最后，人民群众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践主体。广大人民群众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直接参与者和主要推动者，他们的智慧和创造力是新质生产力不断发展和创新创造的动力源泉。同时，新质生产力带来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能够惠及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最大可能减少贫富差距，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二、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价值旨归

为民造福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价值指向，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的基本价值追求。以人民利益为重、以人民所需为念，坚决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让人民群众在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是我们党开展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人民性的内在要求，更是新时代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根本价值旨趣。

（一）提升人民在新质生产力创新发展中的获得感

新时代党的价值追求和奋斗目标，就是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当前正值全面深化改革新局面奋展之际，我们党的改革目标和奋斗初心就是要坚决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切实“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7]，真正做到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强调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与之更加适应的生产关系，

实现新质生产力关涉的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重组和升级，从而实现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发展目标，即通过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过程中催生出新产业、新模式和新动能，从而增进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现实福祉，开创我国改革开放的全新局面。

马克思明确指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8]党的百年历程也充分表明，只有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价值追求的最前面，始终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和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才能增强党执政的群众基础，才能永葆党的生机与活力。新时代提出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体制机制，旨在通过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以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从发展的基础维度来解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问题和现实发展需求。特别是当下广大人民群众十分关注的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环境、养老等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提出以生产力创新为发展切入口，通过以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的创新目标引领，实现新质生产力与民生工作的多维耦合，让人民群众能够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看得着变化、见得着成效、得得到实惠，能够在发展中切切实实地增强获得感。

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强调了人民根本利益的至上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的人民性强调党和国家在制定发展政策、规划发展战略、推动改革任务的过程中，都应当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置于首要目标，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基本考量。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应该是为了满足人民需求、保障人民权益、实现人民幸福，让人民生活水平能够获得实质性的提高，从而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只有这样，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才能具有正确的方向和持久的动力，才能真正有助于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人民的共同富裕。

总而言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强调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始终坚持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这一价值导向和行动准则，要在实际工作中，始终围绕人民的现实需求和切身利益，通过实际行动和有效举措，让人民群众在各个方面都能体会到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给生活带来的改变和进步，继而切实拥有更多的获得感。

（二）增强人民在新质生产力实践成效中的幸福感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高度自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更是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这就决定了我们党要时刻“接受人民的监督”^[9]，由人民群众来监督权力的实施和评判改革的成效。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所蕴含的人民性特征，不仅体现在党和国家关于新质生产力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人民，始终坚持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发展目标，更深刻体现在新质生产力创新实践的最终成效应由人民来检验和评判。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以实绩实效和人民群众满意度检验改革”^[10]。党的工作是否符合人民的客观需求，是否能够解决人民的实际问题，能否给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只有人民群众最有发言权。因此，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否实现了对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维护，主要还是看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否始终体现人民意愿，是否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具体来说，发展新质生产力相关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如果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认可，能切实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那它就是成功的；反之，如果没有达到预期的发展目标或者没有给人民带来真真切切的利益，那就需要进行总结和进一步创新方式方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将人民群众当作发展的最终评判者，充分体现了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及对人民

主体地位的尊重。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的人民性，还体现在增强人民在社会发展中的幸福感。幸福感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涵盖了物质生活的富足、精神生活的丰富、社会秩序的稳定有序和生态环境的和谐美丽等诸多方面。但是，如何评价发展成效以及评判的主体等问题，基于不同的立场便会有不同的认知和对应的标准。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旗帜鲜明地表示，党和国家的所有工作成效的评判，“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人民权益是否真正得到了保障”^[11]，明确强调了人民不仅是服务的对象，更是参与党和国家各项决策、战略实施和权力监督的重要主体。将人民当作我们党的工作的最终评判者，其重大意义体现为人民在党和国家事务中的积极作用。人民群众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参与政策的制定、社会治理、公共事务等，能够更好地反映人民的现实利益和基本诉求，让人民参与讨论和决策，能够激发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也能够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使决策更加符合实际发展情况和人民的迫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将人民当作我们党的工作的最终评判者，深刻表明了党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将人民的满意度和幸福感作为新质生产力发展工作的根本衡量标准。

总之，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是否真正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人民的亲身感受和评价是最真实、最权威的标尺。只有始终以人民的评判为标准，让人民参与到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中，才能真正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才能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才能深刻彰显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的人民性意蕴。

（三）保障人民在新质生产力发展利益中的安全感

如何切实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扎实做好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守护者，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若干要求。首先，党员干部要诚心当“学生”。习近平总书记教育广大党员干部，“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带着问题学，拜人民为师，做到干中学、学中干，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学用相长”^[12]。因此，新时代在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要真心舍掉为官的“架子”，潜心走好群众的“路线”，细心融入群众的“圈子”，耐心了解人民的“实际”，虚心当好人民的“学生”，全心解决人民的“难题”，真正以平常心做好广大人民群众所关心的寻常事。其次，党员干部要甘心做公仆。广大党员干部要心中时刻装着老百姓，甘做人民的“孺子牛”。历史也证明，只有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坚决维护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充分保障人民群众的安全感，才能永葆党的生机与活力。最后，党员干部要真心做“守护者”。党员干部要做好人民利益的守护者，就需要做好人民群众的“贴心人”，就意味着要深入了解人民群众的客观需求、现实关切和发展期望。这就要求党员干部不仅在工作上与群众接触，更要在情感上贴近群众，真心实意地为他们着想，以真诚、热情和关怀的态度对待人民群众，真正做到心系群众、热爱群众、服务群众。

新时代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既要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发展目标来增强人民的获得感，也要将人民群众当作发展的最终评判者以增强人民的幸福感，更需要党员干部做好人民利益的“守护者”以增强人民的安全感。一方面，广大党员干部要积极主动地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切实解决他们在生活、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另一方面，党员干部还要大力营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让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法治的保障下，享有平等的机会和权利，感受到社会的公正与公平，从而极大地提升安全感。

综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强调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既要求积极将

新质生产力发展与社会建设有机结合，大力促进新技术和经济民生深度融合，让新质生产力给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不断把为人民造福的事业推向前进。同时，也强调党员干部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要在情感上与人民群众相通，做到“心贴心”，积极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真正做到惠民生、解民忧、造民福，多办大事、实事、好事，从而坚定人民群众永远跟党走的信仰信念信心。

三、做到以人民为中心：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实践主体

历史反复证明，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实践主体，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体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是新时代党领导经济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概括，并始终坚持站在人民立场上推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真正做到以人民为中心，确保人民群众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主体地位，系统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路。

（一）尊重人民主体地位，激发人民的发展主体性

纵观历史长河，马克思总结出历史发展的本质，并明确指出创造这一切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13]。因此，人民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不仅在于其是历史的创造者，更在于其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在社会历史发展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作为持续实践和能动创新的“客观实在”者，人民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积极的参与者、主导者和创造者，在历史的发展长河里不断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与前进。同时，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人民还是价值的主体，是理论连接实践的价值承载者和实践能动者，更是社会实践活动中价值实现的主要践行者，充分彰显着其本身所蕴含着的巨大主体实践性。因此，新时代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科学指导下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只有充分激发人民的主体性，发挥人民在发展新质生产力过程中的主体作用，才能创

造出更加丰富的、更具新质态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在发展新质生产力过程中尊重人民主体地位，激发人民的主体性，前提是要以人民为主体从理论价值导向的角度用党的最新理论成果教育人民、引领人民和团结人民，做到在发展新质生产力过程中与人民同向而行、同频同振，引导人民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这一科学理论指导实践创新。新时代需要新理论，新理论指导新实践。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要通过在全社会树立共同的价值导向和实践目标，从而更好地推动社会发展与伟大变革，最终以新发展模式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也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根本价值所在。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强调在发展新质生产力过程中尊重人民主体地位，激发人民的主体性。人民主体性的激发关键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主体，从实践主体角度对“相信谁”和“依靠谁”这一关键问题做出科学回答。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做到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14]。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体现了尊重人民主体地位，锚定了应该“相信谁”的价值逻辑。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国家的主人。在我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人民群众在农村改革、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能动作用，他们用生动的实践探索和创新创造为改革开放的成功提供了坚实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正是源于改革开放以来对人民群众理论知识、实践经验的系统性归纳和规律性凝练。另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强调尊重人民主体地位，指出了应该“依靠谁”的实践逻辑。新质生产力涉及科技创新、数字化、绿色发展等众多前沿领域，涵盖了新兴的技术、创新的生产方式和新的产业形态。人民群众在历史的发

展长河里不断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与前进，并创造了巨大的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蕴含着无穷的智慧和创造力，当他们的主体性被激发，就能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实践动力。面对新的生产力质态和发展需求，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强调尊重人民主体地位，旨在充分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推动新质生产力的高质量发展。

人民在社会发展中的核心地位和关键作用，决定了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激发人民主体性是相辅相成的。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充分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强调激发人民在发展新质生产力过程中的主体性，体现了对人民力量的重视和依靠。新时代也只有充分尊重人民主体地位，激发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主体性，才能更好地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创新创造，实现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二）坚持共享发展理念，重视人民的客观能动性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共享理念“体现的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15]。坚持共享发展理念，归根结底就是要重视人民群众在实践中的能动性和获得感的统一，真正实现发展目标为谁、发展实践靠谁、发展成果给谁的统一，即实现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人民。当然，以人民为中心的共享发展理念绝不是“抽象的、玄奥的概念”，而是能够让人民从发展中切实受益，并使其“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16]。因此，在发展新质生产力过程中坚持共享发展理念，重视人民的能动性，就意味着发展的成果不是为了少数人，而是要惠及全体人民。这种“共享”不仅包括物质财富的共享，还涵盖了机会、资源、服务等多方面的公平享有，要坚持共享发展理念，通过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断把“蛋糕”做大，再进一步将“蛋糕”分对分好，真正让最广大人民群众拥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充分

彰显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人民性的实践旨趣所在。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更是实践创新的主体。新质生产力指的是依靠创新、科技进步、绿色发展等方式形成的具有更高质量和效益的生产力。实现“新”的关键在人，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对于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至关重要。“任何一个代表着未来的政党的第一个任务，都是说服大多数人民相信其纲领和策略的正确。”^[17]因此，激发人民群众在发展新质生产力过程中的能动性，凸显人民在推动生产力创新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关键是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智慧创新、劳动奉献、需求引领和社会参与等方面的积极影响，通过建立开放的创新平台和合作机制，鼓励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到新质生产力的创新实践中。当人民群众能够在新质生产力的实践创新中获得相应的发展成果，即实现自身的利益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时，他们参与发展实践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就会被充分激发。因此，在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既要注重贯彻公平共享理念，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公平的发展环境和更多的发展机会，又要充分发挥人民主体作用的重要思想，让每个人都能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和实现自己的价值，从而充分发挥其能动性，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新质生产力可持续的、高质量的发展。

总的来说，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强调了共享发展与激发人民能动性之间辩证统一的关系。只有坚持共享理念，才能充分激发人民的能动性，而人民能动性的发挥又将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果实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共享，从而形成良性循环，促进经济社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挥人民的实践创新性

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体，社会一切实践活动

都离不开人民。人民通过实践活动不断改造客观世界，同时也改造着主观世界，蕴含着巨大的创新潜力和实践智慧。新质生产力涉及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等，需要丰富的创新思维和持续的创新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强调激发人民群众在发展新质生产力过程中的创新性，体现了人民在推动生产力发展方面的重要意义和实践能动性，特别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方面的关键作用和巨大潜力。

创新是经济社会的核心密码，也是新时代加快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动力。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必须明确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不竭源泉，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新导向，激发人民在发展新质生产力过程中的创新力。从实践创新的目标维度来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不单讲“生产力”，也强调“新”，即要持续创新，只有创新才能进一步推动“生产力”的向前发展；更强调“质”，即高质量，只有高质量、高水平的创新，才能推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才能为人民群众提供更为丰富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保障，这样人民才能幸福安居，社会方能和谐稳定。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是以人民为中心的重要理论，并非止步于思想维度，而是充分体现在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的各个环节。只有各行各业都在为人民服务上用力，才能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实在各项具体工作实践中，从而充分彰显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人民性的鲜明特征。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18]。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关键是要实现创“新”、引“智”和成“链”的统一，即大力推动科技创新、要素更新和产业迭新。首先，要做到用“新”突破，向“新”求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强调要大力推动科学技术取得革命性突破，真正实现科技

由“关键变量”向新质生产力“最大增量”的转化，从而放大“创新矢量”，激活“发展增量”，使其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强力支撑。其次，要推动以“智”提质，向“智”而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强调要极力促进生产要素实现创新性配置，实现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化、数字资源向数字资本的转化和富余资本向耐心资本的转化。最后，要实现“链”动集群，更“新”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强调要全力推动产业开展深度化升级，实现产业的绿色化、数字化转型，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培育未来产业作为重要抓手，构建高质量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更安全更有韧性产业链，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实践主体，共同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使其成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总的来说，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实践导向，旨在激发人民群众在发展新质生产力过程中的创新性，充分发挥人民的主体作用和创新精神以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快速形成和发展，实现生产力的高质量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从更广泛的层面来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强调激发人民群众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中的创新性，有助于实现经济的转型升级，提高国家的竞争力，最终让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进一步提升人民在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四、结语

新时代呼唤新理论，新理论引领新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又一新的重要理论成果，其科学内涵也在实践中得到了不断深化、拓展和丰富，并于理论、价值、实践三重维度彰显着深刻的人民性意蕴。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紧密结合的重大理论创

新，深刻蕴含着人民至上的政治立场，生动体现了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根本旨归，系统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路，有着鲜明的马克思主义人民性特征。另一方面，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鲜明的品格，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更是集中体现了这一理论品格和实践精神。马克思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9]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本质要求，一以贯之地坚守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切成果由人民共享的价值理念，旨在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其中所展现出的人民立场、人民信念、人民力量和人民情怀，贯穿于新质生产力重要理念提出、发展和实践的始终，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人民性意蕴。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J]. 求是, 2024(11): 6.
- [2][1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287、295.
-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四十二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 777.
- [4][11][15][16] 习近平.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272、212、439、438.
- [5] 习近平.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二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37.
- [6][7][10][14][18]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N]. 人民日报, 2024-07-22(1)、(1)、(1)、(1)、(1).
-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187.

[9]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二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7: 294.

[12]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4: 406.

[17] 列宁全集: 第三十四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154.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三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2: 207.

责任编辑: 王天海

中国共产党实现党内团结的逻辑与特征

——基于党的三个历史决议的考察

曹彬

摘要: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通过的三个历史决议是党实现党内团结的纲领性文件,其本身也是彰显党内团结的重要标志。回顾三个历史决议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始终将党内团结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基石,并在历史 and 实践中形成了实现党内团结的逻辑和特征。坚持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维护党内团结的必然要求,必须以有组织的思想理论学习奠定团结的思想基础。原则性的党内斗争是实现党内团结的重要手段,是推动党与时俱进、永葆先进的武器。民主集中制原则实现广泛的党内民主和严明的组织纪律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实现党内团结提供了制度保障。以自我革命巩固完善党内团结的机制体制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维护党内团结也始终是党进行自我革命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党内团结;逻辑与特征;三个历史决议;自我革命

世界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和实践表明,党内团结是无产阶级政党实现其阶级意志的重要前提,想要保持长期执政就必须保持党的团结,避免在思想、政治、纪律等各方面的涣散。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党内团结问题是党的领导人思考的核心问题之一。目前,学界也有一些对党内团结问题的研究,主要是围绕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的党内团结思想进行阐述。例如,代玉启、李基礼对刘少奇的党内团结思想进行了研究和阐释^[1],秦义、许斗则回顾了列宁党内团结思想的内涵和当代价值^[2]。也有学者结合具有重大意义的历

史事件进行分析。例如,武星等聚焦中共七大这一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事件探究中国共产党实现党内团结的要领^[3]。还有学者从宏观角度阐述党内团结的重要性。例如,郭祎指出,实现党的团结和统一是党的生命,也是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关键^[4];王可卿等对中国共产党四个历史时期实现团结的传统进行回顾^[5]。此外,有学者从党的自我革命的视角出发阐释党内团结的重要性。例如,王建华认为维护党内团结是党实现自我革命的前置性条件,是实现无产阶级意志的必然要求^[6]。可以说,不少专家学者已经围绕党内团结这一重

收稿日期:2024-08-15

作者简介:曹彬,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专项“《中共党史党建学手册》编研”(2024JZDZ03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要议题进行了研究。然而,审视已有的研究,党内团结作为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和自我革命的重要一环,其重要程度和得到的关注仍不成比例,并且缺少围绕经典文本进行研究的成果。

回顾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与实践中的重要文献,三个历史决议是不可忽略的经典文本。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第一个历史决议”)、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第二个历史决议”)、2021年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第三个历史决议”),无一例外都强调了党内团结的重要性,号召全党上下共同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毋庸置疑地成为中国共产党维护党内团结的纲领性文件。基于此,本文从中国共产党组织维度出发,以三个历史决议作为主要考察对象,梳理中国共产党关于维护党内团结思想的逻辑和特征。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是实现党内团结的前提条件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首先体现在思想理论上的先进性。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团结,也必然是在科学理论指导下实现的。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建立早期,党员尚不能用马克思主义指导革命,认为“没有统一集中的政党也可以过得去”^[7],这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面对这样的问题,要建立集中的政党,“就必须克服各个地方机关的这种落后性、守旧心理和狭隘的实际主义”^[8]。因此,列宁创办《真理报》,在俄国各个社会民主主义组织中进行了早期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在这个过程中,《真理报》作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载体,“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9],为实现党的团结统一奠定了较为重要的思想基础。

中国共产党显然从前者的实践中认识到这一

点,故此,三个历史决议都将党的思想认识问题放在极为重要的位置。第一个历史决议在回顾党的历史、总结党的经验时指出,这个时期“一切政治上、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都是从思想上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而来,都是从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而来”^[10]。换言之,党在这个时期实现团结最大的阻碍在于思想路线上的错误。而第二个历史决议出台时,全党正处在思想混乱的特殊时期,正确评价毛泽东思想的地位成了第二个历史决议面临的首要问题。因此,第二个历史决议使用了巨大的篇幅,以专门的一个篇章、五个部分论述“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11],使全党上下统一思想认识,并号召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下”^[12],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党的历史和现实实践表明,坚持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实现党内团结的前提条件,它给予全党统一的精神力量源泉,正如第三个历史决议所说,“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强国的根本指导思想”^[13]。

(一)有组织的理论学习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

列宁认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14],一针见血地指出理论学习的重要性。而在革命早期,中国共产党缺乏系统的理论学习,在思想路线上出现分歧,导致历次错误尤其是第三次“左”倾错误给党的事业带来严重的损失。要认识并纠正思想路线上的错误,实现党的团结,就必须开展党内教育,进行有组织的理论学习。1938年9月至11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毛泽东号召“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15],党内兴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高潮。1940年1月,党中央发出《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要求领导干部进行学习,“并保持其持久性与经常性”^[16]。毛泽东专门主持编辑了《两条路线》等学习资料,深化了全党的学习效果。最终,

通过逐步覆盖全党的整风运动，“把党的历史问题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17]，使全党尤其是高级干部有了统一的思想基础。正是有了这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学习，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才能够说，“我们党较之过去是空前地团结了”^[18]，这次大会“是团结的模范”^[19]。可见，要将党锻造成一个团结一致、能够领导中国人民的政党，必须以有组织的马克思主义学习，系统性地帮助全党总结经验、统一思想，从而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为促成全党的大团结提供基础。

有组织的理论学习，要求全党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邓小平在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发出“解放思想，事实就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号召。在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不仅要求全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20]，也要求实事求是地看待毛泽东思想。他指出：“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21]实事求是，是党的理论不断创新发展的根本原因。从毛泽东思想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都是全党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中，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也是在思想上使党团结一致的重要依托。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更加重视党内的理论学习教育，开展了深入、全面的学习活动^[22]。党的二十大之后，党中央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组织全党与时俱进地对党的创新理论进行深入学习，从思想理论层面统一认识，也使得党的理论教育更加组织化、系统化。这种集中的学习教育活动是推动全党上下用科学理论武装自身、不断推动理论进步的重要过程，也是使党员形成共同的理想信念、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实现团结的重要方式。

（二）全党的共同理想信念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必然结果

第三个历史决议指出，“党历来强调，全党必须做到理想信念坚定”^[23]。只有坚定理想信念，“无论敌人如何强大、道路如何艰险、挑战如何严峻，党总是绝不畏惧、绝不退缩，不怕牺牲、百折不挠”^[24]。可见，理想信念作为一种精神力量，能够将全党凝聚起来。中国共产党正是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中，使全党形成共同理想信念。

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决不抛弃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25]。革命理想高于天，没有理想信念的支撑，就没有拧成一股绳的条件。古田会议前的一段时期，红四军因为秋收起义的伤亡和连续行军，革命士气低落，毛泽东通过演讲、座谈等方式将马克思主义散播到党员战士的心中，逐步将马克思主义融入早期的革命实践之中，在此过程中坚定了党员赢得革命胜利的理想信念，并以此实现“思想建党、政治建军”，使党指导的军队具备了团结的思想基础。

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继续强调理想信念的作用。邓小平认为，要保证安定团结，就一定要使全党拥有崇高的理想信念，根植“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26]。同时，邓小平还指出，这种理想信念的形成，不需要多么高的教育程度和物质基础，而是生发于党员党性的锤炼，是无产阶级政党在锤炼党员党性过程中必须重视的核心和关键。理想信念会随着党在不同阶段的历史使命而与时俱进，在革命时期是赢得革命，在新中国成立后是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只有全党上下都在这种扎根于理论认识和自身锤炼而生发的共同信仰之中，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才有光明的前景。全党上下，乃至全国人民，有共同的根本利益和崇高理想，才“能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27]。

党的十八大以来，理想信念有了更加重要的

意义。第三个历史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28]，“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也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29]。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30]。骨头缺了钙，就没有了硬度，中国共产党人没有了理想信念就会失去骨气。可见，共同的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团结凝聚、不分彼此的重要依托，是实现党的团结的重要基础。

二、坚持原则性斗争是实现党内团结的重要手段

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始终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生命线。毋庸置疑，中国共产党是善于以马克思主义凝聚党员的。但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出发，“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31]，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规模巨大的动态组织，党的思想不可能无时无刻保持一致，“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32]。因此，恩格斯指出：“大国的任何工人政党，只有在内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33]毛泽东同样认为：“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34]坚持马克思主义是实现党内团结的基础与前提，但一旦党内有人在思想上脱离了马克思主义，“那就失去了我们团结的基础，就必须进行不调和的但是适当的斗争，来克服这些错误倾向，才能达到我们的团结”^[35]。可见，党内团结有赖于正确、必要的党内斗争来维护。

“不调和的但是适当的斗争”是原则上的斗争。党内斗争不是没有限度的完全对立，而是坚持原则底线的斗争。换言之，党内斗争的目标不是消灭一切持有不同意见的对象，而是通过妥协或不妥协的斗争统一思想和行为，从而实现党内团结。这种斗争要求站在党的立场和利益上进行，如果出于个人利益或派别利益提出问题，那么就失去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也势必造成党的

对立甚至分裂，成为敌我间不择手段的斗争。

（一）原则性斗争要求坚持问题导向

毛泽东在对第一个历史决议草案作说明时指出：“错误不是少数人的问题，写几个名字很容易，但问题不在他们几个人。如果简单地处理几个人，不总结历史经验，就会像过去陈独秀犯了错误以后党还继续犯错误一样。”^[36]反陈独秀错误路线与反李立三错误路线是革命时期两次较大的斗争，但正因为没有遵循问题导向，没有对错误发生的思想问题作彻底的讨论，而单纯地对犯错误的人作出严重的结论，使得党内仍然没有彻底地解决问题。因此，为了使党内更深入地了解大革命失败以来党内存在的问题，第一个历史决议专门从政治、军事、组织、思想作出深入的分析，从根源上弄清楚问题。但在涉及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等犯错误的个体时，第一个历史决议仍以“同志”相称，以宽大政策将他们团结到正确的方向上，充分展现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斗争方针。毛泽东也专门指出：“凡是政治上过去犯过错误现在改正了的同志，我们都要团结他们，全党要像决议上所说的团结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这个支票是要兑现的。”^[37]可见，党内斗争要坚持问题导向。从这一点出发，斗争的对象不应是某些人和群体，而应是党内的矛盾和问题。

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专门指出，“集体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之一”^[38]，强调集体领导的重要性和个人专断的危害性，展现出了党对这一时期党内问题的客观认识，也得到了全党上下的认同。在此基础上，第二个历史决议反思了党内斗争扩大化，失去原则底线的问题，“党内同志间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也被当作是所谓修正主义路线的表现或所谓路线斗争的表现，使党内关系日益紧张化”^[39]。第二个历史决议“全稿未用或极少用错误路线、机会主义路线、路线斗争和路线等术语”^[40]，党内也逐步创造出了健康的党内政治生态，

形成了具有原则性、合理化的党内斗争形式，不断促进党的团结统一。

可以说，前两个历史决议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坚持以问题导向解决党的问题，而对特定个体或群体的具体责任却并不过分强调，更有利于犯了错误的同志正确认识自身错误，并重新团结在一起，因此，第三个历史决议称其“在重大历史关头统一了全党思想和行动”，“其基本论述和结论至今仍然适用”^[41]。

（二）原则性斗争要求科学合理的斗争方式

以党内斗争实现党内团结，必然要求科学合理的斗争方式。第一个历史决议指出，要“在党内发扬民主，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42]，这正是一种科学的斗争方式。1940年12月，总政治部专门发出指示，强调干部团结的问题。一定程度上，用党的纪律执行和组织手段是完全必要的，但还是要依靠教育的方式，耐心说服一切愿意纠正的人，“正确的自我批评，则不仅有助于团结，亦有助于领导威信之巩固与提高”^[43]。刘少奇也指出，党内斗争的目的，归根结底“是为了教育党与教育犯了错误的同志”，“所以党内斗争本身是一种党内不可缺少的教育”^[44]。

“团结—批评—团结”是无产阶级政党进行党内斗争的重要方式。批评与自我批评首先是从团结出发的，这是一切党内斗争的立足点，即“立场”。只有自己首先站在正确的立场上，才能通过批评纠正他人的错误，只有自己是出于维护党内团结的目的，才能用好党内斗争的武器。其次，要以团结的立场对问题进行分析。分析就要批评，既要批评别人，也要批评自己，要抓住错误的中心，给予客观的明确的解释，才能切实用好“批评”这一工具。批评的最终目的是纠正错误、解决问题，以此形成进一步的党内团结，决不能陷入无止境的“为了批评而批评”之中。

党内斗争也会在必要时转变为非党内的斗争。“党是靠清洗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而巩固起来的。”^[45]当党员变质，就需要被清除出去，

这样才能维护党内部的纯洁，提供实现党内团结的必要环境。改革开放以后，党仍然面临着诸多风险挑战。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指出党存在的问题已经“严重侵蚀党的思想道德基础，严重破坏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46]。面对这些突出问题，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强调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一方面，继续以问题为导向，“澄清对党史上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更好正本清源”^[47]。另一方面，加强对党员干部的要求，将一批从未真正树立理想信念、对党的团结产生威胁和危害的分子清除出党，以强有力的党内斗争，“坚决战胜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48]，从而巩固党的团结统一。

三、坚持民主集中制是实现党内团结的制度保障

无产阶级政党是由党员根据特定的原则组织起来的具有统一意志的有机体，呈现着领导与被领导的组织艺术，而这种艺术就是民主集中制。回顾三个历史决议，可以发现它们都从不同角度出发，强调民主集中制对党的团结的重要性。从实践维度出发，第一个历史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坚持严格的民主集中制，既反对不正当地限制民主，也反对不正当地限制集中”^[49]。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凝聚党和人民，在革命时期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保障。从历史维度出发，第二个历史决议吸取历史教训，切中要害，要求“必须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加强各级国家机关的建设”^[50]，“必须把我们党建设成为具有健全的民主集中制的党”^[51]，用词之严格体现了民主集中制对党的重要意义。从理论维度出发，第三个历史决议指出，只有“坚持民主集中制，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才能“确保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向前进”^[52]。可见，民主集中制原则是保证党内团结的重要法宝，是塑造团结统一组织的根本原则。换言之，民主集中制作为

无产阶级政党最根本的组织原则和鲜明特征，是维护党的统一、实现团结的保障。

（一）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要求广泛的党内民主

广泛的党内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所必然要宣扬的。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中国共产党要发挥其积极性，“有赖于党内生活制度的民主化，没有或缺乏民主生活，是不能达到发挥积极性之目的”^[53]。“扩大党内民主，是巩固党与发展党的必要步骤，是使党在伟大斗争中生动活跃，胜任愉快，生长新的力量，突破战争难关的有用的与重要的武器。”^[54]这充分说明，对于无产阶级政党来讲，民主是党的力量源泉之一，也为党的团结统一奠定了党内群众基础。

三个历史决议的产生过程充分彰显了党内的广泛民主。在对七大党章的修改说明中，邓小平指出：“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干部中对于党的历史、党的路线的深入的、自由的检讨，是党内民主的切实发挥，因而充分地准备了我们这次大会。”^[55]第一个历史决议正是这场民主讨论的成果之一。起草过程中，任弼时、胡乔木、张闻天等人先后参加修改，毛泽东更是前后修改七次。在第二次修改后，毛泽东还专门批语，“请邀周、朱、洛、刘（此时如在）看一下”^[56]，“编号发给四十多个同志，再集他们座谈一次”^[57]。在第三次修改稿上，除了毛泽东的修改笔记外，还有其他领导同志的修改笔记，这充分说明“历史决议的起草过程稿凝聚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集体智慧”^[58]。毛泽东也指出这一份决议案如果“不是大家提意见，就写不这样完备”^[59]。可见，第一个历史决议的产生过程是党广泛发扬民主的过程。

1979年底，中共中央决定由邓小平、胡耀邦主持，胡乔木等组织实施，着手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在对起草工作进行布置时，胡乔木就列出了一批同志，指出要向他们咨询、征求意见。1980年9月，决议初稿完成，首先提交给各省、

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讨论，许多写法有了很大的变化^[60]。随后组织的“四千人大会”，又形成了一次规模空前的大讨论，“讨论期间共发快报88期，简报938期”^[61]。因此，胡乔木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指出，“这个决议稿是二十几位同志一年多的集体作品”，“稿中的重要观点很难分清是哪一位提出的，许多是中央领导同志提出的，许多是四千人讨论时和三月三十一日向五十二位同志征求意见时提出的”^[62]。这样大规模的民主讨论，实现了决策前的充分民主，在党内形成了极好的反响。

第三个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更是以空前的规模征求意见建议。2021年4月，第三个历史决议起草小组成立后不久，中央就发出《关于对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重点研究全面总结党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问题征求意见的通知》，面向党内外征求意见建议。拟定的决议征求意见稿又于9月6日下发，在党内一定范围内征求意见，同时征求党内部分老同志意见，还专门听取了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意见。经过反复推敲，“对决议稿作出547处修改，充分反映了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意见和建议”^[63]。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召开之后，根据与会人员提出的意见建议再次作出22处修改，这体现了贯彻党内民主的优良传统。

（二）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要求严格的党内纪律

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要求广泛的党内民主，但并不是说能够按照个体的兴趣和见解，在党内进行任意的、自由的活动，党的民主制势必要在集中指导下开展。三个历史决议都是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上形成的，其形成的过程就是集中的过程。然而，这种集中是如何保证的呢？党的七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强调：“中国共产党是按民主的集中制组织起来的，是以自觉的、一切党员都要履行的纪律联结起来的统一的战斗组织。”^[64]民主集中制是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在强调民主

的同时，必然要求以铁一般的纪律实现民主的集中。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强调党内团结的重要性时，“重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党的纪律”^[65]。毛泽东“从党内团结的利益出发”，始终“坚持局部服从全体”的纪律原则，提供了“一个坚持真理的原则性和服从组织的纪律性相结合的模式”^[66]，给出了既民主又集中的正确道路。第一个历史决议通过后，党的七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在“党的组织机构”一章中指出，“党员个人服从所属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部分组织统一服从中央”^[67]。这一经写入党章，便始终是民主集中制的最根本要求。

改革开放后，党中央汲取经验和教训，在纪律方面开展了深入的工作。第二个历史决议指出：“中央和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建立，《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其他有关党内法规的制定，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和纪律检查机关为纠正不正之风所做的工作，提高了党的战斗力。”^[68]其中所提及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指出，必须维护民主集中制原则，并要求党员“把维护党的集中统一，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作为自己言论和行动的准则”^[69]。党的十二大更加鲜明地体现了党在这一方面的意志。党的十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不仅对民主集中制给出了更加系统和全面的阐释，对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作出了新的规定，更在党的纪律方面作了具体而严格的规定，指出“共产党员必须自觉接受党的纪律的约束”^[70]，强调纪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在原有准则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新准则指出：“纪律严明是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前进的重要保障，是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必须严明党的纪律，把纪律挺在前面，用铁的纪律从严治党。”^[71]党只有对

纪律严抓严管，才能让党的民主不至于失控，实现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唯此，才能使党的凝聚力、战斗力进一步增强，让党的团结更加巩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善于运用民主集中制原则维护党和国家权威、维护全党全国团结统一”^[72]。实现党内团结，既要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也要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列宁认为，集中制是无产阶级政党所力求奠定的作为党组织基础的基本思想，“是唯一的原则性思想”^[73]。这也为中国共产党维护党内团结提供了理论依据，全党上下必须遵循“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一铁的纪律。但服从和集中不代表帮派组织的专制，必须有民主的基础，使集中的过程制度化、合理化，才能使民主集中制成为无产阶级政党实现团结的制度保障。

四、以自我革命巩固完善党内团结的机制体制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第三个历史决议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是党永葆青春活力的强大支撑”^[74]。党内团结是无产阶级政党生存和延续的根本所在，也是党不断自我革命的前置性条件。同时，无产阶级政党的自我革命，也使其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进一步巩固党的团结统一。可以说，党内团结既是自我革命的出发点，也是自我革命的目标。回顾三个历史决议，我们可以看到以自我革命完善党内团结的机制体制。

（一）坚持从党的历史中汲取经验

三个历史决议全面、客观、准确地总结了党的历史，为党推进自我革命、巩固团结统一提供了清晰的历史依据。第一个历史决议起草前，党内虽然已经对党的历史有了初步的学习，但仍有不少党内干部，甚至是高级干部，对第三次“左”倾路线的历史缺乏正确的认识，否认有过这么一条错误路线，这让毛泽东认识到必须对“过去的经验教训作专门的研究”^[75]，“把党的历史问题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以便使全党能够正确地了解党的历史经验，同时也便于团结更多的同志为

党工作”^[76]。因此，第一个历史决议进行了深刻的历史分析，指出党在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的路线错误都“不是偶然的产物，而是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77]，也顺理成章地将中国共产党的实践置于中国历史的长时段当中进行分析，从而在历史中收获经验教训，并以此促使全党以清醒的认识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将全党上下凝聚起来。第二个历史决议则对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历史的伟大转折等作了客观公正的评价。“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78]评价功过是非的过程，就是对党的历史再一次进行深入分析的过程，如果缺少了这种分析，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就不能正确认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等党的科学理论，就不能正确认识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意义，就不能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执政根基。第三个历史决议亦是如此。一方面，第三个历史决议高度肯定了前两个历史决议的重要意义，指出前两个历史决议有力地促进了全党的团结；另一方面，又更加自觉地明确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下的定位，以“十个坚持”归纳历史行进中的经验，为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推进自我革命提供了经验基础，也让全党在“思想上更加统一、政治上更加团结、行动上更加一致”^[79]，使“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显著增强”^[80]。可以说，无论处于什么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都不断汲取历史经验，从而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为全党团结提供组织的内在驱动力。

（二）坚持从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出发

无产阶级政党的一切实践，都必须坚持人民性，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宗旨意识，坚守初心使命，践行群众路线。党自我革命的勇气来源于党的性质宗旨。在起草第一个历史决议时，毛泽东就强调这是事关全国人民，对全党全民负责的重要文件。在第二个历史决议起草工作一开始，邓小平

同样指出了决议与人民的关系，如果第二个历史决议不能在“党内、人民中间思想得到明确，认识得到一致”^[81]，那么对于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就不可能是正确的、客观的，就不能结束。换言之，一个政党如果不能站稳人民立场，不能得到人民的认可，这个政党的自我革命就是无根浮萍，缺乏根本的力量支撑，它的一切说辞只不过是空洞的口号和苍白的遮掩，是不能团结它的党员和人民共同奋斗的。党的初心使命是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前进动力。第三个历史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成立以来，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82]并把“坚持人民至上”作为党百年奋斗的重要经验，激励着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党的初心使命、性质宗旨之中获得自我革命的底气，从而使党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党的群众路线是自我革命的重要途径。毛泽东指出，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中国共产党就一定会兴旺起来。只有把群众路线贯彻到党的自我革命过程之中，尊重人民意愿，反映人民需求，发扬人民首创精神和聪明才智，使人民群众更多参与到党的自我革命过程中，才能让全党永葆先进，形成最彻底的团结统一。

（三）坚持在守正创新中巩固团结

中国共产党所奋力追求的，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要求的是前所未有的高度团结，因此，必须坚持在守正中寻求创新。对我们党来说，守正就是要始终坚守党的历史和人民立场，从而把握时代、引领时代，与时俱进、推陈出新。回顾三个历史决议不难发现，中国共产党始终带领人民“在进取中突破，于挫折中奋起，从总结中提高”^[83]，在继承党的历史经验与优良传统的基础上，立足新的实践进行新的发展，并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从而以不断进行的自我革命保持党的先进与纯洁，建设起一支凝心聚力、攻坚克难的队伍。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再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共产党始终“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紧跟时代步伐，顺应实践发展，以满腔热忱对待一切新生事物，不断拓展认识的广度和深度，敢于说前人没有说过的新话，敢于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情，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84]。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时代，历史与实践也更加要求守正创新。“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85]由此，中国共产党正是在革故鼎新、与时俱进中巩固和完善党的团结的。

五、结语

无论在什么历史时期，维护党内团结始终是中国共产党推进自身建设、领导中国人民的内在要求。在历史 and 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也显然洞察了维护党的统一的逻辑和特征。坚持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维护党内团结的逻辑起点，通过有组织的理论学习教育，中国共产党促使党员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并塑造起共同的理想信念，为实现党的团结提供了思想意志的基础。有原则的党内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实现党内团结的具体过程，这种斗争坚持问题而非责任的导向，以科学合理的斗争形式进行，力求“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实现党的团结的重要手段。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是中国共产党实现党内团结的制度保障，通过广泛的党内民主和严明的纪律要求，中国共产党将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结合，为实现党的团结提供了制度保障。以自我革命巩固完善党内团结的机制体制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从历史维度、理论维度、实践维度出发，维护党内团结始终是党进行自我革命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参考文献：

- [1] 代玉启, 李基礼. 刘少奇党内团结思想探析[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13(14): 22-24.
- [2] 秦义, 许斗斗. 列宁党内团结思想及其当代价值[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16(13): 51-54.
- [3] 武星, 王跃. 中共七大实现党内团结的三大要领[J]. 中国高校社会科学, 2016(2): 99-106.
- [4] 郭祎. 党的团结统一是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关键[J]. 探索, 2022(6): 33-46.
- [5] 王可卿, 朱孟光. 中国共产党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理论溯源、历史进程、基本经验[J]. 新视野, 2023(4): 14-21.
- [6] 王建华. 中国共产党是如何自我革命的? ——基于党的两个历史问题决议的文本分析[J]. 东南学术, 2021(3): 23-32.
- [7][8][45]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5: 33、33、159.
- [9] 列宁全集: 第五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3: 8.
- [10][35][42][49][66][7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 第二十二册[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104、436、109、100、100、109.
- [11][12][39][50][51][68]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42-55、65、34-35、60、62、41.
- [13][22][23][24][28][29][41][47][48][52][63][74][79][80][82][83]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66、31、31、69、1、31、3、80、74、65、84、70、29、29、1、65.
- [14] 列宁全集: 第六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3: 23.
- [15][53][5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 第十五册[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650、646、647.
- [16][4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 第十七册[G].

-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2、681。
- [17][56][57][58][75][76] 胡乔木.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309、315、315、317、191、309。
- [18][36][37][59]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287、283、284、298。
- [19]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101。
- [20][21][26][27][78][81]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18、143、367、267、292、292。
- [25][31][32][34]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59、305、306、306。
- [3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 [G].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80。
- [3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五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370。
- [38][6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 [G].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362、363。
- [40][60] 《胡乔木传》编写组. 胡乔木谈中共党史 [M]. 人民出版社，2015：142、117。
- [44] 刘少奇选集（上）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193。
- [46][71]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 [G].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419、425。
- [55][64][67][70] 中国共产党历次党章汇编（1921—2017） [G]. 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19：191、114、118、347。
- [61] 程中原，夏杏珍. 历史转折论：从遵义会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446。
- [62] 胡乔木文集：第二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53。
- [65] 任弼时选集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241。
- [7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 [G].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54。
- [73] 列宁全集：第八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236。
- [84][85]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20、20。

责任编辑：鲍跃华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关于党的纪律建设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韦光波 许进品

摘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对党的纪律建设进行了深入而系统的思考,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建党学说、弘扬和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念精华的基础上,紧密结合中国革命实际,形成富有理论深度和实践广度的党的纪律建设思想。主要体现在:从认识论维度阐明党的纪律建设对于增进党内团结、保持党的先进性和战斗力、推动革命事业发展的重要意义;从本体论维度对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群众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等作出系统阐释;从方法论维度对纪律检查、纪律教育和纪律处分等纪律建设实践路径进行深入思考。

关键词:毛泽东党建思想;纪律建设;党纪教育;认识论;本体论;方法论

党的纪律建设是毛泽东党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探究毛泽东关于党的纪律建设思想的理论内涵和时代价值,深化运用党的十八大以来加强纪律建设的实践经验,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锻造更加坚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具有重要意义。

一、毛泽东关于党的纪律建设思想的理论渊源

毛泽东党的纪律建设思想始终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论断作为科学指引,创新性地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守纲纪、

遵法度、严督查等方面的精华养分,开辟了我们党“立规矩、讲纪律”的纪律建设实践先河。

(一)源头活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党纪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和领导无产阶级政党革命运动的过程中高度强调纪律的重要性,列宁更是将严明的纪律运用于领导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实践之中。他们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纪律建设的一系列科学论断,为毛泽东党纪建设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科学世界观与方法

收稿日期:2024-09-01

作者简介:韦光波,广西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自治区党校研究基地助理研究员、广西区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党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许进品,广西区委党校教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4年度广西社科界智库重点课题(一般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要从基层社区抓起’重要指示研究”(Zkybkt202413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论，是毛泽东探索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直接理论来源。

马克思“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思想奠定了无产阶级政党纪律建设的基本原则。1859年，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件中进一步指出：“我们现在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1]这是马克思关于“纪律”的概括性阐释，精辟点明了纪律的重要效力，明确强调了“党的纪律”是无产阶级政党形成战斗力的基础性条件。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政党是团结领导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通过严明的纪律加强自身建设，才能确保党组织拥有强大的凝聚力，进而焕发出坚不可摧的革命战斗力。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纪律建设的思考和探索为毛泽东党纪建设思想提供了组织原则和路径方法。

恩格斯指出，“纪律，是指成了习惯的团结一致”^[2]，他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完成革命任务需要靠纪律。1872年，无政府主义理论家宣扬绝对权利并反对严格纪律，恩格斯与之论战，强调如果一个组织没有纪律，没有集中力量，没有斗争的武器，就会变得软弱无力，“会得到一个早期基督徒那样的畏缩胆怯的而又阿谀奉承的组织”^[3]。换句话说，严格的纪律是组织有效运行的关键因素。1886年，恩格斯在《致劳拉·拉法格》的信中再次指出，在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中，“胜利的首要条件是严格遵守纪律，……这种纪律是一个有成效的和坚强的组织的首要条件”^[4]。在这里，恩格斯聚焦纪律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性，强调无产阶级政党要通过严格的纪律提升组织的战斗力和内部的凝聚力，提升决策的高效性，确保党员在思想和行动上的一致性。

列宁“党的纪律是铁的纪律”思想为无产阶级政党领导革命运动和国家建设培根铸魂。列宁曾对“纪律”这一概念作过精炼而准确的描述，即“行动一致，讨论和批评自由……只有这样的纪律才是先进阶级民主主义政党所应有的纪律”^[5]。列宁认为，思想层面的集中和统一为党

组织的一致性提供了前提。只有党员对党组织的指导思想有深切的认同，对使命任务有高度的忠诚，才能自觉自愿地遵守党的纪律，与组织保持“行动一致”。这种社会主义的纪律与剥削社会的“棍棒纪律”和“饥饿纪律”不同，是建立在党员的自觉认同之上，因此具备内源性和长久性。关于纪律的严明性，列宁强调：“无产阶级实现无条件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6]十月革命胜利后，面对党员数量激增和党内小资产阶级思想涌动的现实情形，列宁更加强调对党员的纪律要求，明确指出党内“要有高度的团结、沉着和纪律”^[7]，并强调“铁一般的纪律”对党员干部的约束作用。列宁还对党内集中统一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作出强调，不断探索和完善民主集中制，并将其作为俄共的基本原则，不仅维护了党的统一，还推动了世界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

（二）文化基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纲纪法规思想

在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纲纪法规思想蕴含着丰富且深刻的理念精华，历经千百年的沉淀与滋养，塑造了中华民族的行为规范与道德准则，构筑了中国古代社会治理与道德哲学的坚实基础，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智慧桥梁，赋予毛泽东党的纪律建设思想深厚的文化基因。

守纲纪。《资治通鉴·周纪一》有言：“何谓礼？纪纲是也。”^[8]意思是说，“礼”就是礼法、法度、纪纲，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规矩”，是天子也要尊崇的法纪规范。孟子有言：“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9]随着人类社会从原始部落形态逐步进化至国家形态，“礼”这一概念逐渐从朴素的部落习俗与道德规范中脱颖而出，被新兴的统治阶层所重视并加以系统化利用。在这个过程中，“礼”不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礼貌行为或人际交往规范，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它被赋予了更为深刻的社会功能与政治意义，塑造了特定时代与地域的社会风貌和民族性格，成为烙印在

炎黄子孙内心深处的公约信条。

遵法度。《管子·明法解》有言：“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10]“法”的思想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先秦时期就有“令则行，禁则止”的崇法精神。法家思想为历朝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维护皇权、治理国家提供了理念支撑，统治者将“重刑止奸”“法不阿贵”等思想转化为体系严密、条款分明的成文之法，引导人们知其可为与不可为，使各级官员、百姓大众明确法律效力并自觉约束自己，进而稳定社会秩序、匡正行为准则。在悠长而曲折的历史长河中，法律制度伴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与权力的更迭，逐渐演化为权威和强制力的象征，它在约束和规定社会行为的同时，成为维系国家机器运转、区分社会等级的重要工具。

严督查。《左传·桓公二年》有言：“夫德，俭而有度，登降有数，文物以纪之，声明以发之；以临照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惧，而不敢易纪律。”^[11]这句话强调了德行的本质应是节俭且适度，要通过制度、礼仪、文化传统等来记载和传承这些德行与规则，以监察百官，使之心怀敬畏，不行越轨之举。秦国的《语书》、汉代的《刺史察举六条》、唐代的《六察法》、明代的《宪纲》等成文法，对监察官员的职权范围予以详细规定，通过奖励奉公守法、忠于职守的官员，惩戒不法官员，从而达到弘扬正气、吏治清明的目的。任何一个朝代，严厉的督查制度都是保证国家政令通达、整顿官场吏治、促进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特别是对于官员的贪污腐败和失职渎职行为，不论其品阶的高低，御史、谏官、封驳官都可以对其进行弹劾。虽然这些并未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但在一定程度上对于预防腐败、震慑官员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毛泽东关于党的纪律建设思想的核心要义

毛泽东历来高度重视党的纪律建设，将纪律视作党的生命线。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针对党的纪律建设的重要性、基本内容和实现路径作出全面而深刻的论述，形成了富有理论深度

和实践广度的党纪建设思想。

（一）认识论之维：党的纪律建设的重要性

毛泽东之所以视党纪为重中之重，源自他对党的纪律建设重要性的深入思考和系统认识。在他看来，党的纪律建设是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对于增进党内团结、保持党的先进性、提高党的战斗力以及推动革命事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党的纪律建设是团结统一的基础。党纪是党内成员应当统一遵守的行为准则，是党的集体意志和团结力量的结晶。毛泽东认为，党纪的执行对党员干部起到规范作用，只有坚持党的纪律建设，“才能团结全党，克服新的困难，争取新的胜利”^[12]。严明的纪律能够为党组织内部、军队内部的团结一致提供有力保障，有助于形成党群思想统一、军民行动团结的强大合力，有效应对内外部风险挑战。

第二，党的纪律建设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战斗力的关键。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指出“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13]，阐明了党的纪律建设在党的路线执行中的重要作用。1941年，为批判肃清党内出现的官僚主义恶习和宗派主义错误倾向，敦促党员干部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时刻保持高度的政治警觉，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党的“路线是‘王道’，纪律是‘霸道’”^[14]的著名论断，旨在强调党的纪律的严肃性、权威性和强制性。明确唯有用严明的政治规矩规范党员行为，才能“霸道”地防止其思想行为被外部环境和其他因素所腐蚀，始终保持革命队伍的纯洁性和原则性。

第三，党的纪律建设是确保革命事业取得持续胜利的重要保证。1948年9月，毛泽东在“九月会议”上强调全党全军纪律性问题，旗帜鲜明地提出“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15]的伟大号召。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在胜利面前要保持清醒头脑，在夺取全国政权后要经受住执政的考验。新民主主义革命

胜利前夕，毛泽东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战胜敌人的三件主要武器，居于首位的就是“一个有纪律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16]。这一论述深刻昭示了党的纪律建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重要作用，明确在革命斗争中，面对种种困难和挑战，只有纪律严明、团结有序的队伍才能够战胜一切敌人，实现革命事业的持续胜利。

（二）本体论之维：党的纪律建设的内容阐释

毛泽东关于党的纪律建设的思想是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不断总结和丰富的宝贵精神财富，为中国共产党的纪律建设提供了坚实理论指导。毛泽东从国情和党情出发，对纪律建设的逻辑架构作出系统阐释，形成了涵盖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群众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在内的党的纪律建设内容体系。

第一，重点严明政治纪律。自党的五大第一次明确提出“政治纪律”概念后，政治纪律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土地革命时期，针对党内纪律松懈的现状，毛泽东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重要性，明确规定了政治工作在军队中的地位和作用，形成了党对红军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和政治建军的基本原则。延安整风期间的政治纪律建设则以教育党员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中心，以加强理论与实际联系为重点，不断增强全党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认同和遵循，谨守党的政治规矩。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将增强全党的政治纪律性摆在首位，强调要在强化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增强政治学习的规范性，党员干部要进一步学习、遵守党章，增强政治纪律观念和执行政治纪律的自觉性。

第二，调整完善组织纪律。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党的二大《党章》曾对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作过初步规定，形成了党的组织纪律建设的雏形。在此基础上，毛泽东结合革命实际和党内实际，

在《古田会议决议》中纠正了极端民主化的无纪律现象，确立了“少数服从多数”^[17]的纪律。同时强调要纠正和克服党内非组织的批评方式，开展健康的党内批评。延安时期，毛泽东在扩大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将“少数服从多数”扩充为“四个服从”组织纪律原则，这一原则在党的七大上通过《党章》予以确立，有力维护了党的团结统一和权威领导。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关注到组织内部出现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严重问题，提出应坚持正确的民主集中，整编党的队伍，开展整党整风运动，这为党各项政策的有力执行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坚强组织保障。

第三，明确提出群众纪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得到人民群众的理解、支持和拥护，重要原因在于严格执行群众纪律。毛泽东在领导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曾提出“三项纪律”和“六项注意”，后发展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既是红军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特殊革命环境中的群众工作纪律，对于正确处理党群关系、军民关系具有重要作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深入阐明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性，提出“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18]的著名论断，这成为中国共产党严明群众纪律、贯彻群众路线的“基本的领导方法”^[19]。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对群众纪律的认识不断成熟，在重申“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基础上，形成了对城市工作和工商业工作中群众纪律的科学认识，进一步丰富了党的群众纪律内涵，塑造了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良形象。

第四，对廉洁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等作出初步阐释。在廉洁纪律建设方面，毛泽东强烈反对官僚主义作风，指出，“必须严厉地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20]，严惩贪污腐败分子。同时，强调通过加强廉洁制度建设和廉洁思想教育增强党员干部的廉洁意识，“厉行廉洁政治”^[21]，“建立廉洁政府”^[22]。在工作纪律建设方面，毛泽东

在总结土地革命时期党的秘密工作纪律的基础上，对中国共产党保密工作纪律、外事工作纪律、保护文化遗迹工作纪律和民族工作纪律等作出明确规定，奠定了党的工作纪律建设基础，为全党各方面事务的深入开展提供了准绳。在生活纪律建设方面，毛泽东始终倡导全党保持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生活作风，明确提出“两个务必”“六条规定”。同时，规范党员在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中的诸多行为，领导建立分灶制度、物品配给制度、婚姻制度和招待制度等，使党员干部有效克服了贪图享乐的不良作风，提高了全党的思想觉悟。

（三）方法论之维：党的纪律建设的实践路径

毛泽东对党的纪律建设的实践路径有着深刻的认识和独到的见解，涉及纪律检查、纪律教育和纪律处分等纪律建设方法论维度的思想。

第一，强化纪律检查。纪律检查是党的纪律建设的有效形式之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领导推进党内纪律检查工作，通过《中央巡视条例》建立健全巡视检查制度，建立纪律检查机构，以“检查违反党的总路线的各种不正确的倾向、官僚主义及腐化现象等，并与之作无情的斗争”^[23]。同时，毛泽东善用“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有力武器，要求党员强化对自身守纪行为的检查，违纪党员要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基础上“正视错误倾向，认真实行改正”^[24]。此外，毛泽东十分重视纪律检查工作的针对性和艺术性，明确对党性修养不足和具有不良作风的党员，要“采取和他们个别谈话的方法”^[25]，帮助其纠正错误，改正缺点，实现自我提高。

第二，优化纪律教育。纪律教育是中国共产党为强化党员党性修养和纪律观念而进行的教育活动。毛泽东早在古田会议期间就认识到，“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要通过“有计划地进行党内教育”^[26]，纠正党内成员的错误思想。针对党员或理想信念匮乏，或对党纪

缺乏全面了解的现状，毛泽东指出：“必须对党员进行有关党的纪律的教育，既使一般党员能遵守纪律，又使一般党员能监督党的领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纪律。”^[27]在纪律教育的方法上，毛泽东规范了教育读本和教育文件，要求全党深入研学经典著作，明晰党章党规党纪。同时，明确典型教育的重要性，认为既要深入开展警示教育，对诸如张国焘、熊仙壁、黄克功等违纪人员进行公开揭露处分，又要积极进行正面引导，号召全党学习以“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28]张思德同志为代表的正面典型。

第三，规范纪律处分。纪律处分是党的组织依照党章党规对违纪党员采取的惩戒手段的总称。毛泽东依照党情国情创造性地提出一系列纪律处分思想，旨在强化党内纪律的执行和维护党组织的权威。一方面，毛泽东要求从严执纪，领导出台《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等纪律处分条例，明晰对党组织和党员违纪行为的几类处分方式。同时，深入开展延安整风、“三查三整”等整党整军运动，致力于将官僚主义“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29]。另一方面，毛泽东系统总结党在纪律处分中的惩办主义教训，科学把握党纪处分强制性与纪律执行自觉性之间的关系。他指出：“党的纪律是带着强制性的；但同时，它又必须是建立在党员与干部的自觉性上面，决不是片面的命令主义。”^[30]要求在从严执纪的同时，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引导党员自觉守规矩、讲纪律，增强党员的自我约束力，提高党的纪律建设的实效性。

三、毛泽东关于党的纪律建设思想的当代启示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必须深入总结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严明党的纪律的历史经验，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and 党中央决策部署，深化运用新时代加强纪律建设的实践经验，推动党的纪律建设朝着系

统化、制度化、规范化方向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清障护航。

第一，坚持不懈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指导党的纪律建设。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从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原则、特征、组织等方面阐释了无产阶级严明纪律的独特优势，奠定了无产阶级政党纪律建设的理论基础。毛泽东强调，中国共产党一旦没有严明的纪律要求，将无法进行彻底的革命斗争，无法赢得群众的信任与支持，更无法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目标。正是凭借着科学的理论、严密的组织、严格的纪律，中国共产党从近代诸多政治力量中脱颖而出，结束了中国社会“一盘散沙”的局面，开创了革命的新纪元。新征程上，统领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面临着严峻复杂的形势考验。要确保党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就必须在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的互动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全面把握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的形势任务和阶段性特征，坚持自信自立，强化政治引领和理论武装，发扬马克思主义政党纪律严明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始终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和党的创新理论指导下加强纪律建设，以严明的纪律锻造更加坚强有力的中国式现代化领导核心。

第二，确保全党始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党的历史告诉我们，要治理好我们这个大党、治理好我们这个大国，保证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至关重要，维护党中央权威至关重要。毛泽东坚定指出，“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31]，强调，“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32]。在维护领导核心和权威上，毛泽东用巴黎公社的教训告诫群众，他指出，“没有一个统一的集中的有纪律的党作指挥”^[33]

是其失败的首要原因，突出强调要维护纪律的权威，确保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进入新时代，面对严峻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我们党之所以能够战胜一系列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就在于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踏上新征程，党面临的形势越复杂，肩负的任务越艰巨，就越要把“两个维护”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和根本政治纪律，不断完善“两个维护”制度机制，使严明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融入党内政治生活、政治生态和政治文化之中，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确保全党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统一步调向前进。

第三，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推进纪律教育常态化。党纪与党性、党风是一个有机整体，其中党纪是保障，党性是根本，党风是表现。我们党一直强调加强纪律建设，要以党章为根本遵循，以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党规党纪为准绳，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毛泽东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搞不好，不是方法或技术问题，“是根本态度（或根本宗旨）问题，这态度就是尊重士兵和尊重人民”^[34]。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以严肃的纪律赢得民心，时刻保持“赶考”清醒，做到“两个务必”。当前，部分党员干部存在作风不正、纪律松弛、违纪违法的问题，并不是简单的认识不清、方法不对或能力不足，而是对党不忠诚、信仰不坚定、服从不自觉等党性不强的体现。新征程上，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加强理论学习和党性教育，以党性教育强基固本，以党风纠治化风成俗，以党纪规范提供保障，将纪律教育与党性教育、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相融通，使其融入常态化党史学习教育、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融入社会规范、行业规章、家风家教之中，大兴务实之风、弘扬清廉之风、养成俭朴之风，以党

性立身做事，将纪律规矩刻印在心，做到学思践悟、融会贯通，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第四，统筹推进纪律建设的各部分内容，充分发挥纪律建设治本功能。回顾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的奋斗历史，党经历了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遇到了各种复杂严峻的挑战，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几度遭受严重挫折。但是，党在人民的支持下，依靠铁的纪律和坚定的理想信念战胜困难、修正错误、走向光明。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思想、组织、作风“三大建设”，还是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形成的思想、组织、作风、反腐倡廉、制度“五大建设”，党的纪律规矩都通过规范、引导、约束、惩戒等途径贯穿在各方面建设中，中国共产党依靠纪律建设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新时代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要推动纪律建设与各项建设贯通协同，将铁的纪律贯穿于党的建设的各方面、全过程。要将增强纪律建设的政治性摆在首位，只有将政治纪律摆在核心位置，才能确保方向不偏、行动不差、行为不误。要将纪律建设经验固化为制度规定，使懂规矩、守纪律、知敬畏成为党员干部浸在骨子里、融在血液中的自觉修养，在净党风、树新风中培育党员干部对纪律规矩的敬畏之心，实现制度预期和实际效果相统一。

四、结语

对党员干部来说，纪律是“紧箍咒”，也是“安全带”。只有坚持以严的标准要求干部、以严的纪律约束干部，才能使党员干部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才能防止小错酿成大错、违纪走向违法。对党组织来说，纪律是管党治党的“戒尺”。只有把纪律立起来、严起来，才能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才能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确保党政治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统一。学纪是知纪的基础，明纪是守纪的前提。广大党员干部要在深入学习毛泽东关于党的纪律建设思想的基础上，立足新时代新征程，努力把党纪要

求转化为内在追求，真正把纪律规矩转化为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九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13.
-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286.
-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519.
-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540.
- [5] 列宁全集：第十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21.
- [6] 列宁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35.
- [7] 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99.
- [8] 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2.
- [9] 曾振宇.孟子新注[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01.
- [10] 姜涛.管子新注[M].济南：齐鲁书社，2006：456.
- [11] 崔大华.儒学的现代命运——儒家传统的现代阐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7.
- [12][13][3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十五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645、645、646.
- [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十八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593.
- [15] 毛泽东文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94.
- [16]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80.
- [17][29]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90、124.
- [18][19][24][28]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 1991: 899、900、934、1004.
- [2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 第十一册[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139.
- [2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 中卷[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292.
- [22][27][34] 毛泽东选集: 第二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355、528、512.
- [2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 第十册[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439.
- [25] 毛泽东文集: 第二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420.
- [26] 毛泽东文集: 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94.
- [31] 毛泽东文集: 第八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305.
- [32] 毛泽东文集: 第七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32.
- [3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 上卷[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156-157.

责任编辑: 吉强

文化认同视域下宗教中国化的历史考察

——以唐代佛教僧人为例

戎 川

摘要:从唐代佛教僧人的传记及相关金石资料中可以看出,受到唐代社会主流文化所承认和推崇的僧人,往往不具有“神异”或“神通”的特点,而是具备了儒学背景或深厚儒学功底的“儒佛兼修”的涉儒僧人。他们往往对儒学有着在先的文化认同,对忠孝理念有着在先的伦理认同,由此在修行上也表现出深厚的儒家特点。这一历史特点对当今坚持我国佛教中国化方向有着借鉴意义,可以帮助当今佛教僧人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关键词:宗教中国化;文化认同;唐代佛教;儒学

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是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理论的重要创新。从世界范围来看,宗教与所在地的地方文化融合,是世界宗教本土化发展的一个重要规律。从中国宗教发展历史看,外来宗教的发展历程就是一个不断融入中华文化的过程。文化认同不仅是当今时代的要求,也是佛教中国化乃至我国宗教中国化的历史经验。一般而言,外来宗教进入一个地区大体要经历与当地传统文化的矛盾冲突、调适整合、融合共生等几个阶段,在此过程中,外来宗教对所在地方传统文化的认同理解具有重要意义。系统深入考察历史上中国传统宗教的发展进程,对于坚定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培养爱国爱教、热爱中华文化的宗

教教职人员具有重要意义。

一、家世儒宗：唐代佛教僧人的文化身份认同

在唐代不少僧人的传记或者墓志中,特别强调僧人祖上的仕人身份,并且描述得很详细。从僧人的先祖一直到僧人的父亲,几乎每一代都在忠诚地为朝廷效力,或都尊崇儒家思想。只要僧人的家世涉儒,一般在传记或者墓志当中都会着重强调并且详细描述,似乎这样家世的子弟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中国佛教徒。事实上也是如此,这些家世涉儒的僧人有不少在其一生中表现出明显的忠孝倾向,非常符合一名儒家君子的言行。如唐灵化寺故大德智该法师,其祖曾任刺史,对

收稿日期:2024-08-15

作者简介:戎川,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战理论教研部民族宗教教研室讲师,研究方向为佛教义理、宗教中国化。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宗教事务局招标科研项目“党的十八大以来宗教事务治理实践创新研究”(2024GZCX003)的阶段
性研究成果。

其祖的评价是“负文武之才雄，为帮国之光彦”^[1]。法师父亲则是隋朝巴西县令，“善政之美，著乎风俗”^[2]。对其祖和其父的评价显然都具有儒家特色，表现了法师祖上对于王朝的尽忠。法师本人在这样的家庭熏陶中也是“承九流于庭训，贯六艺于家风”，家庭的熏陶给予了法师坚实的儒家文化基础，所以能“秣糠儒墨”，也就是说已经把儒家文化烂熟于心并且轻松驾驭了。唐北岳慧炬寺的智力禅师“祖、考、季父，皆从容爵位”^[3]，禅师的姐姐是邠王妃，贵为玄宗近属。唐圣善寺玄堂禅师，其家族是轩辕氏后裔，他的父辈兄弟都非常优秀，尊崇儒家文化，“儒行华冕”^[4]，在这样的家庭环境影响下，禅师同样已将儒家经典烂熟于心。六度寺白衣大师智达虽为居士，却同出家僧人一样，只是没有正式出家，他的塔铭中在开头便声明其“人承孝友之家”^[5]，开头便如此点明，似乎强调在这样的家庭才能出现像大师这般的修行人。唐净域寺法藏禅师的塔铭中还特别强调了禅师就是太守的曾孙，监丞的第二个儿子，由此可见家世儒宗对于僧人的一生是多么的重要，在盖棺定论的塔铭上要强调两次。随后在评价禅师的一生时，作者还将其比作“若周公之吐哺，天下归心”^[6]，这似乎是给一位佛教徒最高的评价。

大荐福寺思恒律师的例子更加典型。其祖上可谓家世显赫，他的墓志上这样评价，“系丞相之端严，散骑之仁厚，以积善之庆，是用诞我律师焉”^[7]。这个例子其实已经表达得很明确了，之所以家里能有这样一位优秀的佛教僧人，恰恰是因为祖上仁厚积德，因为祖上乃积善之家，才能诞生这样的人才。这也说明似乎只有家世儒宗并且祖上仁德，在这样一种符合儒家君子标准的家庭里，所诞生的佛教僧人才是一名合格的僧人。从这个角度来讲，在现实生活中，儒佛之间的张力也许并没有那么大，佛儒之间的融合在生活当中倒是一件比较自然的事情。思恒律师在生命的后期曾被召入内道场，受命为菩萨戒师，“充十大德，统知天下佛法僧事”^[8]，在唐代佛教的范围内，

他可谓已经走到了最高处。由此可见，无论是唐代统治者还是唐代社会，在大家的意识中，一名合格僧人的榜样就如同思恒律师一样，家世儒宗，修行高尚，且对朝廷尽忠。

玄奘法师的弟子，著名的唯识宗学者窥基法师的家世更是显赫异常，法师出身尉迟家族，是唐开国功臣尉迟恭的侄子。法师虽属少数民族，但其出生后所浸染的却是儒家文化，所以儒家文化对其影响是很深的。法师身高六尺五寸，仪表堂堂，天生聪明且悟性很高，“能属文……凡经史皆一览无遗”^[9]，这说明窥基法师儿时受到的是儒家文化的教育，并且学得很扎实，后来被玄奘法师所度，十七岁出家，“既脱儒服披缁衣”，玄奘法师度化窥基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他深厚扎实的儒学功底，有助于译经与推广佛教教义。“以师先有儒学辞藻，诏讲译佛经论卅余部”^[10]，这说明窥基法师之所以在出家后有这么大的成就，是因为他深厚的儒学功底。可以说儒家文化在唐代并不是进入佛教的障碍，反而是进入佛教的必备条件，这归根结底是因为唐代僧人无法跨越自身儒家文化在先视域，他们无法去“客观”地审视佛教，而“纯粹”的佛教也不存在，他们必须通过儒家文化才能理解佛教。

还有一位让玄奘法师非常看重的高僧，即京师纪国寺的慧净法师。当时，玄奘法师译经的时候需要征召有德且博学的高僧来帮助译经，慧净法师颇得玄奘法师的赏识，他的传记虽然放在了《续高僧传》的译经篇当中，但他的生平却是以护法见长，多次与儒道辩论从而维护佛教的尊严。玄奘法师曾当着房玄龄等重臣的面，拍着慧净法师的后背说：“此乃东方菩萨也。”^[11]可见玄奘法师对他的器重。再来看看慧净法师的家世，他的父亲是隋朝国子博士，同样“家世儒宗，乡邦称美”^[12]，法师在儿时就已经开始学习儒家文化，可见慧净法师的儒学底蕴反而成了他身为僧人的必备条件，使其在译经、护法以及与士大夫交往方面都游刃有余。其实在唐代僧人的传记或者墓

志当中，这样的例子是比较普遍的，可以说儒家文化在唐代无疑是僧人们理解佛教的工具，是通往佛教的必经之路，是僧人们无法跨越的视域。

二、忠孝为本：唐代佛教僧人的家国伦理认同

“忠”是儒家伦理的核心理念之一，忠君爱国以及忠于佛教也是唐代僧人应有之责任与应尽之义务。常一为作为当时的名僧，在安史之乱期间数次为军队募筹所需物资，为国鞠躬尽瘁。墓志评价其“虽非手执干戈，岂异躬卫社稷”。在其圆寂后，皇帝以君臣之情对他进行评价，“师久修八政，历事三朝，至行淳深，精勤不替”^[13]。明远是徐泗濠三州的僧官，针对当地洪涝灾害严重的问题，明远为国分忧，协助当地官员创避水僧坊。东都十大德之首的智如善于“提智慧剑……降内外魔”，对佛门之忠具体表现为“使疑者信，惰者勤，增上慢者退”，护法同时亦内证佛道。史料对他的评价是“凛乎佛庭之直臣，郁郁乎僧坛之大将者也”。在中国佛教僧人践行“忠”的理念这一方面，《大唐金刚般若石经记》中有着经典的总结，即在范围上是“刑赏之内，权衡制之；刑赏之外，我法绥之”，在效果上则“事无绩而有忠，功不伐而多义”。

“孝”是儒家的另一个核心理念，同样也是唐代对中国僧人的评价标准之一。唐代儒士王庆的儿子慎贞是一位僧人，父亲去世后，慎贞尽孝“遗形自丧”，墓志评价其“崇空而不失其孝，割爱而不忘其哀”^[14]。这一句纲领性的概括，同样形象诠释了中国佛教“佛教儒行合一”的特点。唐代名僧海顺曾有“对此凡缘，未能出有欲河”^[15]的感慨，认为如今遇到解脱之道，再无遗憾。但临终前的遗言却是“顾惟老母，宿缘业重，今想不得亲别矣。若弃骸余处，倘来无所见，有致煎熬……顺虽不孝……可侧枢相待”^[16]。与海顺相反，“纯孝自然，博雅天纵”的智悟则“上迫父命，强为婚媾，晚岁归道”^[17]，他选择了先尽孝而后出家，也许正因为如此，他出家后选择了持律法

门，积劳成疾而终。与前两位的情况不同，僧人崇福自觉地认识到“先宗不嗣，罪莫大焉”，于是“受之以妻子，无忘于梵行”^[18]，婚育报答父母后便毅然出家。三位僧人的例子诠释了“崇空而不失其孝”的特点，表现出“孝道”与“解脱”之间的圆融。

当时的佛教僧人无疑都深受儒家文化的浸染，儒家文化可谓已经“构成”了他们，他们只能以儒家家国伦理的认同来接触佛教并且理解佛教。唐代著名的玄奘法师坚守孝道，他在去印度学习归来后，因为父母的坟墓长期荒芜无人照顾，向高宗提出希望能回去重葬父母遗骸^[19]，高宗同意并表示由朝廷承担费用。玄奘这样的做法无疑受到了儒家文化的深刻影响，也隐隐体现了玄奘法师对父母的愧疚之情。虽早年出家，求法异域，但终其一生将孝心理在心底，最终还是践行了身为人子应尽的义务。

三、儒佛兼修：唐代佛教僧人的修学之道

儒学兼修是唐代佛教僧人的修学之道。一名优秀的佛教僧人不仅要精通佛教义理，更要在先精通儒家文化，有着深厚儒学底蕴的僧人才是佛门之“高杰者”。华严寺开山始祖行标法师的碑铭当中，对其的评价很有参考价值：“儒书皆通三皇五帝之道，言未尝及，而人知其博古也。经论综贯天堂地法之说，舌未尝举，而人皆务崇善也。所至清风凛凛，正所谓释子之高杰者也。”

唐代僧人会用儒家的修养境界去形容和诠释佛教的修行。“仁”是儒家修养境界的核心理念，僧人也会以儒家的“仁义礼”来比附佛教的“戒定慧”，所谓“离礼于仁义者，不可与言儒；异律于定慧者，不可与言佛”。禅宗六祖慧能在指导大家修行“始以性善，终以性善，不假耘锄，其本静矣”，以儒家修养境界来导人契入。僧邕的塔铭中描述他仁心救蚁，此是以仁心来表达菩提心。将佛弟子比为智者与仁者，认为众生如果“智者不能拔，仁者不之慈”^[20]，则与佛教理念相背离。径山大师的碑铭描述他“骑虞驯扰，表仁之至也”，

还有大义禅师度化群虎，“其仁感也如此”。常超的塔铭中则直接点出了“仁”便是通往佛教修行境界的必由之路，即“仁之大者无思……无思而一切咸寂”。

“大丈夫”是由孟子所传达出的儒家修养境界，也为唐代中国僧人所重视。大达的碑铭中以“大丈夫”统一了儒佛，即“为丈夫者，在家则张仁义礼乐，辅天子以扶世导俗；出家则运慈悲定慧，佐如来以阐教利生。舍此无以为丈夫也”，因此僧人要“显大不思维之道，辅大有为之君”，又聚焦于忠君爱国。惟俨认为“大丈夫当离法自净，焉能屑屑事细行于布巾邪？”^[21]，不该为世俗所牵绊。《全唐文》记载栖霞寺一位被誉为“栖霞大师”的高僧，在研习禅宗时豁然开悟而感叹道“大丈夫了心当如此”，则直接以“大丈夫”形容佛教修证境界。

道一将儒家比作佛教的“笙簧”与“鼓吹”。皎然则以“诗句牵劝”，将对方引入佛教的智慧中，并且表明了“行化之意，本在乎兹”^[22]。与皎然一样，灵一在与学人交流时也是“与儒墨同其波流，然后循循善诱，指以学路”。昙允与士大夫交往时同样是“其导先之以文行，宏之以戒定”。义中在回答吏部侍郎王珣关于修行的问题时，答之以“孝之至也，无所不善”^[23]，碑铭称其“适道适权”。宗密直接指出了中华文化之所以可以通往佛教，是因为“二教惟权，佛兼权实”，中国化的佛教只会彰显而并不会破坏佛教的核心教理。

在当时的佛教僧人中，具代表性的要数唐五台山清凉寺澄观法师，法师十一岁出家，未有文字明确记载他在出家前学习过儒学。由于唐代主要的政策是禁止私度，出家需要官方认可，所以法师十一岁出家十四岁方才得度。出家后的澄观法师一开始并没有想去学习儒学，只想精进修行佛教。他“遍寻名山旁求秘藏”^[24]，通过四处访学来充实自己。访学期间，法师分别学习了律宗、三论宗，后来又跟着湛然法师学习天台止观以及法华维摩等经义，接着又去牛头山禅宗圣地学习

南宗禅法，随后又研习了北宗禅法。可见法师这一路的成长，几乎学遍了唐代的佛教宗派理论。在完成了这一系列参学之后，如果只是立足于一个佛教徒的身份来看，似乎已经非常圆满了，因为澄观法师的参学并不是简单的学习知识，而是将每一派的教义都融入于心并且融会贯通。但是，法师并没有止步于此，他自己做了这样一个决定——“于后得智中起俗念学世间技艺”^[25]，而他想学习的世间技艺中，当然最主要的就是儒家文化，包括经、传、子、史，小学等学问。他补习的儒家文化在这里就有了特殊的意义，一个在佛教领域已经学通各派的高僧，要去补习儒家文化，这说明了儒家文化对于唐代僧人的必要性，他们若要成为名僧，就必须精通儒学。

澄观法师将儒家文化归入“后得智”这一佛教特有的智慧概念当中，也暗含了他儒佛兼修的一种倾向，这本身就说明了佛教在唐代与儒家文化相融合的发展方向。在法师博综儒佛之后则开始渐渐入世，以其深厚的儒佛底蕴而进入国家译场译经，并在为德宗讲法之后被赐号“清凉国师”。唐京师西明寺的疏勒籍僧人慧琳法师，是唐代密宗不空大师的弟子，主要在翻译方面成就比较大。但从他的传记中可以看出，他也是一位补习儒家文化的僧人，“内持密藏，外究儒流”^[26]。佛教进入中国，想要推广开来，其经典就要用中国的语言文化表达出来，同时又不能使得佛教的核心教义面目全非。这就意味着儒佛之间相融合的必然性，同时也意味着儒家文化对于理解佛学的不可跨越性，想推广佛教，就要推广中国人看得懂的佛教。

此外，唐初著名的法琳法师，多次与道教辩论却丝毫不落下风，而且不畏强权，维护了佛教的尊严，被后人称为“护法菩萨”，他的传记也被放在《续高僧传》的护法篇中。他之所以能如此成功地护法，除了对佛教本身的甚深修为外，也与他深厚的儒道底蕴有直接关系。法师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出家，但他没有因为出家就只学习佛教

而舍弃世间文化,出家后的他仍然“游猎儒释”^[27],是一位学通儒佛道的高僧。唐代的明演法师幼年便温和敦敏,长大之后在遇到佛教之前非常崇尚儒家文化,“蕴颜子之德,昇孔氏之堂”,并进而在“天宝季,擢明经第”^[28],考取功名,成为儒生。也就是说,法师的儒家修养已经相当深厚,已经几乎达到了儒家所谓“登堂入室”的高度。大慈恩寺的彦棕法师,其法名与隋朝著名的以翻译闻名的彦棕法师相同,两人也同样具有深厚的儒学功底,前者“于玄儒之业颇见精微”^[29]。著名的禅宗神秀大师,身后皇帝赐谥号大通禅师,禅师同样是“少为诸生”,儒生出身并且精通道家文化,僧传中的记载则是“少览经史,博综多闻”^[30]。碑铭中在描述神秀大师的长相时,说他“身長八尺,秀眉大耳,应王伯之象,合圣贤之度”,认为他的长相符合圣贤的标准,这实际上也是暗示神秀大师符合儒家君子的标准,这样的人才能进而成为一名合格的佛教徒。神秀大师这样的背景也正符合了唐代成功僧人的标准,儒家出身,修行精进,也许正因如此,他久视年中奉诏进京,被推为两京法主、三帝国师,甚至可以和皇帝同分一座。

四、结语

文化认同是我国宗教中国化的重要历史经验与现实基础,这对宗教界代表人士的培养至关重要。如同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深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引导和支持我国宗教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增进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31]。在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进程中,要发挥宗教界的主体作用,必须按照“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诣、品德上能

服众、关键时起作用”^[32]的标准,培养一批精通宗教经典教义、精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层次“双通”人才,这对于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有着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 [1][2][3][4] 吴钢. 全唐文补遗: 第一辑 [M]. 西安: 三秦出版社, 1994: 12、12、14、28.
- [5][6][7][8][10][13][14][17][20][28] 周绍良. 唐代墓志汇编 [G].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1155、1179、1322、1322、2188、1774、1226、1780、2138、1917.
- [9][18][23] 赵超. 新编续补历代高僧传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21、32、186.
- [11][12] 道宣. 续高僧传(上) [M]. 郭绍林,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14: 76、72.
- [21][22][24][25][26][29][30] 赞宁. 宋高僧传 [M]. 范祥雍,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423、728、105、105、108、74、177.
- [15][16] 道宣. 续高僧传(中) [M]. 郭绍林,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14: 442、445.
- [19] 威斯坦因. 唐代佛教 [M]. 张煜, 译.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30.
- [27] 道宣. 续高僧传(下) [M]. 郭绍林,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14: 951.
- [31] 习近平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强调 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 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N]. 人民日报, 2021-12-05(1).
- [32] 习近平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强调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 全面提高新形势下宗教工作水平 [N]. 人民日报, 2016-04-24(1).

责任编辑: 赵晓锋

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 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逻辑分析

高梦琪

摘要: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创新亮点。要厘清这一理论成果的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基础,需要明晰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哲学意义上的基本内涵,这包括宗教适应社会、宗教找准定位、宗教自觉作出变革三方面内容。从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来看,宗教适应社会主要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底色,宗教找准定位是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宗教问题的重要出发点,宗教自觉作出变革体现了宗教发展的基本规律。系统深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进程,迫切需要对宗教中国化进行深刻的基础理论研究,为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提供深厚的学理支撑。

关键词:宗教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基础;理论逻辑

一、引言

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既是对我国宗教发展规律的客观总结,又是对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的创新发展,有着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基础。本文意在厘清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基础,为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夯实学理根基。本文所探讨的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宗教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宗教理论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的观点和方法,坚持宗教中国化应该能够溯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宗教理论。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说明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宗教理论的创新发展。我们

不能仅仅通过宗教适应本土社会的历史经验以及世界宗教的发展规律得出坚持宗教中国化的必要性,还要基于理论内在逻辑阐释其合理性,也就是要坚持历史逻辑、实践逻辑与理论逻辑的统一。

坚持宗教中国化的理论内在逻辑就包含在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基础之中。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对我国宗教工作提出明确的要求。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的实践要求可以概括为:“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和教育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用团结进步、和平宽容等观念引导广大信教群众,支持各宗教在保持基本信仰、核心教义、礼仪制度的同

收稿日期:2024-09-10

作者简介:高梦琪,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战理论教研部民族宗教教研室讲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

时,深入挖掘教义教规中有利于社会和谐、时代进步、健康文明的内容,对教规教义作出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要求、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1]从哲学意义上分析其基本内涵,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宗教适应社会、宗教找准定位以及宗教自觉作出变革。

从宗教适应社会的方面看,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旨在引导人们认识到,宗教并非悬置的空中楼阁,而是有实际的社会载体,现实载体即是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进一步说,人又是国家和社会的载体,用马克思的话说,“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2]。如果宗教只是单纯头脑中的幻想,那么将会脱离社会而僵化,甚至走向极端。所以,宗教要适应社会,是进一步推动宗教实际“落地”的重要主张,也是引导宗教为我国的社会发展进步发挥积极的正向作用。从宗教找准定位的角度看,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旨在引导宗教处理好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认识到宗教的本来面目,回归到自我,积极构建和谐健康的宗教关系,促使宗教自身健康传承。从宗教自觉变革的角度看,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旨在引导宗教界人士认识到,宗教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其发展是动态变化的过程,需要主动深入挖掘教义教规中有利于社会和谐、时代进步、健康文明的内容,对教规教义作出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要求、符合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求的阐释。所以,宗教自觉变革是指应该注意到时空的变动,而非一味地沉浸在过去,应该跟随时代和社会的发展作出重要的、自觉的变革。

宗教适应社会、宗教找准定位以及宗教自觉变革三者之间并不能画等号,更不是互相包含的关系,三者各有不同的侧重。宗教适应社会是基础,强调宗教是以现实的人为载体;宗教找准定位是前提,主要强调宗教的自我觉悟;宗教自觉变革是旨归,主张宗教积极调适自身以适应当代社会。三者共同组成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的时代要求。概括而言,就是宗教需要积极主动地在变

革自身中适应时代发展。

二、宗教适应社会:宗教以人为载体

“坚持宗教中国化”的首要内涵是宗教适应社会。宗教工作的本质是群众工作,“如果没有信教群众,没有信教群众组织起来的宗教团体,也就没有实实在在的‘宗教’”^[3]。宗教是意识观念和社会实体的结合,研究宗教必须认识到宗教以人为载体,看到宗教背后实实在在的信众。

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具有“人本主义”视角,这主要源于对马克思影响深刻的两位哲学家——鲍威尔与费尔巴哈。鲍威尔与费尔巴哈皆因看到宗教背后的人而率先给予宗教严厉的批判。鲍威尔认为福音故事是后人所编造的,他指出,“人类的自我意识作为神圣历史的全能创造者——这种自我意识,照费尔巴哈的说法,就是某些教义的创造者”^[4]。鲍威尔进一步在《复类福音作者批判》中否认耶稣的历史真实性,将其说成“基督教徒的幻想”^[5]。他认为宗教是人的创造而非神的创造,这是其宗教批判的核心所在。但对于所谓“人”的理解,鲍威尔的观点具有黑格尔唯心主义的色彩,是一种带有主观性的“自我意识”的外化。费尔巴哈更进一步指出宗教创造者的人的内涵所在,即人的自我意识的本质内容包含着三个方面,分别是理性、意志与爱。“真正的存在者,是思维着的、爱着的、愿望着的存在者。”^[6]“属神的本质不是别的,正就是属人的本质,或者,说得更好一些,正就是人的本质,而这个本质,突破了个体的、现实的、属肉体的人的局限,被对象化为一个另外的、不同于它的、独自的本质,并作为这样的本质而受到仰望和敬拜。”^[7]因此,费尔巴哈的宗教观也被称为人本主义宗教观。费尔巴哈对宗教的本质的理解是人对自己本质的异化,并且对这种异化的外在对象表示信仰和崇拜。费尔巴哈认为人的本质是指“现实生活中有血有肉的、感性的、自然的、真实的人”^[8]。对此,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中指出:“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

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费尔巴哈没有对这种现实的本质进行批判。”^[9]在这里，马克思探讨了宗教的本质问题，将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人的本质不同于费尔巴哈谈的“固有的抽象物”，而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尽管费尔巴哈把人作了唯物主义的理解，否定了神创世界、神创人。但是，费尔巴哈仍然没有认识到，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或者“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10]。“虽然费尔巴哈对人的理解不够现实，没有将其置于具体的历史环境和现实的物质生活中来理解，但这并不等于说人没有理性、意志和爱等本性，只是说不能抽象地将这些东西理解为独立或自足的东西，它们本身是社会的产物、历史的产物。”^[11]

从人的视角出发得出的历史唯物主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得到明确的宣示，即“我们的出发点是从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12]。从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也应当看到宗教是以从实际活动的人为载体。

至此，我们可以认为，马克思所开创的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在起点上就关注到宗教背后的人。宗教中国化应该面向宗教的载体——人，更应该面向人群的集合——国家和社会。所以，宗教中国化的首要内涵是宗教适应社会，这是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的题中之义，也是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的创新发展。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要看到人所承载的国家与社会，而非简单地从宗教出发或从人的自我意识出发。

三、宗教找准定位：回归宗教的本来面目

宗教找准定位，是指清楚认识到宗教是生存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的，其中主要是指处理好宗教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让宗教回归其本来面目。马克思正是看到宗教与政治的捆绑带来的社会封闭而开启对宗教的批判。当然，这只是马克思开

展对尘世批判的前言，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可看出马克思的核心观点，即宗教的根源在人间，在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之中。马克思宗教批判的本质是对“现实世界的法的批判和政治的批判”^[13]，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德国批判具有虚假性，他们是“设想通过克服人的意识的异化来改变现实世界”^[14]。

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宗教问题，源于他们所处的客观形势。当时，“传统宗教是德国封建专制制度的精神支柱，不首先批判宗教就不能有效地批判旧的制度，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宗教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15]。当时，整个社会的精神文化被僧侣垄断，哲学成了论证上帝存在及其超自然权能的工具。例如，“康德在他的垂暮之年发表最后一本著作《学院之争》，主要是控诉神学对哲学的束缚，主张终结神学对哲学的控制。在发表这部作品的四年前，康德本人就曾因为有过言论自由受到限制的经历，当时他发表了《纯粹理性界限内的宗教》，而普鲁士国王威廉二世向他发来谴责信，指责他的哲学‘歪曲和贬损了《圣经》和基督教诸多至关重要的基本教义’”^[16]。这就是恩格斯指出的，“中世纪把意识形态的其他一切形式——哲学、政治、法学，都合并到神学中，使它们成为神学中的科目”^[17]。可见，当时的神学控制着其他一切意识形态，其他意识形态被神学笼罩。1841年，普鲁士政府颁布的书报检查制度提出：“与宗教的一般原则相违背的一切均应杜绝，不管个别宗教党派和国内允许存在的教派的见解和教义如何。”^[18]“统治者利用宗教维护不合理的现实，对他们来说，‘宗教也是现实世界的普遍肯定’。这表明，马克思已认识到普鲁士政府利用宗教来维护其统治的立场。”^[19]鲍威尔在分析宗教意识与当时社会关系时指出，“人受到警察和反动势力的迫害，出版和写作受到严格的审查，当局不让公民有发表言论的自由以及其他的自由”，“基督教国家已经调动了一切宗教的镇压手段，并正在继续利用宗教来捍卫它本身的存在”^[20]。

基于中世纪宗教的研究,经典作家进一步认清了宗教的本来面目,指出宗教来源于人间,是现实世界的反映,并不是绝对的超越人世的存在,进而强调政治和宗教相分离。

马克思没有循着鲍威尔“把世俗问题化为神学问题”的观点,而是“把神学问题化为世俗问题”^[21]。马克思也认真考虑过“宗教解放”的问题,他认为的“宗教解放”不像鲍威尔那样“废除宗教,而是要消除产生宗教的社会桎梏本身”^[22],以实现国家和宗教的分离和宗教信仰的自由。“宗教不再是国家的精神,而成为个人可以自由选择信仰”^[23]，“国家应该是政治理性和法的理性的实现”^[24]，这时的宗教才真正超越狭隘性、世俗性，不将世俗作为维护自身的手段。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列宁在《社会主义和宗教》一文中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对待宗教问题的原则作出的明确论述。他指出：“任何人都有充分自由信仰任何宗教，或者不承认任何宗教，就是说，像通常任何一个社会主义者那样做一个无神论者。在公民中间，完全不允许因为宗教信仰而产生权利不一样的现象。”^[25]只有宗教信仰回归到个人的理性选择，才可以实现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也算是真正回归宗教信仰的本来面目。此时，作为“个人的私事”的宗教信仰才能满足信众的精神需求。从宗教的客观规律看，任何宗教都会标榜自己的“真理”属性，“都具体自认为真甚至是自认为唯一为真的性质，也就是把自己的信仰体系当作真理或唯一真理”^[26]。正是因为宗教认为自身具有“真理性”，才需要最大限度地摆脱外在的依靠去获得自身的“真理性”。宗教信仰需要依靠个人意志作出选择，也就是以人与人之间的自由为前提。宗教一旦与世俗权力捆绑，往往异化为背后所属人群的特殊利益，从而维护特殊人群的固化利益。

宗教要找准定位，为经济社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在健康传承中成就自我，这是中国共产党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作为一项基本政策的基础，体现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是经典作家

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的延续与发展。

四、宗教自觉变革：积极主动作为

宗教自觉变革的内涵即宗教积极主动作为，革除不合时代的旧观念、旧制度。宗教自觉变革并非无意识地、无方向的变革。这体现在宗教改革需要与所处社会与时代相适应，也揭示了宗教是生存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的。

宗教自觉变革首先揭示的是宗教没有“独立性的外观”^[27]。“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28]“这就告诉我们，在分析宗教问题时，不要把宗教视为独立自足的东西，它是由社会的物质生产关系所决定的，由它们的需要而产生，随它们的变化而改变的。”^[29]宗教从属于社会存在这一认识，一直贯穿在马克思从青年时期到唯物史观形成的全过程。例如，马克思青年时期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指出：“谁觉得世界是非理性的，因而谁本身也是非理性的，对他来说神就存在。换句话说，非理性就是神的存在。”^[30]可以看出，马克思此时的宗教批判是基于对现实的关注，为唯物史观的形成提供了可能^[31]。马克思在《莱茵报》《德法年鉴》工作期间得出宗教根源的认识。例如，“宗教本身是没有内容的，它的根源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间”^[32]，以及“不是古代宗教的灭亡引起古代国家的毁灭，相反，是古代国家的灭亡引起了古代宗教的毁灭”^[33]，这些观点标志着唯物史观的萌芽。《德意志意识形态》标志着唯物史观的创立，马克思在此书中完整系统地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也全面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发现了物质生产与交往关系在人类社会中的基础性地位以及动力机制这一秘密，揭示了政治法律制度 and 思想观念形态，包括宗教信仰之所以形成的客观物质基

础”^[34]。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再次提出：“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35]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宗教的历史唯物主义论述，揭示宗教自我变革的从属性，也就是顺应时代形势进行变革，并不是否定宗教的自我变革的主体性与能动性。

恩格斯曾经提到关于宗教能够积极主动作出变革的论述，如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国教的原因。“罗马世界帝国使得古老的民族没落了……古老的民族的神就灭亡了，……罗马曾企图除本地的神以外还承认和供奉一切多少受崇敬的异族的神，这就清楚地表明了有一种世界宗教来充实世界帝国的需要。……它在 250 年后已经变成国教这一事实，足以证明它是适应时势的宗教。”^[36]具体来讲，当时的耶稣十二门徒的保罗破除了对犹太教严格斋戒的固守，主张只要承认耶稣为救世主即成为基督教信徒。基本教义适应了罗马帝国统治者的统治需要，也适应了本地信众寻求精神慰藉的需要，基督教因此逐渐成为世界性宗教。

恩格斯曾经对德国农民战争代表闵采尔的宗教哲学思想作出非常中肯的评价：“与其说是当时平民要求的总汇，不如说是对当时平民中刚刚开始发展的无产阶级因素的解放条件的天才预见。”^[37]闵采尔是德国农民战争的代表，曾是一位乡村神父，也是一位伟大的宗教改革家。“闵采尔正是从人人都有神性这一观点出发，认为天堂不在天国而在人间，能够在人间建立一个没有苦难和人人幸福的‘千载天国’。”^[38]闵采尔将耶稣基督拉下神坛，但同时又将其转化为人间的理性，认为信仰即是理性。为实现自己的理念主张，闵

采尔投身到农民战争中并起着领袖的作用，领导农民积极反对封建贵族。由上可见，宗教不仅能够积极主动作为，而且体现了适应时势的特征。

宗教自觉作出变革，从本质上讲是指宗教进行积极主动的调适，需要“宗教界审视宗教领域存在的不适应问题，增强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把握历史自觉和历史主动，激发起自我变革的勇气”^[39]。宗教自觉作出变革也是我国宗教健康传承的历史经验总结。例如，从我国佛教的清规戒律来看，历史上因应不同时代形势，形成不同版本的禅宗清规。宋代宗赜所撰《禅苑清规》是宋元之后寺院制度礼仪的重要范本与基础，因循《禅苑清规》而制的《咸淳清规》序中有言：“吾氏之有清规，犹儒家之有《礼经》。礼者从宜，因时损益。”^[40]《敕修百丈清规》有言：“吾所宗非局大小乘，非异大小乘，当博约折中，设于制范，务其宜也。”^[41]意思是说，建立清规的初衷并没有局限于大小乘，但也不脱离于大小乘，而是充分发挥主动性，在不一不异的原则上因地制宜，设置一套规范。中国佛教传承和发展的基本特征是应机应时，这就是宗教因应时代环境积极主动作出变革的具体体现。可以说，一部宗教史就是一部宗教变革发展史，中外历史证明，宗教总是随着社会变革而调整自身与之适应。我国社会正在经历深刻的变革，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又作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部署与推进，我国宗教也只有进行自我变革，切实解决各种深层次问题，才能与当代社会同频共进。

五、结语

宗教中国化体现为一种动态发展的过程，是进行时而非完成时。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不仅具有明显的时代意义，而且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如何在多维度上着力系统推进宗教中国化，需要对坚持宗教中国化进行深刻的基础理论剖析，为我国宗教中国化提供一定的方法论指导。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强调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 全面提高新形势下宗教工作水平 [N]. 人民日报, 2016-04-24(1)
- [2][9][10][12][21][27][2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一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3、501、3、525、27、525、525.
- [3] 金泽. 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与文化自觉 [J]. 世界宗教文化, 2021(3): 9-15.
- [4] 科尔纽. 马克思恩格斯传: 第一卷 [M]. 刘磊, 王以铸, 杨静远,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63: 202.
- [5][6][8][15][20][22][23][29] 吕大吉, 高师宁. 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研究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54、69、70、157、63、123、123、154.
- [7] 费尔巴哈. 基督教的本质 [M]. 荣震华,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4: 44.
- [11] 文学平. 马克思如何理解关于上帝存在的实用主义论证 [J]. 世界宗教研究, 2023(12): 9.
- [13][14] 妥建清, 张君秀. 马克思、恩格斯宗教思想研究的三种视域 [J]. 世界宗教研究, 2023(5): 8、8.
- [16] 金格拉斯. 科学与宗教: 不可能的对话 [M]. 范鹏程,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 5.
- [17][3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四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310、309-310.
- [18][24][30][3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一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115、118、101-102、213.
- [19][31][34] 黄金辉, 闵丽. 马克思的宗教批判与唯物史观的形成——以马克思青年时期论著为中心的分析 [J]. 世界宗教研究, 2023(1): 3、2、7.
- [25] 列宁全集: 第十二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7: 132.
- [26] 金泽, 赵广明. 宗教与哲学: 第三辑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220.
- [3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十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4.
- [35][3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二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592、248.
- [38] 陈麟书, 陈霞. 宗教学原理 [M].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3: 425.
- [39] 王作安. 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 [N]. 学习时报, 2022-03-21(1).
- [40] 蓝吉富. 禅宗全书: 第八十一册 [M]. 上海: 文殊文化有限公司, 1990: 3.
- [41] 道元. 景德传灯录(上) [M]. 朱俊红, 点校. 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11: 158.

责任编辑: 赵晓锋

问责异化研究述评：一种类型学分析

梁 剑

摘要：以类型学作为研究方法，学界关于问责异化的研究可划分为内涵研究、现象研究、成因研究、归正研究四种类型。同时，结合多种理论，对四种类型内容进行述评分析，从而形成完整的知识图谱。研究发现，当前学界对问责异化的研究有三个特点：在取向上，密切关注并服务现实；在重心上，重应用研究轻理论建构；在方法上，形成学科交叉综合研究趋势。展望未来，精准问责可能会成为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

关键词：问责异化；研究现状；类型分析；精准治理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作为一项重要制度安排，问责已成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利器，“有权必有责、有责必有问”成为各界共识。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需要对问责异化研究状况进行阶段性梳理，总结特征，查找不足，进一步促进实践与学术发展。分类研究方法在文献综述研究中有很大优势，“是在理论研究中进行概念化、测量及进一步因果讨论的基础”^[1]。本文主要采用类型学分析方法，以呈现问责异化研究知识图谱。

一、问责异化的概念内涵

从现有的研究文献来看，学界提出问责异化概念有一个发展过程。刘军宁（2004）提出，如果制度供给跟不上，则问责有可能扭曲变形，沦为选择性惩罚和掩盖更大违规行为的工具。之后，

陈雄飞（2008）基于行政问责实践，提出了行政问责作秀甚至异化的问题。孙志建（2009）则对行政问责异化风险进行了研究，提出了行政问责异化的功能性风险、程序性风险与结果性风险。之后，强恩芳（2009）和吴春华（2010）则对行政问责异化的内涵进行了专门研究。他们从“异化”概念入手，认为行政问责异化是指那些偏离了行政问责的本意，不仅没能规范公权使用，反而造成公权滥用、加重侵害社会公众权益的问责现象。基于前人的研究，蒋来用（2019）较早对问责异化的内涵进行了学术化界定：“背离岗位权力设置的目标，甚至出现妨碍和影响岗位职责履行的状况。”^[2]这个界定也在后来的研究中被广泛使用。

综上所述，学界对问责异化内涵研究不是太

收稿日期：2024-08-20

作者简介：梁剑，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省社科院基地特约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政治文化、基层治理与公共政策。

多,这可能主要在于“问责制不是一个能够靠理论建构的问题,而主要是一个实践问题、技术问题”^[3]。从认识论角度来看,由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已揭露出劳动异化等现象:“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创造了宫殿,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棚舍。劳动创造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的痴呆。”^[4]学界对问责异化内涵也有着“照葫芦画瓢”式的认知与理解。虽然同时期出现了问责乱象、问责泛化、问责作秀、问责尴尬等提法。但从概念内涵的归类来看,这些词汇也可纳入问责异化的范畴。因为问责异化作为异化概念的再生产,具有高度概括性、抽象性与包容性的特质,更有助于形成交叠共识,为后续研究奠定基础。

二、问责异化的表现形式

问责异化的表现形式是呈现在人们认知范围内的异化现象,既是一种客观呈现,也是一种主观体认;既是一种感性认知,也是一种理性分析。而学界对问责异化进行研究也往往是从现象开始的,已有研究主要分为三类。

首先,问责组成要素的异化。从行政组织学理论来看,问责是一种公权运转行为,离不开内部要素的相互支撑。就问责而言,其组成要素包括目标、内容、方式和结果。因而问责异化主要就是这些要素的异化。刘军宁(2004)提出问责沦为选择性惩罚工具则是目标与内容上的异化。陈雄飞(2008)强调问责异化变成“丢卒保车”则是结果上的异化。强恩芳(2009)则较早提出内容上重执行轻决策,方法上重问责轻处分,手段上重副职轻正职,结果上重程序轻结果等异化现象。后来,不同学者围绕问责组成要素进行了延伸研究。李国梁(2011)提出了“问责焦点化”与“问责目的错位”。胡春艳(2015)提出了问责异化为免职的手段。

其次,问责过程的异化。从行政过程来看,问责大致包括决策、执行和反馈。决策涉及动机

与出发点,执行涉及行为行动,反馈涉及结果运用。赵蕾(2006)从前提环节(发现)、预备环节(解释)、启动环节(评估)、主体环节(追究)和补充环节(救济)提出构建规范化问责,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借鉴。孙志建(2009)提出行政问责在功能、程序与结果三个方面的异化。吴春华和强恩芳(2009)提出问责前异化与问责过程中的异化,这些观点基本融合了问责异化的要素论与过程论。赵园园(2020)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问责动机异化、行为异化与结果异化,这是对问责过程异化较全面的总结。

最后,具象化总结。从认识论视角来看,社会中个体性、特殊化现象可以通过逻辑分析来进行分类归纳。由于问责异化表现形态各异,以逻辑归纳方法,形成从个别到整体、由特殊到一般的具象化总结。蒋来用(2019)把问责异化表现归纳为问责的简单化、机械化与随意化。谷志军(2021)提出问责的形式化、简单化、随意化和选择化。其中,选择化是一种有违公平方式、主观故意进行区别对待的问责现象。任建明(2019)、吕永祥(2021)等则先后以不精准化来概括问责异化的表现形式。与异化相比,不精准化更容易理解。此外,还有学者提出泛化式问责等异化现象。

综上所述,学界对问责异化的表现形式研究颇多,也很有特点。由于问责异化现象属于概念外延范畴,其边界有时很难清晰界定。例如,缺少合理的分析视角,文献梳理可能会成为流水账式的罗列与重复。上述三个方面虽侧重点有所差别,但内在指向比较一致。具象化在内容上可能会与前两个方面有所重合,但更多在于补充,有助于展现异化现象的立体面与层次性。

三、问责异化的形成原因

在政治系统理论看来,“可以把政治生活看作一个行为系统,它处于一个环境之中,本身受到这种环境的影响,又对这种环境产生反作用”^[5]。因此,对问责异化的归因研究,也可以从这个角度进行。

首先，制度法律视角。主要指从法律、规章和程序等方面来分析。一是基础性法律的不足。毛政相（2005）提出，虽然我国宪法规定了各级政府向人民负责，但是问责实践依据却是党内条例或政府规则，面临法理依据不足、基础性制度缺乏的窘境。周亚越（2005）认为，虽然中央层面出台了政策但缺少全国性法律，中央或地方现有的问责法规也是内容不健全。二是缺乏权责明晰的规章制度。毛寿龙（2008）指出问责过程责任划分更多是行政性、指令性的，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特别对问责的责任界定模糊、划分随意，很难实现责任面前平等。这些反映我国早期问责实践在制度规章建立方面存在的不足，既是当时学界研究的重点，也是后续实践改进完善的重点。随着我国问责实践的逐步深入开展，中央和地方相继出台问责条例或修订完善问责办法等，不少比较突出的问责异化问题得以矫正。

其次，执行机制视角。在公共行政领域，任何完善的制度、规章与政策的实现，离不开好的执行机制，因为“执行一部宪法变得比制定一部宪法更要困难”^[6]。问责实质是非常具体的执行行为，如果执行环节存在问题，会引发各类问责异化。一是组织实施机制的缺陷。王琪、吕文娟（2011）认为，问责实施机制不健全，缺乏专门负责机构，问责成了被动的善后流程。二是压力传导机制偏差。蒋来用（2019）认为，问责压力传导机制脱离现实，成为由上到下单向施压的重要工作抓手和“尚方宝剑”，往往导致问责异化产生。三是柔性弹性机制缺乏。由于权责不匹配，基层部门会想尽办法避责。倪星（2018）提出，如果任其蔓延，将产生难以预料的后果。陈朋（2019）认为，过度强调问责而忽视容错，问责效果也会不尽如人意。四是监督工作滞后。谷志军（2017）指出，我国传统上形成的上对下强监督、横向之间弱监督，对问责有效实施会产生不利影响，不仅会出现问责异化，也会导致问责滥用。

最后，行政行为视角。主要是从行政人的思

维习惯、工作技能、工作方式进行分析。一是存在问责认知错误。刘军宁（2004）较早提出过行政问责误区的问题。他指出，人们把行政问责错误理解成惩罚和引咎辞职。强恩芳（2009）则提出被问责方的认知错误问题，把问责理解为不正确的处罚。李军鹏（2019）指出基层曲解问责内涵的现象，不严格依法办事，没有按照权责一致、客观公正的标准进行问责。二是以运动式方式推进问责。高志宏（2010）提出，我国行政问责还停留在“风暴式”“运动式”的阶段。徐晓林（2011）提出，风暴式问责过后，目标初衷不仅没能实现，反而加剧公共服务低效能的现象。李忠汉（2017）提出，应超越革命式思维与方法。三是技术方法运用不当。吕永祥等（2020）指出，在问责中推广数目管理，由于工作指标与考核设定不合理，导致为了完成指标而进行“凑数问责”。谷志军（2022）则一针见血指出，技术手段无法解决问责中所有难题，如果对技术过度迷恋，反而会引发其他新问题。

综上所述，学界对问责异化成因探究全面深刻，几乎涵盖大部分诱发因素。从宏观到微观，从内因到外因，从个体心理到思想认知，等等。学界的研究过程也反映了我国的问责实践逐步深入、问责效果逐步提升。当然，也许还存有其他诱发因素，但更重要的在于及时纠偏，这也是问责的功能所在。

四、问责异化的归正治理

对问责异化归正治理，就是让问责回归本源与初衷，发挥其原有的功效。学界对问责异化归正的研究主要分为三类。

首先，完善制度体系。主要通过制度供给来消除或减少问责异化产生。因为“制度要比其他任何方面对人的行为具有更大的规制性。在实践层面，制度的确有能塑造个体的行为，并减少不稳定性，如果没有制度，这种不稳定性将在很多方面支配社会生活”^[7]。所以，对问责异化进行归正治理的前提是构建科学合理的规章制度。

毛寿龙(2004)认为,需要建立程序性问责体制,以确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周亚越(2005)认为,建立行政问责法律,应界定行政问责主体、确定客体、规范事由、完善程序。宋涛(2006)则指出,问责制度建设应该是体系化的工作。强恩芳(2009)认为,国家层面应制定《公务人员伦理法》《行政问责法》等法律,以明晰问责主体、对象、方式与监督。张先明(2012)提出问责制度建设的重点在于理顺权力关系、明确责任划分、完善问责体系。蒋来用(2019)则进一步提出,健全问责制度体系,严禁地方随意出台与上位法相冲突的地方性规章。可以说,这些具有代表性的研究为我国问责制度的不断完善提供了很好的学理支撑。近些年来,我国出台、修订了一系列法律规章,为我国问责实践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体系支撑。

其次,建立柔性机制。构建柔性机制的依据在于,问责工作比较复杂,现实中会经常出现例外情况,而现有制度规则无法涵盖。因此,需要建立纠偏纠错机制来避免异化产生。周亚越(2005)较早提出要建立问责柔性机制,但主要指伦理价值、道德素养建设。之后,容错机制成为重要研究方向。竹立家(2016)提出,应对公共权力行使失误进行保护,但仅限于行政错误,政治错误和道德错误不在保护范畴。李军鹏(2019)提出,应建立容错纠错机制,把敢闯敢干、先行先试行为与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陈朋(2019)则认为,避免问责异化的关键在于问责与容错实现合理均衡。

最后,推行精准问责。庞明礼、薛金刚(2017)认为,当前的行政问责面临着治理对象和权力边界的双重外部性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在于精准问责。蒋来用(2019)认为,破除问责异化需要提高问责精准度,细化问责情形、完善问责申辩程序、利用大数据等技术来完善第三方评估调查。吕永祥、王立峰(2019、2020)则提出,针对问责不精准现象,应就主体权责定位、对象权利保障、兜底条款设定、任务与考核指标设计

进行改进。谷志军(2021、2022)提出,应该将技术和制度有机结合来实现精准问责,建立精准性导向的问责评估体系和基于大数据技术的问责联网。

综上所述,制度体系、柔性机制与精准问责体现着学界对问责异化治理认知的不断深化。任何的制度体系都要跟随实践的变化而更新,要有动态调整与纠偏的功能,这也是学界提出建立柔性机制的根本所在。当前问责柔性机制还应该包括法律或司法救济,但这方面的相关研究比较少,可以成为未来拓展研究的领域。精准问责与制度完善路径、建立柔性机制路径具有高度的黏合性,并且紧密围绕数字社会技术和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是一种具有高度包容性的治理范式。

五、结语

问责作为我国政府行政体制改革和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制度安排,一经出现就引起学界的高度关注,并且连续多年成为研究热点。而问责异化作为实践中背离初衷的现象,也仅是在近些年来被学界总结提出的。纵览学界关于问责异化研究的状况,大致可以总结出以下研究特点。一是密切关注并服务现实。从文献时间分布来看,虽然学界对问责乱象的研究触及较早,但真正把问责异化作为重要主题进行专门研究,则始于党的十八大。由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提出和全面从严治党的推进,我国的问责实践重心已从早期行政领域逐步发展到以党内问责为代表的社会全领域问责。学界及时回应这一重大实践要求、紧密服务现实需要,并对我国社会治理效能提升产生了推动作用。这也充分表明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并产生了积极效应。二是重应用研究轻理论构建。学界对问责异化学理研究总体偏少,特别是对问责异化等基础概念的研究较少。因为“无论历史学研究还是政治学研究,首先都须面对研究者所使用的概念工具的模糊性、多义性和流动性,只有澄清了特定概念在特定时空背景下的内涵、外延及其负载的文化

意义,进一步的探究才能形成知识增量”^[8]。三是形成了学科交叉综合研究的趋向。问责异化研究虽属小众,但实际上已涉及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党建等学科,并且与数字治理、精准治理、容错机制等热点交叉,形成了多学科多领域研究态势。

展望未来,精准治理可能会成为问责异化研究最为重要的方向。首先,从理论层面来看,问责本身内含着精准属性。一是问责需要准确性。准确是问责的基础,很多异化现象主要因为“主体、对象、事件”三要素出现各种错配。二是问责要求有效性。有效是问责的目标,既能够实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又能实现激励效果。三是问责具有推动性。问责的根本目标在于,以问责来推动各项公共服务有效展开,并提升治理效能。而精准治理主动性、精准性和科学性非常契合问责内在属性。其次,从实践层面来看,精准治理有助于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精准治理紧密围绕数字社会技术特点和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它不仅是一种工作理念,还是一种具有高度包容性的治理范式。以精准治理推动解决问责异化难题,可以满足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全面从严治

党的实践需求。同时,也能够以实践促进精准治理理论的发展,推进构建中国特色治理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

- [1] 毛维准. “国际责任”概念再审视: 一种类型学分析框架 [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6(12): 1.
- [2] 蒋来用. “问责异化”的形成与矫正机制研究 [J]. 河南社会科学, 2019(7): 2.
- [3] 韩志明. 当前行政问责制研究述评 [J]. 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2007(2): 162.
-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一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53.
- [5] 伊斯顿. 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 [M]. 王浦劬,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99: 21.
- [6] 彭和平, 竹立家. 国外公共行政理论精选 [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7: 4.
- [7] 彼得斯. 政治科学中的制度理论: 新制度主义 [M]. 王向民, 段红伟,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181.
- [8] 李里峰. 概念变迁与中国的政治现代性 [J]. 探索与争鸣, 2023(9): 49.

责任编辑: 鲍跃华